

旅行家 | 游观
系列

王炜 著

另一种中国行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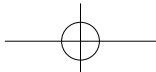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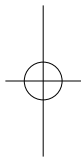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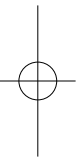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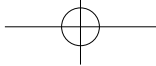
大地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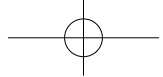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Earth Report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我喜爱不卫生的旅行就像一个岛屿，就像一个死熄
的湖，要尊重那些没有被字词命名却被介入的东西，歪
斜的、不朽的和群氓的相形似的和谐。

——米歇尔·德吉《毫无意义者》



● 艺术家朱建林为王炜的诗剧演出现场绘制的一幅虚构地图。



自序

另一种中国行纪

古希腊罗马人注重风俗采样和军事视野的“行纪”之后，启蒙时代是游记体裁的盛期。伏尔泰式“旅行哲学家”屡有出现，斯威夫特的讽刺寓言《格列佛游记》被当作儿童文学对待。约翰逊、狄更斯、海涅、夏多布里昂都是敏锐的游记作者。18、19 世纪文学的许多小说杰作是用游记样式写成的。在近代文学作者笔下，游记服务于思想，和世界的现实状况有关。

地理大发现时代带来近代游记的第三次浪潮。殖民竞争的大势之下，“帝国的男人们”投入到远东的冒险游历中。作为一位关于远东世界的帝国作家，吉卜林在短篇小说《君王迷》中讲述了一个意义多重的故事。两个大不列颠记者在北印度各个小邦之间旅行，用手上的“内幕”勒索地方执政者为生。并无人将其灭口，只是驱逐他们出境，因为当时没人会杀死英国记者。这对儿拍档研究地图，看中了一块接近拉达克的地区，一块无



主之地。他们带着几箱军火，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目的地后开枪示威，土著视之为神迹。于是，这俩货就在这里建国。一个登基称帝，一个被任命为大总督。后来，君王死于暴动的子民之手，大总督带着朋友的头颅一路乞讨，回到印度。一战以后，一些具有地缘政治意识的敏感的欧洲作家，试图使亚洲的空白地带（常常是想象中的）成为主题，把它作为癫狂行为的舞台。也许斯威夫特没有想到，他在《格列佛游记》中讥讽的定居者们（也是殖民蓝图的始作俑者）成为了旅行探索者。

游记的第三次浪潮的重要构成，是西方军事人员、自然科学考察者与冒险家撰写的数量丰富的中国行纪。我的同代人中，不乏斯文·赫定的著作以及“俄国经略东方丛书”的读者。20世纪以来，游记作为非虚构文类，在奈保尔、卡普钦斯基这样的观察家手中保持着综合批评文体的传统。

旅行者的社会身份在一个地方放大，在另一个地方又被缩小（不同地方环境中存在着的事物和观念亦然），经受两种不同观念的辨认。在不同地区旅行和工作，一如处在斯威夫特笔下的大人国与小人国之间，夹在一面凸面镜和一面凹面镜的张力之间。

2008年我与一行人长途跋涉，经萨嘎、仲巴、冈仁波齐、普兰、扎达，到达阿里地区行署所在地狮泉河，与我们的地方人文向导、艺术家H会合。H是画家和技艺独到的古格壁画研究与临摹者，他也欣赏斯文·赫定和那些一战时期野心勃勃的俄国旅行家们。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之一，是关于古格壁画颜料的考察。但H说，他不会告诉别人，他的一些彩色原料在阿里地区的来源地。H很快切换到弄臣的形象，带领我们去见当地官员，



► 满洲里的公共雕塑。



H 希望在即将举行的所谓“象雄文化节”中扮演某种重要角色。接见我们的官员像个民国师爷，开始秃顶的大背头上发了蜡，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反夹着一支装上了瓷烟嘴的烟。H 在席间活泼得像个李白，时而笑容娇憨，做东的官员也表现得欣赏他的艺术家气质。在官员都散去后，H 挽留我们继续陪他喝酒，很快他就喝醉了。他一会儿对我说，你丫是个可怕的人，你太冷静。一会儿对我旁边的同事指着我说，你们一定要尊敬他。一会儿声色俱厉对众人说：“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知道我在玩多大的游戏吗？你们知道我在阿里多么厉害吗？”，他说着这些，仿佛他就是一个雄伟的领主。但此情此景的游戏只是杯盘狼藉中的二愣子雄伟。面对这位想讨取官员背书的艺术家的，仿佛面对《君王迷》中的主要角色。我想，如果我立刻利用这个机会扮演一个狮泉河的半吊子伏尔泰，那么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小人。我不发言也不反对他，同时，我在他的赞美和咒骂之间一会儿放大成为巨人，一会儿缩小成为骑笨鹅旅行的尼尔斯。不过，H 对西藏有自己的一种评价，且是健谈的故事讲述者。这也是我们在北京见过一次面后，继续在阿里地区造访他的原因。

H 的理论是，“西藏不是它自己”。概括而言，西藏是周边文化的杂糅幻影，是一个拼凑派生的影子。他坚持认为，西藏僧侣的黄帽子式样来自古罗马军人的头盔，僧袍的式样来自希腊人，他相信其间的文化通道依然存在着可以梳理的线索。他举例，仅仅一个印度教中的因陀罗形象，就在西藏的本土化造像过程中派生出数百个分身，但来源都不是西藏自己的原创。这些观点很有趣，甚至不无合理之处，但我们更希望他讲述一些阿里古格地区的民间故事。在 H 随意说起的许多故事中，我很感兴趣一个与拉达克地区有关的，关于一座荒谬巨



塔的故事。

如今通向古格王宫在山顶的废墟，仍然要经过一条隐藏在山体内部的暗道。当古格王在拉达克的攻击下全面溃败，藏入这座山上之后，进攻到山下的拉达克人暂时未找到暗道入口。既然胜利已成定局，拉达克人反倒希望用一种具有羞辱性的方式延续古格王的生命。他们并不急于擒获古格王，而是企图摧毁后者的精神。一条奇思异想、几近恶作剧的计策被想到并立刻实施。

拉达克人在未到山中部的一处窄小平地上选址，打算在这里修建一座巨塔，把它一直修到与山顶的宫殿等高的位置，再架设云梯进入王宫。在如此逼仄的地基上，修筑这样一座巨塔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修筑成功，这座建筑堪比巴别塔。但这条计策的关键在于：这座巨塔并不急于完成，并不需要施工效率。它需要缓慢，在长时间中挥霍古格人的生命，向古格王示威、也向全体古格人宣布征服的意志。在拉达克人的驱赶之下，古格民众登上这座过去他们无权靠近的山，为敌人修建用于擒获他们的君王的巨塔。这座荒谬的建筑，成为凌虐古格人的刑具。

末代古格君主每天伴随着山下的施工声，度过了30年。在这30年中，山下白骨遍野，而这座塔的建造不紧不慢。30年中，除古格王宫外，古格地区已经是拉达克人的领土，后者盘算着将铁蹄踏入更遥远的东方目的地。古格王的存在形同虚设，像一个抽象的影子，这座山就是他的囚室。这场心理战的结果没有悬念。30年后，老迈的古格王走出躲藏地，凝望着充满挑衅意味的巨塔的半成品，接受了死亡。

这座塔的一部分工地残墙（真伪未定），至今仍然



存留在暗道入口处附近，有人称它堪称古格人的哭墙。进入暗道，山体内部的境况并不如我们想象的蜂巢般复杂。在一处据说是古格王的冬宫的洞窟里，地上遍布着鸟的足印。这里洞窟与洞窟相连，在过去，末代古格王与他的下属、嫔妃一起，仍然可以在这里勉强维持他作为君主的生活。

这座巨塔的修建是否实有其事，人们没有确定答案。古格遗址所在的山峰并不十分高大险峻，在那 30 年时间里，可以有很多方式到达山顶。但征服者只是选择了一座施工进度缓慢的、笨重的巨塔，仿佛要表明一种固执的、纯粹的恶意。一如奥登的说教诗句：“恶总是奇伟壮观的”。这条计策的提出者如今已不得而知。

之后在北京，我与 H 又有过一次交谈。他谈到英国人克拉克·阿裨尔的著作《中国旅行记》。在这部书中，英国旅行者被封闭、羸弱的东方君主嘉庆驱逐，沿着大运河横穿中国大陆，第一次用林奈植物分类法对沿途的中国植物进行了分类，从广州出海回到西方海域的路上，他们在圣赫那拿岛上造访了另一位封闭的君主拿破仑。作为英国人的阿裨尔，用描述昆虫的那种博物学家语言说，拿破仑依然“表情丰富”，他的外表并没有表现出人们可能认为的营养不良、颓废状况。人们希望已经成为“西方景观”的他保持体面和健康。H 说，他计划重走运河沿线。他认为人们对中国的理解远未完成，对于当代人的见识来说，中国内陆深处仍然是一处处模糊区域。虽然“重走 × × 道路”已经是时代的各种陈套之一，他仍然对此抱以热情。此外，他还想策划更大规模的活动，他喜欢“做大做强”。我仍然像在狮泉河一样，不发言也不反对他，虽然他没喝醉。与此同时，有个念头已经在怂恿着我：一个关于当代中国不同地区环境中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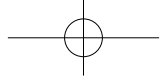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物的变形、人的思维意识状态，而不是地理自然界的斯文·赫定，也许不是没有可能。“我最推崇行走的人！”，H 喜欢用这类激昂的戏剧腔宣布。

是的，有些行走的人需要被重新理解。

仿佛有一份幽暗却图案生动的地图，递到了我手里，但我肯定不会成为 H 的大总督。不过我感谢 H，他给了我一个关于荒谬巨塔的绝妙故事，一个象征。人们依然喜欢轻视随意的宏伟设想，这些设想非常随便地扩张规模，通过大规模来实现自身。但是，当我在中国西北一块沼泽地边的鬼城，看见无人使用的高楼大厦和一些未完成外壳的灰色大型建筑时，我感到人类对规模的观念可以在地方自然环境里产生怎样难以名状的变体。它们像沼泽本身站在那里。它们像《格列佛游记》中的浮夸政治家和科学怪人的作品，也像一些未来世界的、衰败的伏尔泰，在对整个世界和来访者做出力不从心的批评。以后，我又造访过一些地方的“文化教父”，他们有的是“君王迷”，填补一个地方的某种空白，喜欢像 H 那样参加宴席，之后在微博上议论时事。有的像封闭的古格王，生活在一个拥趸圈子的精神洞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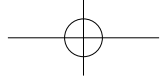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在阿里地区旅行过程中，我读完了《格列佛游记》、《死魂灵》和一本地理学方面的书《所有可能的世界》。在最后一本书中，旅行者不断重复这种行为：“在边缘地带阐明”——我在一首诗中称此为“返工”。在经过滩涂、人工岛、港口、密林、冻土地带、新农村、矿坑、军营、隧道、废墟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发展中城市之后，旅行者得到一个现有大地环境中的“事情”的序列——也许谈不上“事件”，有的是事实，有的仅仅是观念的产物，但都是开放的大地提供的认知契机。漫游仍未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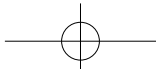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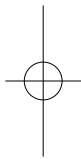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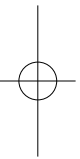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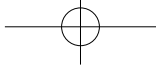
/012

大地报告——另一种中国行纪

束，因为事物总在变化。旅行者仍然可以着手开始一种
“从眼前事物发展起来的哲学”（Allan Bloom 语），
重写一种中国行纪，投入去领略这座变化中的中土大陆的
杂乱、可能性和快要坏掉的日光灯般忽明忽暗的笑声。



● 玛旁雍措边的牧羊人，远处是极物寺，在这里也能望见冈仁波齐雪峰。





目录

Contents

自序：另一种中国行纪 /005

Chapter 1

启程中的对话 /019

● “人活着用不着很多才能，我越来越明白这个，不过，这正好也是对人的挑战，没有才能地活。”——他的原话更混乱一些，不过基本如此——他的逻辑让我有点意外。接下来他的话饶有趣味，“你们这些人，你们既然有那么多想法，那么，能不能在冻土上种新东西？不能吧？你们不行。”

021 穹窿史

029 波浪公路

037 铁路的图案

049 满洲里—新巴尔虎右旗

061 盐湖的光

068 昨日的“脐点”

077 不再预言的鸟

087 腾格里和她



Chapter 2

工作者 /095

● “如果想了解人群，什么时候都不为晚，不用向遥远过去、向历史的重要证据或背景求证。人们并没有什么改变，人们可以呈现的主要东西一直存在着，这些东西可能并不以那些预设的、容易被说起的东西（譬如民俗内容）为前提。”

097 飞岛

106 马人

117 大峡谷的劳动

125 走向荒野的哲学

135 迷宫消失的喀什

145 冬眠的山野

153 “不完全”的沈阳

Chapter 3

朋友的去向 /159

●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意味着理解他人——包括朋友和敌人——对世界的认识，以及理解朋友和敌人在世界上的路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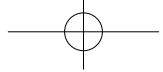
161 渤海的形象

171 上都与虚空

180 向下的大同

188 九嶷山及其他

194 朋友们的东北



Chapter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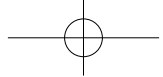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运动的终点 /201

● “古人不是世界主义者，这很有意思。他们认为自己是完全自足的，不需要‘异邦智慧’。所以他们不学习其他语言。这种看法导致他不能理解哲学具有决定意义上的重要性。一旦做出那样的区分，你就用不着旅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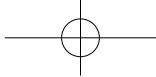
——S·伯纳德特

- 202 西安的幽灵
- 210 运动的终点
- 215 大雪中的孪生遗迹
- 220 身边的溪流
- 225 不可能的还乡

跋：一个人所喜爱的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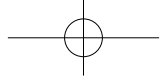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 呼伦贝尔那达慕大会期间的赛马活动，一般都在半夜两点准备，天刚亮即开始，太阳升起、温度上升后即停止。



启程中的对话



Chapter 1



1020

大地报告——另一种中国行纪



► 西藏中部的当雄草原。草原上常常可以见到招鹰架，所谓应对鼠兔泛滥的手段之一。五月这里还会下起大雪。



穹隆史

我们下山来到公路上时，天已经黑尽了，冷空气迅速充斥这片喀斯特山地。这是在贵州关岭地区，这里的高山上有一条纤细的古道，连接四川和云南。一些当地人喜欢说，这是诸葛亮领兵南征的通道。这条小路有时在山脊上起伏，有时隐藏进山腰的灌木里。在这个季节，云雾会长时间盘踞在高山。我觉得，我是走在马丘·比丘那样的群峰之上，云雾中的高地会忽然绽露一座城堡遗迹。事实上，这里的确拥有独特的古迹。在山顶，许多岩石上刻有不明年代、无人认识的文字，迄今没有研究者定论。在关岭地区，喀斯特高山没有高大的森林，岩石入侵并分割农田，石漠化的趋势使农民与环境学家忧虑不已。由于这里曾是三叠纪生物的巨大墓场，无法通过农耕满足收入需求的人们，在这里大举挖掘化石。田野荒废，农作物让位给恐龙时代的残片，那些镶嵌着海百合、鱼龙化石的石片，像一幅幅因为年代久远、无法冲洗成像的底片。

尽管我出生在贵州，对它的了解却少于我去过的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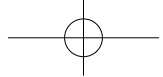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他省份。还在北京时，十数年未联系的C告诉我，他要去关岭地区做一项关于贫困的社会学问卷工作，问我是否愿意同行。C是仡佬族人，他认为，仡佬族是贵州唯一的原住民族。他试图整理西南山地族群运动的脉络，但关于混杂、缺乏证据和神话化了的历史，他感到，有生之年不可能再做到理性的梳理。近十年来，C认为他的生活在逐渐怠惰、文官化了，他厌倦酒席和各种等级关系。“我可能做不出像样的成就了，我就这样了”，他对我说。他认为，他会像一片普通、沉默的化石一样，最终消失在这些喀斯特高山里。

20年前，还是少年时，C介绍给我《马丘·比丘之巅》，声称他要为喀斯特地形中的高山、恐龙墓地和族群运动写一首这样的诗，还激动地向我阐述安第斯山脉与贵州山地的相似性。这个曾经爱好徐霞客、聂鲁达、天文学和花灯戏的仡佬族人，打算通过撰写关于仡佬族历史的专著，在地方话语等级中占据一席之地。但事与愿违，他郁郁不得志，成了一个暮气仿佛加重了肥胖的中年小文官。他的精力需要释放，于是，他开始满贵州寻找陨石。

C对我形成了一种警惕，他认为，我已经成为那种对“地方性”抱有傲慢与偏见的人。他让我去他家里，欣赏他的藏品，他用三个堪称壮观的木架子陈列他在贵州各地找来的石头。其中一些，被他周围的人认为什么也不是，更苛刻的评价是，“因为来自什么也不是的地方”。他认为，我可以做出更有见识的评价，可是，我不是一个奇石爱好者。“你肯定觉得我在搞地主趣味是吧？”，他斜睨着眼对我说。

“这里怎么会什么也不是呢。你知道，我们有化石、



► 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厂的工业装置群，地热蒸汽柱在小盆地里久久移动，附近还有“宇宙线观测站”的装置群。



玄文、摊戏。还来过电影导演，去那些采石场拍电影。我并不能代表这个地方的地主趣味，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那种躲在女娲屁股底下说风凉话的人，想成为古人的人。但是，我对你这种有点讨厌的题材欲有意见”，C这样对我说。因为我这次回贵州，想接触一些三线厂矿，为了写一首叫《实践者》的诗。C认为，我也是那种对“地方题材”贪婪掠夺的人。“没有人真正写出过、拍出过三线，而我们这些本地人，认为只有通过漫长的经历和等待才可以说出它，可是，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的才能就荒废了。你们有才能，但你们更像是满世界到处跑的猎人，你们不是说出题材的本质，而是猎捕题材。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题材本身，但我们的语言太陈旧，我们有情感，但是被这种情感禁锢了”，C说。我一下子想起来，过去他在电子邮件中，表示过对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那个著名开头的欣赏，“我讨厌旅行，我恨旅行家……”

他拿起一块不到手掌大小的石头，递给我，让我仔细观察。我手里的石头沁凉，沉重，像一块不明金属矿石。我说，“这不会是一块陨石吧？”

“你能想象一个晚清虫洞吗？”，他好像存心要用一种故意的奇崛谈吐来影响我。

“您老继续说”，我觉得我必须谦逊得像8岁，他才会满意。

“你是个活宝，你跑回来写什么三线，无趣透顶。兄弟，我告诉你，你要写一条光绪年代的彗尾，我写不出来，这题材交给你了。你知道，我们务川的名字怎么来的？因为‘婺星坠地’，有了这个名字，建国后‘婺川’就被简化为‘务川’。我们是中国唯一因为流星得



名的地方。务川最近的一次陨石事件发生在光绪后期，县志上清楚记载了当时发生的时间和落地范围。你想象一下，那颗流星只是引起几个老太婆，发出一阵地方性的哭嚎之后就消灭了。你知道，我们那里，是一个父母们喜欢用哭丧的办法对忤逆的年轻人说话、实现控制欲的地方。我想去找到那次光绪年代陨石的残片，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去寻找过。只要找到几块，我就发财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个流星狂。兄弟，我来找陨石，然后你来写，别写什么三线、NGO了，那些事情没意思，你要写写一个在欠发达地区殒灭的天体。”

他停顿了一下，喝着酒。我知道他的演说还没有结束。

“我找这些石头都很不容易，你知道，我打着手电，在一股子矿物气味中走进那些山洞、天坑，就好比走向一个黑市宇宙。以前，我们一起去过煤矿，但我这样的经历比你多得多。兄弟，你好日子过惯了。我有时候，甚至还写那么两句诗，就写我找石头、探洞的经历。我念给你听听？……不，还是算了。”

他又喝了小半杯白酒，继续说：“现在我身体不行了，不玩危险的了。我知道，你看不上我写的东西。兄弟，你他妈的太过分了。不过我不生你的气，我就关心我的石头能卖多少钱，你知道不，一克陨石的价格远胜过黄金。我给你看的那块，我切下了一点，送到省地质科学院去检验。他们太慢了，这么久还没回话。我坚信这是块陨石，你仔细看看，它有那种银色的，只有陨石才有的井状条纹。”

我感到，我的大脑也开始像陨石那样遍布井状条纹，可能我也开始醉了。



“你这些年到处跑，也没见你壮实一些。别看现在科技发达，人心还是缓慢的，我们那里仍然有原始部落的对身体力量的崇拜心理。我告诉你，你这种瘦弱的体型，在我们那里找不到老婆。你下一个地方去哪里？”，C问我。

“蒙古”，但我知道他接下来会怎么说。不出我所料，他立刻逮到把柄似地说，“哈哈，你这么瘦，去蒙古也不怕被人揍。‘我厌倦旅行……我恨旅行家’——”，他得意洋洋、带着对我的故意挑衅背诵着。

“我们不像你，我们要带着一种家传的奴性去生活，我不像你那样，读那些书，做那些事，我可以对进步不在乎。我认为，只要可以挣到足够的钱，我就可以在山地里修个大房子，对，就是你说的地主思维。但你总得回来，看看我们这些老得一年不如一年的人，这些你看不起的老地主，都是你的兄长。什么时候你再回来，我带你去看看我们贵州的巨型梯田，并不比云南差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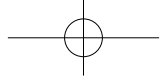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C的酒越喝越多，他的酒量是在陪酒生涯中练成的，前天，他的同事就因为酒精中毒住院。他正在参加一个干部下乡蹲点的项目，因为地点不远，也因为周末，再加上我回来，他就溜回来呆一天。

C第二天还要匆匆赶回岗位，继续陪上司。以后我们也会很少联系。虽然我答应他，去蒙古时，帮他看看那里的矿石。他坚信他的石头来自外太空，会让他发一大笔财，然后在贵阳旁边的乡下找块地方，盖一座大房子，安度余生。回到住处后，我做了一些混乱的梦，觉得整个天空都在锤击我，醒来后再也无法入睡，酒喝多了使我口干舌燥。我起来想写点什么，忽然想起过去做过的一个梦。



那是在青海，因为工作，我一周时间里都在青藏铁路的物流点和一些工厂家属区活动。一个夜里，我梦见一个工程师那样的老人，好像经历过文革。他的房间局促，但很整洁。他一直在说话，谈吐敏捷独到，我看不到他的容貌。他递给我一本很薄的书，我打开，里面散文与诗体相杂，封面是简朴单纯的天蓝色，印着三个宋体字：“穹窿史”。

我衷心希望 C 的石头会成为他的天外横财。我想，我要把 C 和他的民族，把关岭这个地球的大墓场，也把 C 酷爱的流星，写成一个也许我自己也不理解其意义的故事，名字就叫《穹窿史》。



● 位于西藏林芝八一派镇的雅鲁藏布江渡口，木材车、村民进出等都依靠摆渡。如今这里已经修建了跨江的大桥。



波浪公路

离开格尔木，汉地道教的痕迹截止于昆仑山口。在这里，一条短短的神道通向道观“无极龙凤宫”。昆仑山下，人们立起一排黑色立柱，柱面用金字镌刻《道德经》全文，高大、阔气而突兀。

由于附近的藏族牧民经常来朝拜，道观门口出现了玛尼堆。有趣的是，神道上还矗立着一尊姜子牙石像，注视着青藏公路与铁路的方向，神态严肃，左手持打神鞭，右手持杏黄旗。在《封神演义》中，打神鞭长三尺六寸五分，有二十一节，每一节有四道符印。杏黄旗的正名则唤作“中央戊己之旗”。中国上古神话里，代表天下五个方位的五面神奇旗帜中，它代表中央土地，因此是土黄色，也是道教的尊贵神器。两件法宝的用处，尤其后者，正是对漫漫征途上未知力量的防御与收服。

青藏高原遍布永久性冻土，使公路地基活动频繁，整体呈波浪状无序运动。每年5月气候还暖，冻土开始融化渗水，到6、7月份翻浆严重，道路膨胀和空心，入秋后又开始收缩。典型的莫过于翻越唐古拉山口的路



段，最为野性难驯，铺好的柏油路面一段时间以后就在扭曲翻浆中面目全非，人们干脆一直不为它铺设柏油路面。在冻土问题发作频繁的季节，道班工人需要连续数月在户外作业，他们与这条公路的关系像医生与皮肤病人。

为了维系青藏公路的物理稳定性，人们研制出一些操心的防护办法。还在2002年5月，青藏公路整治改建，以保证青藏铁路建设中物资机械设备的进场。正是在这次改建工程中，为了稳定冻土地基，第一次对青藏公路使用热棒技术。我们也不时经过一个个插满恒温热棒装置的路段，显示这里的冻土问题比较集中。在热棒阵列中穿过，令人想起针灸。不过，恒温热棒的成本高昂，并不能普及到青藏公路全程。

青藏公路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公路，对这条道路的管理体系化而严密，但它的地基却是最不可控的因素。

在青藏公路上，我们常常需要停留在各个不同目的、学科的科研站点。经过五道梁的风力观测站和沱沱河的水文站后，我的司机对我说，这一路，我们堪称金、木、水、火、土都齐了。在风火山，建立于2002年的“中科院五道梁冻土实验基地”，负责风火山口以北13.5公里的冻土试验段。2002年建站至今，甘肃人老朱一直在这里工作，平均6、7个月回一次在甘肃的家。他的睡眠质量一直糟糕，感到体质不如从前。他开始考虑改行，回到家人身边。谈话中他表情沧桑，但我并没有看到一丝厌倦之色。除了检测冻土，冻土观测站也负责气象观测。令我大感兴趣的是，这里最著名的自然现象是雷电。

风火山口一带是有名的雷电多发区，每年6月到9



月雨季期间，闪电密集的时候，观测站的建筑随之颤动，低空闪电会像火球一样，在对面的山丘上狂野滚动。整个青藏铁路沿线，每年夏季，日均闪电会达到 7600 余次。

在我第二次到达（第一次是 2009 年冬天）这座观测站的下午，一批沱沱河的藏族牧民驾驶摩托经过，来这里喝茶聊天。他们是常客，路过这里必然来停留。一定程度上，观测站是附近牧民的一处公共空间。远离公路线的牧民往往不会说汉语，住在公路附近的则普遍汉语纯熟。逢年过节，牧民们会给观测站送来新鲜羊肉，有的出手阔绰，一送就是几头宰好的全羊。

“你们搞写作的，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其实不错，听听风，还有奶茶和羊肉，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球形闪电。”——老朱的提议让我心动，我已经浮想联翩：也许我可以把闪电科学的语言用于新的写作。一次，球形闪电在冻土原野上流窜，观测站里的汉族人员与做客的藏族牧民一同看得发怔。老朱说起这个很兴奋，“不论厨子、牧民还是我们几个人，当时没人恐惧，那非常壮观”。

在老朱整洁的办公室兼宿舍里，墙上挂着一幅青藏高原一年的闪电图表，两幅分别为青海和西藏的全境地图，一柄藏刀，一张红色的楚玛尔河的照片。办公桌上的台式电脑边，放着几本历史书，文白对照本《史记》，甚至还有一本藏传佛教方面的书，这是一种微小的个人知识体系。老朱喜欢豪饮，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会遇到一番酒气蓬勃的高谈阔论，而且也是我听到过最有趣的酒话之一。

“做人得提前想好，你是做边缘论者还是君主论者，



● 大地上的工作者们：上图青藏公路上安装冻土恒温热棒的工人；左下图羊八井的地热工厂；右下图沱沱河的水文工作者。



就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路线”，老朱有点没头没尾地说，貌似他身体里积压了诸多块垒。

老朱有一点愤世嫉俗者的那种笼统武断，喜欢有反文化意气的言行。他说：“很多人从不反思，不过，我喜欢他们的粗线条！而且我也不！”。他好像很久没和人随便侃过这些，每句话之间没有明显逻辑，不过，他好像也满不在乎，反正和我这个“有文化的人”瞎喝一通酒，第二天就相忘于江湖。“如果不是因为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愿意呆在这里”，他说。

年轻时，大学毕业的他曾经把冻土高原当作他的理想国。随着时间消逝，容易失眠的他已经忘记了早年的雄心。那时候，他想写一篇关于冻土高原的“突破性论文”，甚至还爱好过几天“西方哲学”。“那时候，我们都是些穷凶极恶地夸奖自己的人，互相也表扬得不得了，我们可以整天胡扯，但现在我和老同学见面，什么话也没有。”

我到达的这天，天气阴冷。窗外的风剧烈而坚硬，听着老朱一句句突兀的话，我们头顶的铁皮屋顶不时震动。天空没有阳光，太阳有时在垂得很低的云层里苍白艰难地显露一会儿。这种气候加剧了缺氧，在青藏高原，含氧量只有内地的一半。仿佛，天空是一团令眼球紧张的白内障，也仿佛只要眼睛顶住压力，抬头就能看见生涩的未来。

老朱对我说：“你这代人嘛，没吃过苦，你们不像我们，我们不知道那么多书上的东西也很厉害。你们应该看看罗素说的话，治疗你们的药方，‘就是去劳动’”，说出这话，他有点洋洋得意。



我很难反对他的话，我不想用反驳扫他的兴。尽管在我看来，这也是人类的一种套话。而且，罗素本人终生在象牙塔里过得很舒舒服服。我回想起，在2009年同样的旅程里，我与一位长者在格尔木的谈话。这位打算在晚年“从英文阅读西方哲学”（其原话）的可敬长者，同样提到罗素。在另一篇文字里，我记录过那次寒冷夜晚的谈话。但是，老朱这类人的可爱与放肆，带给我的却是另一种体验，仿佛那个有着退休老年人呼吸的格尔木罗素，在这里又道班工人化了。提到罗素显然有点尴尬，与此刻的环境相差太远，老朱自己先解嘲地笑起来了。我们没有谁想继续这个话题。老朱坦白对我说，如果重新选择，他会做公务员。

“有时，我也会想想，我们的经历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目的呢？好像我们一事无成，事实上，我们也做过各种小小的，个人的努力。不过，我这种人早就过时了”，听到这里，我很希望老朱放下他的冻土和闪电，回到甘肃妻儿身边，去过他的平凡中年生活，也许还能搞搞义务科普，如果有哪个中学心血来潮，愿意邀请他这位坚守过青藏高原的科学工作者。那也许是同很多中国男人一样沉默的中年生活，不过，反正在这里的大部分时光中，他已经习惯了沉默。

我想，老朱所说的“努力”就像一种小心翼翼的摆动。但一种更粗壮的摆动仿佛来自人生本身，它是一种挥舞，又是一种鞭打。也像这条难以驯化的波浪公路，在它的鞭打下，人是谷粒，也是陀螺。

“人活着用不着很多才能，我越来越明白这个，不过，这正好也是对人的挑战，没有才能地活。”——他的原话更混乱一些，不过基本如此——他的逻辑让我有



点意外。接下来他的话饶有趣味，“你们这些人，你们既然有那么多想法，那么，能不能在冻土上种新东西？不能吧？你们不行。”

“现在的电视电影都没啥意思，还是过去的故事好”，于是接下来，老朱给我讲了几个据他说流传在可可西里的关于人和动物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雷同，或者是狼跟人跟了几天，或者是以为死了又死不了的狗，很久以后突然出现在主人家。我们聊天时，不时有藏族人进来坐坐，看看他，又好奇地注视一会儿我，然后觉得啥也听不懂，喝上两杯啤酒后消失。在老朱讲述关于动物的大同小异的段子时，他们会附和几句。

在青藏公路上可以看到光波宽广的日落。可可西里的一个傍晚，日落使青藏铁路的铁轨反射着强光。路过的货运卡车缩小成一个黑点，从巨大的太阳前面穿过。同伴小魏谈起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一本他喜欢的书。在书中，作者用整整一个章节来记述一次海上日落。当时我们不知道，正是到达可可西里的这一天，各大网络媒体公布了一则讣告：列维·斯特劳斯于当日逝世。



● 在横道河子小镇一角，中东铁路机车库空寂得像一座难以名状的近代遗迹。它不被人需要，作为旅游景点也少有人知。给人的错觉是，这是一座被人遗忘的教堂。



铁路的图案

在一篇名叫《亚欧铁路》的小说里，我虚构了一个名叫孙武的铁路工程师，他在呼伦贝尔主持连接亚欧大陆的铁路工程。铁路由两个地点同时开工，向中间对接。可是，两条铁路并没有对接上，就像米开朗基罗壁画《创世纪》中的耶和华与亚当朝对方伸出食指，却彼此碰歪了方向。像两个盲人，在亚洲高原上用食指触摸，但彼此错过了。

小说中，出生在青海的孙武对一个从蒙古归来的旅行者——也是他的故友——指点他的图纸，在这张横长三米、竖长约两米的牛皮纸上画着四个圆环，跨越蒙、俄、中、中亚五国的大部分亚洲高原地区——孙武说，这就是他构想的亚欧环形铁路网。随着时间过去，他的图纸也越画越大，像一张相反的巴尔扎克式“驴皮”，也越来越近于荒谬。在他因渎职承担法律责任之后，他的那位朋友成为一名策展人，经出狱后的孙武同意，把这张地图放入了某个文献展览。

这是有关一条错误的铁路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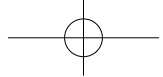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力量的故事。因为愤世嫉俗的孙武喜欢抱怨环境中缺乏力量，于是朋友和他一起探讨，人们所说的“力量”意味着什么。小说结束在呼伦湖边，离这里不远的满洲里，也是呼伦贝尔大地上的物流枢纽点，中东铁路连接中国与俄罗斯，20世纪初，高尔察克也正是由此潜入西伯利亚，试图建立复国力量。在呼伦湖边，孙武最后一次对他的朋友讲解那幅大而无当的图纸，它像一幅中世纪某个狂想家，某个偏执的达芬奇的精确而又不可实现的工程图画。在飓风中，图纸被风撕碎，在两个朋友的周围和头顶狂乱地飞动。由于风太大，两个人的眼睛无法长期睁开，无可奈何地看着图纸被风带走。昏黄的天空犹如一个暴烈大脑的内部，图纸碎片在其中虚弱地颤动，很快被卷入更高空的沙尘，孙武和他的朋友看着那些碎片，像看着四分五裂的思想。

这个故事在我大脑中留存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写好它。经过一些时间，它逐渐演变成了另一个故事，并被写入我的一部诗剧中。在尝试写下这些故事之前，我想，我需要一次旅行，就像孙武的那个朋友一样，去一次东北亚，看看中东铁路及其相关的事物。我还带着从小林正树的电影《人间的条件》中得到关于东北空间和早期工业气质的印象，在那部伟大的电影里，铁路承载着东北亚痛苦而沉寂的历史。

2012年7月，我和朋友一起开车周游东北三省和呼伦贝尔地区。但我第一次去东北的时间更早，而且是在典型的东北大雪中，前往牡丹江附近的白桦山林、小镇、镜泊湖和渤海国遗址。

我对中东铁路的知识并不丰富。中东铁路是“中



● 中东机车库外观，冬天与春天时不同的样子。



国东方铁路”的简称，亦作“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沙俄为控制远东在中国领土上修建。这些一战时期的俄罗斯人，从探险家、海洋学家和矿物学家，纷纷成为晚期帝国的军政主干力量，他们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早期的现代城市规划，并计划永久占据通向大洋流域的港口。之前，我读过一位同时代诗人用它为标题写的一本诗集《中东铁路》，那本诗集中充斥着忧郁的双关语、从早期工业时代的晨昏和乌云中提炼出的警句，并且也以一个旅行者的视角写成。铁路像一幅若隐若现的肖像，像一个阿兹特克人在大地上绘制的图案，像一个谜，承载着诗中的一个个站台和视点，也承载着诗行本身。

在横道河子小镇一角，中东铁路机车库空寂得像一座难以名状的近代遗迹。在几次东北旅行途中，它都是我最喜欢的建筑，以致每次路过牡丹江都要去看看它。第一次来到横道河子时，这座明黄色的俄罗斯风格小镇像一幅失而复得的木版画，小镇里的东正教堂内，还悬挂着安德烈·卢布廖夫壁画的复制品，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最初是在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中知道它。在这里，东正教的信仰者还需要这座绿色的木制房屋。但中东铁路机车库更为沉寂、不被人需要，作为旅游景点也少有人知——它是中东铁路东起绥芬河、西至满洲里的中心站，也是通向哈尔滨的必经之路，一直使用到1990年代。

机车库内部，布满锈迹的金属支架支撑着斑驳损坏的墙壁和房顶，行走其中，回声清晰深远，偶有飞鸟因人的进入仓促飞离。有时，给人的错觉是，这是一座被人遗忘的教堂。在呵气成冰的空气里，机车库的地面结起一层冰，反射着阳光。而我第二次去那里



时，地面已长出了青草，从破损的墙壁射入的光线之下，这些透光的青草光谱一般排列出渐变的图案。

横道河子这样因中东铁路而兴盛过的小镇，如今作为中东铁路建筑群，在东北还有三四处。这条过去的铁路也塑造了牡丹江人的生活记忆。在牡丹江，朋友的一直从事铁路工作的父亲对我说，“铁路曾经是最好的工作”，这种旧时代的质朴自豪感也许也是孙武那样的人所理解的“力量”的要素之一，机器的振荡和空间的开辟，使他们永远留在了那个由质朴的、庞大的物理力量所推动的时代，很难再进入这个由更复杂、虚幻的技术创造的世纪。

峥嵘、敏感的东北亚，依然是一个猛犸象般巨大而陌生的谜。它意味着启示录般的工业时代、殖民地历史、多元的地貌，以及一系列渤海国这样的消失的国度。“东北一直在影响和供应中国内陆，但它没有被真正理解过”，我的一位生活在广州的满族朋友这样说。但不只是东北，也许我们也没有“真正理解”过内陆以外的所有边疆，那些我们生活惯性以外的空间，曾经产生的各种庞大力量的冲撞，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在我的故事中，孙武希望用一个铁路网络来完成他想连接那些庞大力量的愿望，他希望通过这个铁路网络，可以重组人们的活动空间、催生新的城市、建立新的物流点。孙武是个物流迷。

中东铁路与青藏铁路也许在未来，会真的把青藏高原和远东林地连接起来。而在现实中，亚欧大陆桥确实是一桩备受关注的項目。

2010年，我曾沿着青藏线逐站走访。在青藏线上，狂暴的风沙时常充斥在沿途的谈话中，铁路线与公路



/042

大地报告——另一种中国行纪





- 西藏羊八井过去时代的大礼堂，现在已经荒废，有时成为电影拍摄的取景地。而横道河子的东正教堂及民居还有着典型的俄罗斯风格。



线时时交错的景象，很像是 DNA 的双螺旋结构。我认识了一些刚开始适应铁路的人。对于雁石坪——从这里开始明显有了藏族生活的气氛——“完全小学”的教师们而言，生活依然受到环境的种种限制，他们希望开通不久的青藏铁路会为他们带来新的机会。家在拉萨的教师阿希毕业于咸阳民院后，分配到这里工作，每有假期回拉萨，他只能搭不定时路过的商品车（即送往拉萨的新车）。这并不随时能搭到，于是常常就是虽然有假期，但却没有车。青藏铁路开通后，班车就取消了，“完全小学”的几位家在拉萨或西宁的青年教师们最渴望的，就是雁石坪将来能有一座火车站，而不用去沱沱河乘坐火车。我试图从他们每个人的神情和语气中寻找青海人孙武的形象。我对阿希提到小说里的铁路故事，他的反应严肃而诚实，他说：“在中国，不同地方不一致的生活，构成了另一种地形落差”。

但我的朋友们常常对我说起的是另一条铁路。他们每年从西藏出发，或者离开某个内陆城市，前往印度，为印度铁路的各种无厘头的传奇增添新的内容。中东铁路，青藏铁路，印度铁路——这是亚洲的三种铁路，也是孙武的世界。

我还未去过印度，所以在朋友们眼中，我并不能算是个像样的旅行者。去年，我受一个中印文化交流组织的邀约，写作一篇重新理解泰戈尔的文章，起因是学者帕沙·查特吉对泰戈尔小说《眼中沙》的戏剧改编。在这个剧本中，铁路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在英国 BBC 拍摄的纪录片《印度铁路》中，一位铁路管理官员声称，英国人为印度留下了两件东西：行政系统与铁路系统。继而，在这部简单人文主义的纪



录片中，铁路被作为印度的传统给予怀旧性的叙述。它的一些部分（大吉岭路段），也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但人们起初对铁路系统的心态是排斥和恐惧的，认为它使殖民者对次大陆的控制与掠夺，变得更加容易和有效率了。但同时，铁路的确又实现了各邦之间的联络，并促使了一个移动社会——铁路社会的产生，这一移动公共空间深深进入了印度文学，也出现在吉卜林等西方作家的写作中。

帕沙·查特吉的剧本《眼中沙》中一些美丽的时刻，也是这出戏剧的一个简洁、微弱的高潮，与铁路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火车站的喧嚣中，伴着蒸汽机和汽笛的声音，莫亨德罗和比诺迪妮的声音从舞台后方传来）

莫亨德罗：比诺，别再犯愁了，我在这儿。

比诺迪妮：什么？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莫亨德罗：我过一会儿再跟你讲。你要去哪儿？别怕，我会跟你在一起的。

比诺迪妮：我还没有想好要去哪里。

莫亨德罗：那么让我们先离开这儿，找个地方暂时住下。随后我会把我的行李从家里搬出来。

比诺迪妮：不，为什么我们不去西部？我们一起去西部的某个地方如何？

莫亨德罗：西部？西部哪里？

比诺迪妮：哦，阿拉哈巴德，勒克瑙，德里，有很多地方可去。

莫亨德罗：你真想去？当真？

比诺迪妮：当真。

莫亨德罗：那么你在这里再待一会儿好吗？我去取点钱。我们可以坐下午的火车。

比诺迪妮：好的，就这么定了。



稍后，整个第八场，火车声不时打断和淹没一对私奔的情侣（也是两个“新青年”）的对话。对话地点是火车候车室。查特吉设计为：舞台上看不见人，只有时时被火车声打断的谈话声——

（背景是火车头行驶的声音。从舞台后面能听见莫亨德罗和比诺迪妮的声音）

莫亨德罗：我们就在阿拉哈巴德下车怎么样？

比诺迪妮：好啊，就在阿拉哈巴德下吧。

莫亨德罗：然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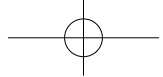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比诺迪妮：我们为什么不在阿拉哈巴德住上一段日子？租一个房子？

莫亨德罗：我想没问题。你想住多久？

比诺迪妮：喜欢就多住一阵子，不喜欢的话，我们就再去别的地方。

莫亨德罗：无论你想去哪里，我都带你去。一切都由我都来安排。比诺，现在你是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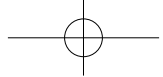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铁路之于彼时印度叙事文学，一如巴黎下水道系统之于雨果。在泰戈尔的另一篇小说《饥饿的石头》中，一处古代建筑废墟有了自我意识，石头残片通过吸取游客的历史想象，幻化出一座古代繁华宫殿的景象，置身其中的游客（一个穆斯林）为自己身穿英式服装而羞愧——他在返回加尔各答的列车上一口莎士比亚腔，称呼他的听众为“霍拉旭”，并向后者讲述了他的奇遇。列车一度是人们相识的地方。今天，它依然意味着一个大陆心电图般的物流世界。但我总是想起中东铁路，一条被遗忘的铁路，在我的故事中，它逐渐和孙武那条错误的铁路重合在一起。泰戈尔小说中的古代建筑废墟，也和横道河子的中东铁路机车库重合在一起，不过，后者并不具有那样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转移到了孙武那张越画越大的图纸上，



那幅荒谬而细致的工程图，那幅铁路大地的肖像，只是被我们这个实现了的世界取代了的诸多可能的世界之一，也是我们这个世界内在的、若隐若现的疯狂。



● 中东铁路机车库已荒废，导演徐克执导的电影《智取威虎山》曾在此取景。



● 昭苏。一个种马场的马厩，大门外的草原上是外来的各地骑手在这里训练的马道。这个马场不仅为职业赛马手提供训练场地，也经营骑手们带来的半血马与当地马配种的业务。



满洲里—新巴尔虎右旗

骁勇的人

从满洲里前往新巴尔虎右旗的路上，海清一边开车，一边说“中国曾经北边是头，南边是屁股。开埠以后，南边是头，北边是屁股。对不对？”

我告诉海清，古罗马人卢奇安写的一个故事里，海神抱怨他的身体动荡不定，他从来搞不清楚自己哪是头，哪是屁股。因此波塞冬说这些话时，也可能是他的屁股在说话。也许大家都是屁股，但时代中某一阶段的力量使屁股们产生了自己是头的幻觉。

新巴尔虎右旗坐落在满洲里的南面，俗称西旗，离满洲里只有一个半小时车程。海清和老李这些在西旗土生土长的蒙古人，并不认可满洲里这座陆港在这片草原上的重要性。他们更认同距离不远的蒙古国。每周，西旗大街上都会出现从蒙古国专程来的购物车，车型有着 20 世纪 50 年代的苏联风格。蒙古国的箭手也时常来与西旗人切磋，前者身躯巍峨，而西



旗人相形之下却矮小得多。可是，体型并不突出的新巴尔虎人曾经是成吉思汗所信赖的近卫军，他们的身体灵巧有力，适合在马背上生活。

为了写诗剧《罗曼·冯·恩琴》和小说《亚欧铁路》，我有两次游历呼伦贝尔。我一直倾向于我所写的，是我去过的地方和看见过的事物。第一次到达呼伦贝尔，在前往西旗之前，我在满洲里市内的赆品市场匆匆购买了一盒包装诱人、徒有其表的廉价雪茄，海清和老李表示不屑。老李问：“这东西为啥叫个‘雪茄’？”徐志摩（我厌弃的诗人之一）在与泰戈尔的对话中为它取了这个名字，讲解这个典故算是令我得到了一些尊敬。几天来，我无法在体能、精力和酒量上被这些新巴尔虎蒙古人认可，好像自己属于劣等种类。我睡眠不足，戴着眼镜，形象柔弱，兜里还揣着一本书，翻开居然还是诗，这一切使我有点可笑。过去的生活中我常常失眠，但这几天每天凌晨两点，我必须坐上他们的车，去草原深处观看一种至为狂野的民间赛马。

极度困倦的我只好抽我的赆品雪茄，一嘴生硬的烟雾，仿佛吸嗅着这片土地高傲而又劣质的一面，想借此克制睡意，好减少这几个快活的蒙古人对我的奚落。

呼伦贝尔民间赛马，是我见过的最粗犷的赛马形式。2011年在新疆伊犁地区的马场、之后又在木垒县的马厰里我与骑手共处了一个月，和他们一起给生病的马匹打针，拍摄他们赛马竞技。与呼伦贝尔相比，那已经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比赛。不断有中国的马主们放弃内蒙古，在新疆伊犁地区找到价格实惠而且气



候与土地条件理想的草场，在那里繁育和培训他们需要的马匹。整个风沙活跃的内蒙古，呼伦贝尔是植被最为可观的草原。

在太阳升起来之前，人们已经聚集在蚊子活跃的草原上。呼伦贝尔的蚊子凶猛硕大，像一群群低空强盗，在我的头顶约半米处聚集成一个令人烦恼的球体。在北洋时代，张作霖的士兵就被这样的蚊子叮咬致死，使“东北王”的蒙古之征半途而废。

马匹还没有集结起来之前，草原上已经停满了汽车。好奇而又平静的蒙古人们从车门而不是马背上出现，彼此用车灯致意，灯光形成的光束在凌晨的夜空中晃动。所有人都精神十足，只有我是唯一疲倦到几近痴呆的人。我只想找一辆车继续睡觉，不理睬面孔闪耀着百夫长般自豪红光的司机对我的一通嘲笑。很快，就要升起的太阳在草原上放射出宽阔深远的光波，严肃而驯顺的马群慢慢在地平线上出现，马的眼睛反射着太阳光和人们手机拍摄时的闪光，并不眨动。所有的骑手都是少年，因为他们体重最轻，又刚好到了双腿有力量夹稳马肚子的年纪。他们精警，轻捷。当他们策马轻轻走过我面前时，我也感到，这会儿去睡觉是可耻的。我只好找一瓶水冲洗了脸和头，努力让草原黎明的冷空气进入肺部，点一支烟。

当所有的少年骑手开始奔跑时，所有的车也随之发动了。我才知道，呼伦贝尔赛马同时也是飚车。

“老王，还睡呢！别睡啦！”，海清一边开车，一边朝我大喝一声，又把头探出车窗继续大呼小叫。但我发现他并不是乱叫一通，而是用呼啸与疾奔中的骑手交流。其他司机也在奔驰中与认识的骑手相互呼啸，



● 木垒。一个在赛马场上骑车闲逛的哈萨克少年，他对自行车的熟悉超过马背。当地的哈萨克族人和汉族人一起等待参加当地的娱乐集会。



● 上图为可可托海镇街道上闲逛的宠物火鸡。这也是进入可可托海的唯一主要通道，沿着它分布着哈萨克族人、维吾尔族人、回族人 and 汉族人的生活社区。下图为可可托海3号矿坑内部。每天，人们仍然在这个著名的矿坑里开采剩余的石英。



海清不忘告诉我一句，骑手正是这家人的孩子。人们的嘶声短促，目的明确。车群在马群两侧，在没有道路的草皮上疾驰。我时不时看到有的车辆在大地上弹起又落下，但并没有车出事。这些野生动物般的汽车在高速行驶中，总能避开猛然出现的土坑与草原网围栏。有时，我感到车辆就要震碎，好像撞到了草原的骨骼，大地的牙齿会立刻把车嚼断。

在海清的车上，老李一直谦逊地坐在我身边。前一天，绰号“杀手”的老李为我们宰羊。我以为他会带来一系列大小刀具，但他只是从松垮的裤子里摸出一把小刀。他牵来羊，缚住它，念完经文，在它的前胸轻轻划开一个口，把手伸进去准确地掐断气管，井然有序地肢解，清理并码好整套内脏器官，把皮揭下来打包似地卷成一团。羊血全部精确地集中在胸腔里，女人们迅速舀干制作血肠。整个过程仅用了短短一个小时，地上只沾了一点血。“杀手”有些害羞地对我说，地上应该没有血迹。我曾在宁夏海原、新疆喀什、青海沱沱河见过人们杀羊，相比蒙古人干净、整饬的手艺全都显得混乱拖沓。

赛车之后的下午我去看海清和“杀手”一千人射箭。可是我拉不开海清的弓，这让我又一次感到挫败。我有点嫉妒这些尚武的蒙古人。当我和他们站在呼伦湖边，看着这座荒蛮似海的大湖，我对海清说，西湖边长大的人，怎么可能是呼伦湖边长大的人的对手。海清说，今天已经不存在对手，只有混乱的头和屁股，一切都是游戏，呼伦贝尔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游戏之地，以保存他们那被体育运动简化了的骁勇。



在北京，我并不认同一些蒙古人的言行。一次婚礼上，蒙古男方的朋友上台亢奋而又礼貌地说，他要唱一首歌给汉族朋友听。随即，他以嘹亮的歌喉唱起电视剧《康熙大帝》的主题歌《向天再借五百年》。他说，这是他这个蒙古人的心声。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康熙正是消灭了代表古代蒙古的最后一支力量“准噶尔部”的人。

我唯一有能力和这些新巴尔虎蒙古人交流的是喝酒，虽然我的酒量无法与之相比。他们从天亮第一顿饭开始喝，喝到深夜。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我跟随海清进入一个又一个帐篷，和不同的人称兄道弟、喝着一顿又一顿的酒。然后睡不到两个小时，就要起来和他们去看赛马，好像呼伦贝尔草原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疯子。看完赛马后又加入到一群酒鬼中。在呼伦贝尔草原东部，大兴安岭下的鄂伦春人的雷神只是一条瘦小的怪鱼。鄂伦春人也不像蒙古人那般豪饮。我看过一篇关于外蒙古人沉浸于中国白酒的报道，似乎，这个民族在酒精中找回了他们的战马。现代蒙古国的“民主之父”卓力格在就任总理之前，却荒诞地死于两名入室窃贼之手，后者只拿走了卓力格冰箱中的两瓶醋。有人说，两个毛贼其实是刺客。但更多人说，这肯定是两个酒鬼，还以为拿走的是两瓶酒。人们为卓力格感到不甘心，认为他就像张翼德死于两个宵小之手。

我想起雷神托尔与草原上的巨人竞技的故事。巨人们先是对托尔的各项能力数番试探，最后的项目是酒量。巨人递给托尔的酒杯是无底的，连着海洋。可是，我并不是那位差点喝光海洋，令巨人们胆寒的英雄。我走出酒气冲天的帐篷，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从帐篷往西不远，就是蒙古国。每年春季，从事草原治理的工作人员要从西旗出发，沿着边境维护一条数公里宽的防火隔离带。蒙古国边境的草种必须每年烧荒一次，才能良好生长。由于风从蒙古国往中国方向吹，火焰常常飘到内蒙古境内。工作人员必须花费几个月的路程，清除防火隔离带的野草。

由我所在的帐篷往北不远，是中俄边境的口岸城市满洲里。外蒙古的扫货客只到西旗采购，绝少出现在只有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满洲里。而俄罗斯掮客们也仅仅在满洲里搜寻，绝不会来西旗看看。满洲里，这个好像错置在呼伦贝尔原野上的赝品城市，有些被新巴尔虎蒙古人蔑视。海清不断问我：“满洲里有啥意思呢，全是假货”。这个可以17个小时就从呼伦贝尔开车到北京的人，如无公事，绝不愿花一个半小时车程去满洲里逛逛。

满洲里的普希金

2012年我经由海拉尔和诺门罕战役遗址，第二次到达满洲里。我把小说《亚欧铁路》的主要地点放在这里。小说开头如下——

“迄今我见过不下数十位风格各异的牟其中。一次，在雅鲁藏布江边，一员中科院退休的老头向我不安地阐述‘中印必有一战’的必然性，因此，仍有必要对喜马拉雅山脉进行人工改造，毛泽东时代的地球观仍然具有一种隐藏起来的、刚愎的可行性，扰动着潜伏在这具老迈肉体里的建设欲。我望着他宽大的眼



镜，雅鲁藏布大峡谷水汽通道特有的巨大云柱，在他的眼镜片上缩小成一株袖珍的珊瑚。我想，广阔天地也正是这样在他眼中缩小。我问他对牟其中的看法，不出所料，他对后者的喜马拉雅猜想发表了一番多有保留的肯定，他说：‘它（指该想法）只是失之粗劣’，但接下来他说，这是一种必然的粗劣，一种中国粗劣，意味着我们在到达一个仅仅只属于我们的境界之前所必经的环节：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粗劣。在做记者的时间里，我从长者处收获的教益是，只要调整好心态，这种粗劣就会是一种才能。不可避免的是，我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我喜欢这些人，这些建设迷。”

——正是牟其中开发了满洲里。据说这位志在开发西伯利亚的狂想家，尽管身陷牢狱，在满洲里还拥有有一定面积的地皮。

在市区边的高地上，一座巨大的猛犸象雕塑边，可以看到这座草原城市林立的建筑尖顶。遍布满洲里的崭新明净的俄罗斯风格建筑，在挑剔的人眼里会被视为虚假的异国幻象。但是，在呼伦贝尔草原盛大、生动的天光之下，这些赝品建筑也获得了一种奇怪的真实性的。从这座山丘上也可以看到进出繁忙的国门。高尔察克正是由此潜回东西伯利亚，开始他那不会成功的复国事业。我的诗剧的主角，“白可汗”罗曼·冯·恩琴也曾在此活动，企图实现一个自18世纪以来不时有人提出、但从未实现的癫狂计划：把从东北、穿越蒙古、新疆和青海，直到西藏的整个内亚高原地带建立一个国家。这些人物最终只成为了远东的幻影。今天，“远东”这一陈旧词汇也不再被使用，代之以一个较为中性的词语：“东北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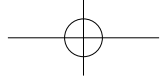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除了廉价呛鼻的雪茄，我在满洲里寻找另一件赝品。在所谓“俄罗斯风情公园”里，有一座等高复制的普希金雕像，站立在无人问津的一隅。

普希金写过一首短诗，关于他路过边境时，对亚洲大陆的“匆匆一瞥”。诗写得潦草而冷淡。此刻在我面前，这位满洲里的普希金，依然保持着他那告别海洋这“自由的元素”，回到不自由的内陆时的动作。雕像的基座已经残破，荒草摇曳，仿佛呼应着他的诗句那一瞥般的草率性。这座雕像好像会站在这里到末日，其间也不会再被修缮。它寒碜地站在这里，是一群可笑的复制品的成员，但却是中国境内仅有的两座普希金像的一座。当然，它无法与上海那座显赫、洋气的铜像相比。在这里，也许被草率的对待而非刻意维护，也是一种保存。

我并不反感在东北、内蒙古旅行中经过的所有这些赝品城市。它们都是变动中的图案。到达满洲里之前，我在重建的甘珠尔寺里看到一座沙绘坛城。它与过去我在西藏工作时，见到的萨迦派僧人制作的沙绘坛城遥相对应，使内亚高原的地理光谱在我脑海里联系为一体。沙绘坛城是一种卓绝的瞬间艺术。一幅用彩色沙砾制作而成的曼荼罗图案，在仪式结束后即被销毁，不予保存。一位拉萨僧人曾对我说，留存沙绘坛城是违背佛法的。但人们需要留下一幅沙绘坛城，来加持这座空洞、崭新的重建寺庙，赋予它持存的力量。蒙古人和汉族人都同意，在风沙渐盛的草原上，可能最终是沙，而不会是草叶成为呼伦贝尔的面孔。



● 左上图为旅顺俄军公墓；右上图为旅顺博物馆周边（靠山街一带）保存着完好的近代建筑群，其中大部分房屋依然有人居住；下图为诺门罕战役遗址的仿真坦克。



● 渤海边的盐场，位于河北唐山大清河。



盐湖的光

2005 年我写过一篇题目叫《盐湖的光》的冗长文字，满篇混乱的修辞。但文章写到的地点——新疆达坂城盐湖——以及一些叙事片段，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我需要逗留在盐湖城，撰写一篇关于盐湖工业和相关社区生活的文字，但在接近一年的类似工作之后（完成盐湖城的任务即可结束新疆生活，返回北京），由于疲劳、由于烦躁，我几近抵赖地推卸了主题，把文章写成了一篇非常个人化的散文。那几天，每天在盐湖边和太阳强光下步行，使大脑逐步进入一种游离现实、稍稍有些癫狂的状态。不过还好，我的住处是一家虽属国营但气氛亲和的旅馆，每天更换的被褥保持着家居风格的朴实清洁，晚上老板常诚邀我共享烩面、油炸花生米和啤酒，令我惊喜的是房间里居然还有一个可以泡澡的干净浴盆。这一切使我在傍晚后回归为一个正常人，第二天早晨再出门，去到盐湖边和太阳光下，继续做一个疯子，以记者身份在湖边某个工棚蹭一顿有砖茶、馒头和酱牛肉的午饭。有时我跑到盐湖里去游泳，在盐水里漂浮，越过有时灰色、有



时暗红的湖面眺望天山主峰——博格达峰的雪冠。

强劲的风力是盐湖产盐的必要条件。达坂城盐湖所在地是著名的风口，遍布大地的风车群一直蔓延到博格达峰下的宽广缓坡。在我到达不久前，发生过行进至此的列车被强风迫停的事件。玻璃被风击碎，人们用被子和军大衣遮住车窗，列车瘫痪数日后才恢复行驶。

空间仍残存着夜的气氛。只有我一个人在步行其上的道路，完全由盐筑成，横穿湖面，长度有20公里，车辆的反复碾压和风干使之坚硬。太阳的反光在宽阔多风的湖面蔓延，这个过程随着早晨过去越来越不容易察觉，因为亮光在变成没有过程的强光。我所在的湖滩上，满地的昆虫尸体由于被盐包裹，不会腐烂，还保持活着时的形状。石块、轮胎和废弃的机器也被盐裹满。由于空间广大，可以看到地表微微隆起。狂风充斥这个地区，我的四周波光粼粼。

当我环湖一天，返回住处时，大脑里阳光的热量还未消退，步行后的疲惫促使我一半兴奋、一半痴呆的脑袋里闪现着一些昏暗又阔大的事物。

少年时我曾幻想在“螺旋型防波堤”上步行，它坐落在另一面盐湖中，在同样强烈的日照下，盐水与化合物塑造了它锈蚀物一般的形态，它的白色和暗红色。今天它已经被淹没在盐湖内部，带着一种一次性，只有从空中才能看到它在水中隐约的螺旋形。它的建造者，艺术家 Robert Smithson 在 37 岁死于空难。

许多年前，我看到一幅打印出来的照片，一位摄影师在挪威北部一个位于北极圈的小岛上连续多天工



作，拍摄下极昼的太阳 360 度运行的全景：那是一条我看过后，一直留在我记忆中的弧线。以后我知道这类拍摄并不新鲜，但在第一次看到时，我被这种视野所吸引，对于我它既是全新又是熟悉的，我幻想，这也是在写作中可以做的事。以后我一直需要去看见和利用自然或现实环境中太阳的变化，太阳照射下事物的状况。我继续写作的原因可能是习惯，可能是虚荣，也可能是为了用语句再现对太阳的印象。在我记忆中存留的，太阳照射下的人工与自然环境，像一些露天剧场，来自现实，也来自抽象。其中有的来自新疆、青海和西藏阿里地区，来自拥有广阔荒漠和工业痕迹的地区，来自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盐湖。

那些天，太阳每天都粗野地照射着达坂城盐湖。有些东西，像散落的陨石碎块和无意义的反光刺激着我的头脑。我希望那些非人性的自然事物及其所在地，帮助我更新语言。在盐湖的那些天里，我产生了一种设想——并且在以后几年里磨炼成形——写一种对环境、场所和人的意识状态进行直接处理的诗体作品，并且具有戏剧性。因为写作使心智直接面对思想，不再顾虑间接性——因为写作是对思想进行的一次次拍摄，是对它的不懈和有序的逐帧曝光。我最终可以完成一种精神弧线，就像那张照片上的弧线。

但是，我总可以在傍晚，从这些步行中产生的抽象念头中返回，回到啤酒和浴盆，回到夜晚安静的盐湖城，倒满一杯乌苏啤酒，看看盐湖化工厂的烟囱在月光下的立体形状。也许因为那几天夜晚的盐湖城带给我的影响，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一个很旧的小城，城边有一条湍急的河，河面宽阔，我路过这里，居留到下雪。许多人去赶火车，在一间旧教室买



火车票。售票口是黑板旁边一个方形小窗，我很努力往前挤，把手困难地伸进去。太阳光很强烈，但同时又被局限在浓黑的云层缝隙中，火车在一种暗淡而广阔、难以名状的、仅仅属于现代中国的景色中行进。

2008年因为工作要求，我在西藏阿里地区旅行一个月。一路上我们经历由断续的柏油路、魔鬼牙齿般艰涩的砂石路——车辆行驶其上就像经受一次没有尽头的啃咬——以及完全不是道路的崎岖河床构成的综合路况。阿里的道路像一个无底洞，吸取人类的时间与精力。狮泉河的一个道路工作人员对我说：“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人力物力都花在了道路上。”人们想尽各种方法，维系阿里道路在复杂地理与自然气候环境中的耐用性，但依然捉襟见肘，同时，人也被自然环境与艰苦工作改造着外形。除生活、经济等必须原因外，人们需要在阿里全程修通公路，还有另一个考虑：这里的干旱荒漠化严重的地区亟需限制车辆可通行的范围，因为，脆弱的草皮已经不能承受无序的车辆通行带来的反复碾压与摩擦。

在拉孜至桑桑路段，公路筑建使这里暂时成为一个大工地。人们必须赶在雨季前，完成基本可通行路面的施工，因为这一路段是阿里的门户。有的施工点分布在高寒严酷的地区，工人帐篷外的火光，在广漠穷荒中闪烁。在一闪而过的时间中，过客们在车窗里看不清工人的面孔，但他们总会暂停工作，朝着车里的人笑。在阿里道路上，经过的人与路边的工人形成了一种默契：每当车辆驶过时，车里的人与车外的人会不约而同，互相招手致意。这是一种朴素的公路礼仪，车里的人感谢车外的人的劳动，车外的人则可以暂时打破一下在荒凉天地中的寂寞。由于坐在靠窗位



置，常常就由我负责打开车窗，招手回应远处山头上的人。在阿里的一路颠沛中，有时我胡思乱想：写作也需要成为一种综合路况。

这次旅行途中，我也经过了一系列无名的盐湖。这些孤独的盐湖罗列在旷野上，常常是阿里漫漫长途，路过的人们选择停留休息的地点。在这些盐湖边，不知道谁人从何时开始摆放第一块石头的玛尼堆，像沉默孤寂的道班工人，等着路过的人挥手致意。相比达坂城盐湖——以及更为盛大的茶卡盐湖——这些湖泊灰暗许多，不失美丽，但更为苍凉，就像荒凉本身的一张张面孔。在湖边行走，可以感受到它们的孱弱，似乎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在这贫瘠严酷的大地上干涸消失。有时，天黑前云层散去，天空平静深邃，在这些盐湖边停留，使我忘记我是一个内地来的人。

最近意外接触盐湖，是在渤海边。我们在唐山至秦皇岛的一段沿海公路上经过它。与其说是湖泊，实际上是一片宽广的被人工井状分割的工业产盐水域，是唐山大清河盐场的生产基地。发现它，是因为被远远出现在地平线上的白色金字塔状物体吸引，车向它开去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那是一排堆成山的盐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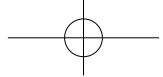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天气阴郁，这些圆锥形的盐山像巨人的砝码，在大地上反射着朦胧的太阳光，偶尔有鸟群凌空飞越它们。我的脚底本来因为踩过泥泞而沉重，在盐山上下走动一会儿后，鞋底变得异常干净轻松。沉寂的工业装置，有序分布在盐山周围，运输皮带积着雨水。我喜欢这些大型工业装置，它们似乎比我在城市中使用到的工具，更能唤起对人类能力的感受。在盐山附近，就是靠近海岸的一个个人工分割的产业水域。只



有海风充斥的广阔空间，促使人的说话声变轻，好像说话声大了会与这里的静寂相矛盾。可是，对于在这里工作的人，他们却因为常常需要互相远距离喊话而变得嗓门粗大。我们轻声细语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不惊动盐湖里栖息的白鹤和燕鸥群。在每年秋季，这一带是从地球另一边飞来的候鸟群迁徙路线上的休憩地点。

对于自然领域和工业设施并存的广阔空寂的空间，我一直怀有一种没有思考过原因的爱好。好像只有这种空间，能够使我过去二十年中的记忆和生活轨迹贯穿联系为一体，帮助几乎遗忘了的事物又重现在我脑海中。好像这种空间，具有一种其他经验和知识所不能替代的结构能力。我幻想在将来，做完一些事情后，可能会寻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去过平静的写作生活，这样的空间也能够帮助我选择、剔除有用和无用的东西。我想起在新疆、青海和西藏阿里地区看见过的那些盐湖，我意识到，它们其实也构成了大地上的另一条弧线，和那条我在太阳摄影师的挪威照片中看到的空中弧线相对应，仿佛是一种无声音乐的对位，也仿佛构成一种双螺旋，储存着已经被忘记的来自生活深处的信息，促使我不断地想要去写一种东西而不是另一种。

在过去二十年中，盐湖总有一种能力，使我偏离已有的现实计划和知识，使我接近幻想。我相信许多人都有一种中介性的工具，使他们接近幻想领域。我的工具是盐湖。这次在渤海边经过盐湖的旅行，使我想重写一篇名叫《盐湖的光》的文字。



1067

昨日的“脐点”



●如今，依然作为界河，陕西和山西平分壶口瀑布两岸的旅游生意。虽属冬季枯水期，壶口瀑布景观的说服力仍然绝对。酈道元称这来自洪荒的大河“以通中国污垢”。



昨日的“脐点”

我在夜间进入山西，由于能见度极低，汽车行驶缓慢。纯出于身体本能，虽然看不见周围环境，但可以感受到正在穿越一个庞大的山地空间。直到看见车窗外飘动的雾气并非河北的雾霾，而是山间的烟云时，我才意识到，我正在翻越太行山。过娘子关后再经阳泉煤矿、介休、昔阳、长治、太原武宿，沿途地名渐与大都直白粗俗的风格迥异。

政治思想史学者 E·沃格林创造了“脐点地区”这一词语，命名某一地区文化的集中发源地。在《城邦与秩序》中，他使用该词阐释希腊克里特岛等地的中心位置。过去，我曾在西藏冈仁波齐—玛旁雍错地区的工作中联想到这一命名。那段时期，长时间在阿里高原奔波颠沛，常常使我希望返回内地山川，像理解分布在犍陀罗通道的那些破碎的凤毛麟角——壁画、雕塑、残垣断壁——那样，理解汉语诸子的中原，那里也存留着伟大而又羸弱的碎片。

进入临汾地区后，尧、卫青、霍去病这些名字逐



一出现在沿途的地标之中，地貌的展开仿佛也启动了内在的记忆。由临汾至吉县沿途，黄土高原断面明晰，冬天使之更显古老。这也是谢阁兰、奥登、泰戈尔阅历过的大地，今天，我们这些沉浮在时代中的名实不辨的人，距离它们并不比外来者更近，且往往需要通过理解自己国家深处的事物，才能理解这些外来者。如果日本人未犯山西，泰戈尔的晚年可能会在晋祠附近度过。泰戈尔在《中国讲演录》的第一讲中——具有自我介绍性质——提到的第一位欧洲作者是海涅，其次是歌德《浮士德》。这段文字可以读作他对他所遭遇的印度年轻一代反对者的回应：

“我有幸遇到了一位来自德国的女传教士，便请求她帮助。我勤奋学习了好几个月，但是由于我的头脑相当灵活，而这并非什么好的品质，我能持之以恒。我具有那种危险的敏捷头脑，它只能助长人们过于轻易地猜测意思。我的老师认为我几乎已经掌握了这种语言，但这并不是真的。不过，我成功达到了目的，了解了海涅，犹如一个梦游者，轻而易举穿越着一条条未知的路。……然后我又尝试歌德，但那未免有些过于雄心勃勃。借助于我所学的一点点德文，我确实在通读《浮士德》。”

“我具有那种危险的敏捷头脑，它只能助长人们过于轻易地猜测意思”，可以作为持久有效的警句。在《中国讲演录》第一讲中，他向中国人揶揄自己的外貌：“你们之所以确信我是诗人，是因为我生有一嘴灰白的美髯”。但中国听众没有准备好的是，泰戈尔是携带着沉重的被反对来到中国，这也是《中国讲演录》第一讲中自我解释性的表达的背景，他希望我们对他所受到的争议，具有一种前提性质的了解：他



之所以受到争议，是因为他来自一个正在发生宗教、文学和政治的三重变革的国度。这几乎是一个君主的告白——他告诉我们：他，产生自三大时代运动。很难想象萧伯纳（不到十年后受邀访问中国）会这样介绍自己。我们对他所负载的来自三种力量的反对，也毫无准备。我们主观认为，他要在我们这里卸下一种新鸦片。泰戈尔携带着年轻人的反对、以及和激进民族主义者不一致的观点，来到中国人面前，却正好遭遇了中国大地上的一轮浪潮：新文化运动。于是在中国，他又经历了一次残酷的被反对。鲁迅和闻一多近乎癫狂地抵制了他。陪伴在他身边的一对儿活宝（徐志摩与林徽因）也给了左派攻击者漫画化的理由，两个阵营展开芜杂并时而低俗的争吵。闻一多——英诗崇拜者和形式主义者——亟需为中文诗寻找新的格律，对散文化的泰戈尔在汉语里下达逐客令。有些奇特的是，只有军阀阎锡山感念这个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印度克莱门。

耄耋之年的泰戈尔对中国之旅感到疲惫和失望，逗留在北京，准备稍事休整之后由大连出海，前往日本，继续寻求关于“亚洲共同体”的对话者。身旁的人告诉他，也许 he 可以去山西。建议者认为，山西尚能看到中国文化在本土生活中的存续。于是诗人动身，翻越太行山，进入晋地，阎锡山执弟子礼迎接了他。泰戈尔提到，是否可以在山西寻求一个地方，作为他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验基地，阎锡山当即应允，许诺给泰戈尔晋祠附近的一块区域。于是泰戈尔放弃了去日本的计划，返回印度，准备筹款实施他在山西的乡村建设实践。随即，日本人的战火已至，一切计划尽作泡影。今天，中国南方的社会工作实践者——民间公益组织或各种“乡土合作社”的工作者——正在



直接或间接地致力于实现泰戈尔的设想。现代文学的一个奇特现象是：极少有当代中文诗人讨论和引用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但是一些南方民间公益实践者会提到他。

日军入山西后，兵锋西进，停在吉县的黄河边，再未渡河入陕。如今，依然作为界河，陕西和山西平分壶口瀑布两岸的旅游生意。虽属冬季枯水期，壶口瀑布景观的说服力仍然绝对。郦道元称这来自洪荒的大河“以通中国污垢”。在我们的传统中，见识黄河，是一种成人礼。我们的前人通过面对这条真实的大河而非书卷，理解“君子”这一精神类型所应具备的智识、人格与能力要求——这是一种古典教育，因为理解黄河，即意味着理解中国的秩序史，意味着理解由它而分布的形势与力量格局，以及“中国空间”是一个怎样的地理构造与力量事实。黄河一直是一条地缘政治的河流。在中国历史中，“过河”与“过江”有着不同的意义。相比之下，长江主要与不同时期的内战和知识分子的放逐生涯有关。

过去，我在沱沱河（长江上游）边的一个夜里，去听摩擦拥挤的满江浮冰，忽然想起并理解了曼德斯坦姆的诗句“我听见那最初的冰”。我也愿意去看看黄河的上游和发源地。在《战地行纪》中，奥登与衣修伍德沿黄河旅行，衣修伍德写道，奥登对黄河边测量水文线的铜牛仪器兴趣浓厚。这种传统的，但并没有多少当地人理解的尺度工具，使奥登形成对中原传统地理秩序的理解，以后，这一空间认识出现在他的长诗《诗解释》中。

在这次中原之旅的过程中，由于各色人等纷纷撤



离战区，能够接待奥登一行人的唯有留守在黄土地上的传教士们，正是他们，逐渐否定和纠正着奥登“过于轻易地猜测意思”的“那种危险的敏捷头脑”，使他意识到这条“未知之路”既非他这样的外来者，也非中国人能够轻而易举地穿越。同时，他也看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仍然往往“犹如一个梦游者”。

经舜陵和盐湖区，过运城关二哥故居，未及拜谒。运城盐湖是地球上的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正是这座盐湖的生产力，吸引了尧、舜、禹三代君主在此建都。现实并不像历史修辞那样，这一带显得萧条沉寂，坚硬灰暗的工业地貌使人很难想起矗立在这座大地上的庞大历史，像一些被遗忘的巨人幽灵，而与之对话者，往往是那些外来者们。

我想起以前看到过的一幅谢阁兰进入中原时拍摄的银盐纸基照片，他所望见的天际线与如今不同，大地还保留着最初的起伏，仅仅一个多世纪以后，人造地平的现代空间建设，使大地的曲线消失。同时，仿佛有个疯子用巨锤把大地砸了一遍，文明破碎溃散，仅留下只言片语的碎片残留在各个角落。尽管如此，密集的历史材料仍然蜂拥而至。荀况出生在这里，我曾诗剧《韩非与李斯》中写下他的两个学生关于他的对话。由此往西的永济，是王维家族的故地。往南不远即龙门石窟。陕晋豫三省交界，使我又想起E·沃格林的“脐点地区”。

有的作家会在晚年，逆反自己过去的追求，仿佛是一种具有自我拯救性质的平衡，尽管作者的形象已经定格于过去的成就。这种反转现象，有时因为愧疚，有时因为——用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定义——“作者



之谎言”还缺乏一次必要的真实性的深化，或两者皆有。由于《碑》、《勒内·莱斯》的影响，中国读者一般认为，谢阁兰对中国意象做了最令人称心的再升华。“进入内亚”曾是现代文学的主题之一，克洛岱尔（他的主要作品写于河北渤海湾、福州、以及由武汉北上前往北京的旅途中）、谢阁兰、圣·琼·佩斯（也曾在中原漫游）都为这一主题添砖加瓦。但是，在晚年的《出征》中，谢阁兰以相当自然主义的风格纪录了他最初进入中国——以及中原大地的旅途，写下他初次接触东方时的不适与畏惧。这是谢阁兰晚年所写的一本反谢阁兰的书，一本充斥着种种不适应和毫无诗情画意的书。其中一些情节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写到对乘坐轿子旅行的不适，认为这种中国式的运动方式和平衡感的享受，是建立在物化了的半赤裸人体的苦役之上，因此一个长期乘坐轿子的人，会因为习惯这种舒适而不道德的平衡感而逐渐平庸。

一篇名为《谢阁兰的不适》的文章也许有诸多可发挥之处，并且会颠覆这位东方想象者的形象。但这已经不是这篇文字的范围。翻越雄峻的中条山后，即见中原。我的大脑还停留在对壶口瀑布的混浊激流的记忆中，在这次旅行之前，我一直在写一首名叫《洪水》的诗，企图重写禹和鲧的故事。

这也是一个关于“中国空间”的产生时刻的故事，在那场只有《圣经》里诺亚故事可以媲美的大洪水之后，大地的秩序也随之形成，河流成形，而黄河——既作为灾变之源，也成为大地的尺度。禹的前任，鲧，是失败的土壤力量的化身，他的怨气使他异化为一种危险的动物。这是一个依然历久弥新的政治学故事，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做那些欧陆思想家通过他们的地



中海小岛神话所做的事。我还想在这首诗中重新理解那条龙——应龙，那悬浮在半空中的老师，隐藏在一个边缘、暗淡的天坑地穴里，像一笔巨额财富。

这首诗迟迟没有完成，这次陕晋豫三省交界的旅行，使我重新得到一些思路。过去，我从未想过我会写一首有关黄河的诗。在临汾的一个夜晚，我决定写一首这样的诗，虚构在黄河边与谢阁兰鬼魂的对话。我模仿了谢阁兰在《碑》中的散文诗文体，他的鬼魂对我如是说——

“你们的仙人喜欢活动在一个数百里长的天台范围，猴子、凤凰和桂树陪伴他们。他们是一些衣裳如绿色波纹的隐士。（在你们的南方，我嗅闻过桂树的气味。）

他们越过中国，沿一条直线飞上天堂。那是一个常常举行首脑会议的天堂，那里的领袖，是所有云彩的皇后。

你们那座伟大的山，泰山，是你们的男性高度。你们最出格的行为，也就是在山顶观望所有鳞次栉比的社会领域，好比抽大麻。

你们的雷神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阴影，像乌云的影子。

你们的河流是灵魂的灵魂，是一个长长的叹息。河流，难道不是一种始终带给你们快乐的方式吗？你们的一万件事，不是都很喜欢抛掷给东流水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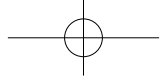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你们的诗人喜欢说：‘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认真点头哈腰的人？’。他们的内心是迷失的烟霞。



你们的老师一脑子战国意识。流寇在运动。绅士政治家在写他们的书。那一座座包围你们的山峰，你们的屏障，像十数万个患有白内障的人。”

我没有自壶口北上、穿越晋陕峡谷进入内蒙，我希望这是以后的旅程。我按照原计划南下，到达芮县，去看永乐宫壁画。永乐宫新址在大禹渡与风陵渡之间，遥瞰三门峡和洛阳，壁画衰褪，色彩暗淡，如同一个虚弱的镜像，神气已散。

继续沿高原的梯级而下，在黄土高原的边界，我又想起那首没有完成的《洪水》，并琢磨着怎样把盐湖和现代中国写进这首诗。与此同时，在离我不远处，大禹塑像面朝黄河对岸混沌平坦的河南农田，做着九州已成的动作。



● 西藏阿里普兰的一座宗山废墟。



不再预言的鸟

阿里古格遗址曾经有一只有名的乌鸦，一位生活在狮泉河的画家曾对我说起它：

“这只乌鸦我从未见它飞过，翅膀太肥了，叫声也跟别的乌鸦不一样。看守古格遗址的是个神人，叫普布曲桑，能听懂乌鸦的叫声，不出门，就坐在屋子里听鸟语——‘今天有人要来古格了’；甚至能听出大致来多少人，过一会儿，就看见通往札达县城那条路上尘烟滚滚……现在游客太多了，大乌鸦不高兴，也就很少开口了。”

预言乌鸦从此沉默。听过它的语言的人，并不会太久地复述它的故事。这些故事异常简单，常常是错觉。但我喜欢这些干枯而贫瘠的故事，仿佛它是构成一座遗址的勉强而又真实的骨骼。

在疆、藏工作时常见的鸟类是乌鸦。在塔什库尔干，我与同伴步行去山中寻找一座瀑布，体型巨大的乌鸦站在缓坡上，像一把沉默的黑雨伞，有人走近，



就忽然打开飞走，离它们不远可以清晰听到翅膀拍击空气的声音。山地乌鸦比人居地带的乌鸦更接近野生动物，在沱沱河，它们常常像肥硕的流氓，挡在青藏公路中央，长途运输卡车隆隆驶近才不情不愿地离开。每天早上它们就停在旅馆窗外，吵醒准备远行的人，不时去翻捡垃圾堆中的食物。

不同的关于鸟的故事，一直断断续续持续在工作 and 旅行中，仿佛一种隐秘的飞行，在世俗生活中若隐若现地延续，有时消失在事务和生活的云雾里，有时又露出它的轨迹。

文学中的两种鸟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第一种是贾谊的鸟。由于《鵬鸟赋》的影响，全部贾谊文赋给我的印象，是一只眼球昏黄的猛禽的注视。

在《鵬鸟赋》中，一个孤独、忧郁的知识分子与一只闯进室内的野生猛禽对视。主人公认为，这是一个预兆，于是他想从鸟的嘴里听到关于自己命运的信息。但这只鸟始终沉默不语，用昏暗的眼睛注视着房子的主人。在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对鸟的询问，转而成为主人公哲学化的自我安慰：“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对政治与社会事务的沉思转变为对“变化”这一传统观念的接受。诗人没有告诉我们，“鵬鸟”究竟是何种鸟类，关于它，人们有不同的解释。一个朋友对我说，他早年在长沙上学，一次从贾谊故居出来，见到有个人在门口挑着担子，扁担上站着几只待售的猫头鹰。朋友说，他突然觉得，贾谊写的那只“鵬鸟”正是猫头鹰。

第二种是爱伦·坡的鸟。在名诗《乌鸦》中，主人公关于自己失败的爱情和生活，尽情对一只闯入室



内的乌鸦倾诉。这只乌鸦比贾谊的猫头鹰稍微话多一些，每当房主人长篇大论独白一番后，乌鸦就作出它那著名的简短回应：“不再，永远不再！”。一个汉代诗人和一个近代新大陆的诗人，仿佛写的是同一只鸟，它们都是变化的化身，试图了解自己命运的人类，希望从它们嘴里得到不可能的回应。于是，诗人的鸟不仅是变化的化身，也是对诗人试图窥探命运真相的行为的打断。不过，贾谊那只始终闭嘴不言的猛禽，比起爱伦·坡那只因为不断重复同一句话而有点鹦鹉化了的乌鸦还是要酷一些。

文学中常常飞动着各种飞鸟，貌似幽远、抽象，但离我们并不遥远。不同于诗人的鸟，另一种鸟也许更符合我们的命运。

一如纳博科夫称《唐吉珂德》，《水浒》也可以被视为“一本脏兮兮的老书”。这部强盗小说很难成为名义上的民族之书，尽管它事实上是。不论在朝还是在野的人，均需要保持对力量的自信，并且认为可以用他人的血肉保养这种力量。这使满纸客套，受到元代语言影响的虚构的北宋口语，散发出原始中土活人血祭的阴暗臭气。各种语言互为表里，在书中阴阳交替，像一对翅膀。但这不是一只自由的鸟，只是宫廷和市井都会出现的玩具木鸟。这些暴力反叛者的形象，最终是一种玩物，满足制度空间中的人们对自由活动的幻觉。

我不喜欢书中的任何一个人。今天生活中仍然有这样的人，他们没有成为军人和官员，刚愎，崇尚身体力量，是白酒的鼓吹者，有敏感的不平衡心理，受地方等级思维的影响。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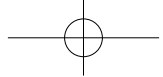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 德国旅行家、摄影师和动物学家Krause Ernst于20世纪初期在西藏拍摄的一张照片。



角》中文版序言中伶俐地援引《水浒》：“我最近发现《水浒》中充满了真知灼见，它表明在国家压迫之下人迹罕至的山地如何成为避难与复兴的场所。这一经验在很多方面也适用于我所研究的东南亚大陆山地与河谷之间的关系”。但“天真的人类学家”可能没有暂时忘记了，那些并非桃花源的山地水泽，同时也是处在被摧毁和恶化之中的自然界，也并非自由得以实现的场所。自然界对我们的回应，也许并不会很大的不同于贾谊笔下那只野生猛禽昏黄、暗淡的眼球。

我把鸟视为一种与我的生活平行的事物，但不是那只作为自由感方面的抽象补偿的玩具木鸟。令我难忘的，是过去几次旅行中遭遇的猛禽。有一次，我和同伴在普兰一座山地宫殿的废墟，从圆石缓坡上溜滑而下，准备去看一处隐修士的洞窟遗迹。我的速度较快一些，回过头，同伴还在远处的缓坡上方，这时从他身后——仿佛他身后隐藏了一个飞机场——一只巨大的鸟低空越过他的头顶，像一架小型飞机。那是一只喜马拉雅金雕，同伴目测其臂展在两米左右。距离如此之近，几乎使我担心同伴会被这只巨鸟当作猎物轻轻提起。德国旅行家、摄影师和动物学家 Krause Ernst 曾于 20 世纪初期，在西藏拍过一张照片，正是这样的一只大鸟被猎人提在手中展示，鸟的臂展与猎人等高。这样的大鸟如今越来越行迹稀少，当我回到拉萨谈起那只喜马拉雅金雕时，听者皆言见到它是我们的好运。

以后我再没有在野外见过那样辉煌野性的大鸟。在那曲草原上，布满了电线杆一般的招鹰架，人们希望这样可以让更多的鹰定居在这里，捕食泛滥成患的草原鼠兔。鹰也是我在 2011 年秋天，到达新疆北部



● 阿里古格王国遗址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围绕古格都城札不让的重要遗址还有东嘎、皮央等，均有大量文物遗存。（摄/朵朵）



的可可托海时见到的第一种事物。它们在可可托海名声不佳，在垃圾中找食，聚众聒噪，有时叼走鸡雏。在可可托海，鹰已经乌鸦化了。它们甚至不敌麻雀。我曾见到一只鹰被两只麻雀追赶，努力在空中翻滚，以招架和躲避麻雀的尖啄。

在可可托海的3号脉矿坑中，人工剖析分层的峭壁上，有的缝隙已成为鹰巢。这座高山上，还保留着过去年代用灰白碎石砌成的巨大标语：“大跃进万岁”。在矿坑上空，常常有鹰群飞翔，它们盘旋飞行的轨迹仿佛矿坑内部道路的迂回阶梯路线。

回到扎达古格的鸟类。以下的记述来自当年的同伴，以后一直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年轻学者魏毅。

虽然历史上一个时期内的格鲁派中心史观，试图扭转并掌控阿里的表述体系，但在民间，关于河流、山峰、物种的神话依然传承，并且还在当下被不断地更新创造。狮泉河的画家朋友认为，不仅是阿里本土居民，甚至他这样在阿里工作的外地人，也统统参与到了阿里当代神话的大众创造过程中，他说，这些神话故事“以讹传讹，但是别有意味”。

在画家讲述的古格故事中，没有古格王、甘丹才旺、阿底峡那样的风云历史人物，取而代之的仍然是鸟。

首先是关于沙棘林里的两家鹤鹑：“七、八月间，每天早晨8:30，其中一家鹤鹑准时从古格王宫东南面的水源处出来，母亲在前、父亲在后，中间一窝小孩，边走边整理队伍，走到坛城殿的时候，队伍整理完毕。然后公鹤鹑使劲叫唤，于是另一家也出来了，



场面瞬间失控，两家孩子混杂着乱作一团，四个大人在一边忙碌着整理秩序……晚上8:30，两家鹌鹑排着整齐的队伍各自回家。这两家鹌鹑的这种极有秩序和规律的行动习惯，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过。”

画家口中另一个被当地修改丰富了的神话，有着明显的实用意义：“2004年，我跟扎西顿珠等几个人在东嘎二号窟东侧的断壁上临摹壁画。断壁上边有个洞，洞上边还有个鹰窝。我们从8月画到9月，还没画完，老鹰飞出来了，在我们头顶盘旋，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一群不知哪里来的乌鸦也经常来骚扰我们。这时，扎西顿珠说：‘鹰可以生下一种既像鹰、又像狗的动物，叫做梟，身体是狗，但是有鹰的翅膀。梟开始叫出鹰的声音，后来就变成狗叫，最后把自己的父母吃掉。’我们又兴奋又害怕，研究了几天要不要上去看看，最后的结果是把村支书叫来，村支书说不能上去，凡是见到那种场面的人都会死！后来我们决定撤离，当地老百姓也把断壁上的那个洞堵上了。”

——魏毅在当时与我合作的工作笔记中这样理解：“外来者半信半疑的关于‘梟’的信息，被当地人轻易认可。原始动机也许仅仅是害怕外来者给原本平静的村庄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但堵住洞口这一行为，已将他们拖入一个外来神话的本土化叙事中，这个简单的传播—认同—强化的过程，几乎标志着一个神话初步构建的完成。所谓的‘以讹传讹’，实际上是一种大众集体无意识情绪观照下的叙事实践。”

法国诗人彭热曾有一首诗写道：“常见之鹰落在我们中间。”我把那些貌似单调、常见的鸟类以及同样貌似单调普通的故事，看作落到我生活中的“常见



之鹰”，带着不回应的、停止了预言的阴郁和一种不被驯化的力量。在疆、藏的边境地区，动物占领了国与国之间的中间地带，这里的主人往往是鸟类，它们在那里可以不被人类打扰地活动和栖息。同样，不论贾谊还是爱伦·坡，当他们试图与鸟对话时，他们也处在一个人命运力量的中间地带，人生失败和政治现实的影子暂时退却到人与鸟的关系之外，但是，被当作预言者的鸟并不告诉他们任何命运的秘密，只促使他们接受变化与流逝的现实。

我们在旅行中暂时停留的地方，也是我们生活的中间地带。如果我也需要一个中间地带帮助我接受变化的力量，那么，我也希望——像贾谊和爱伦·坡那样——我的动物是一只鸟，即使它不是亚历山大的那只英俊的命运之鹰，只是贾谊的丑鸟或者一只粗壮、狡黠的乌鸦。



● 腾格里沙漠常常见到沙蜥。在荒漠里，生态保护不是靠植树，一个地区的水量供给是有限的，树种太多反而造成生态失衡。



腾格里和她

这是她第一次去沙漠。我没有陪伴她经历这次旅行，回到北京后，我从她的叙述中大概了解了前后行程。在我以自己的方式复述她那东拉西扯、这一个兴奋点那一番流水帐的西北之旅前，我想起自己18年前在那个地区的旅行。

在我的记忆中，平原和盐碱地是这里的主要地貌，细小的卡车在干涸的黄河河床上行驶，生硬、单调的天光之下，丘陵和平原像在出神，人感到地平线在有压力地逼近。这里临近“西海固”，那儿是20世纪80年代作家渲染过的穆斯林圣地，干旱的山梁连接着陕西。在1997年冬季，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些之前只在影像上见过的西北沟壑丘陵。我还记得，往旅馆窗外可以看到西华山上的雪，气温在夜间会骤降至零下20摄氏度。那时候的我年轻散漫，完全不知道她会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她参加的活动是由一家公益机构组织的名叫“生



态假期”的计划，有蒙古文化研究者、民歌研究者和生物学家随行讲解。地点在阿拉善腾格里苏木，蒙古族牧民巴依尔的家。

她告诉我，接近阿拉善时，太阳能光伏板在荒漠中远远延伸。巴依尔的家离公路并不远，他的几间夯土房屋也标志着人类世界在这片荒漠大地的边界。

由于着迷一套名叫《神奇校车》的自然科普知识漫画，她几乎记住了书中提到的全部自然知识。她也在腾格里沙漠中一直留意记录所看到的沙蜥数量。她告诉我，一共看到过 50 只沙蜥，同行的生物老师对此表示赞赏。

她一直不喜欢我过分表扬她。她不喜欢大人的那种音容夸张的表扬。

虽然活动介绍巴依尔的家“在沙漠深处”，但实际上这里是荒漠与沙漠的渐变地带，也是一个自然生物存活的中间地带。我想起过去，我在新疆的这种中间地带的工作。那是在霍尔果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干涸的霍尔果斯河的河床成为两国之间的禁区，因此也成为鸟类和一些野生动物相对安全的活动区域。在那里，原野上往往只有一层脆弱的灌木，植物稀少的地方形成似路非路的支叉，像一些纤细的神经。那时候，我和巡逻兵一起，每天在这些神经里活动，常常看到干枯的卡车轮那么大的骆驼刺。鸟在边境聚集得很多，在无人骚扰的中间禁区地带，鸟儿找到了它们的栖息地。英国 BBC 曾经去那里做过一个关于边界的采访，用了很长时间去录制“中间地带”的虫鸣。



观鸟也是这次她参加的活动的�主要项目。在巴依尔家周围一带的山头上，都是大型鸟类的生活痕迹。每天清晨，两只肥肥的斑鸠都要来露下脸。羊放出去以后，总有戴胜到羊圈里找食。家里的杂物房门上没有装玻璃，家燕就住在里面。厕所在沙地里，不时会遇到几只唧鹁，偶尔还看到黑耳鸢在天空盘旋。

巴依尔家附近的那仁湖，是一处没有被旅游开发的野生动物水源地，在她和同伴们到达的时候，一大群骆驼正好来喝水。她认真地告诉我——好像她是我的生物老师——湖边看到的水鸟有黑翅长脚鹬、赤嘴鸭、须浮鹬，还幸运地看到了蓑羽鹬。

但她最喜爱的是猛禽，是黑耳鸢、普通鵟。在她的腾格里记忆中，常常会有两三只普通鵟在空中盘旋。从腾格里回来后，她在电脑上查询各种普通鵟的图片和有关知识。她告诉我：荒漠的视野很宽广，很寂静。

在一次寻找岩画的徒步过程中，有人发现鸟巢和三只蛋，判定是普通鵟的巢穴和蛋，生物老师建议人们尽快离开，担心大鸟受到打扰而弃巢。她的妈妈和她一起建议，在普通鵟的产蛋到小鸟长大这个阶段，巴依尔都不要带人来到这里。

在她到达腾格里沙漠前后，十几个家庭也通过飞机、火车、汽车从各个城市来到宁夏中卫市，再由中卫乘坐巴依尔安排的卡车进入沙漠，只有半小时车程就可以到达巴依尔的家。离巴依尔家不远，开发了一片科技园区，主打精细化工行业。也是那次在18年前的旅行中，我曾逗留在中卫，步行去看附近的一处开凿始于唐代的石窟。石窟正在被沙埋中，后山上的



长城遗迹也早已归于黄土，很难辨认。“离城市很近，但是离繁荣很远”——这是过去我在关于另一处类似中卫—腾格里这样的地方工作时，当地人对我说的一句话。在她成长到九岁的这些时光中，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来往于“离城市很近，但是离繁荣很远”的地区，它们也构成了真实的内陆中国。

在蒙语中，“腾格里”意为“天堂”。关于“腾格里”这一地名有不同解释，其中一种是，在过去历史中，对于被流放的人，这里虽然环境严酷，但仍然有自然资源可供生存，更重要是，这里远离权力的管理，因此在他们眼中，一个能满足基本生存要求而又自由的地方，堪称“天堂”。她也问过我，“那里为什么叫腾格里？”但她有理由在以后的漫长时间里，不用懂得那些。我只是希望不论现实世界处在如何巨测的变化与未知中，总能够有一些地方是她的天堂。

每次回蒙古包，她坐下就会留下沙印，沙子存在裤兜里，也没法掏出来。她说，看来到沙漠应该穿没有裤兜、或者裤兜有拉链的裤子。

她在荒地里有时会看到铁矿石。

她告诉我，荒漠不长蔬菜，这个季节有野菜——沙葱。用沙葱可以做很多菜，凉拌沙葱，腌沙葱，沙葱拌面，沙葱饺子，沙葱炖排骨。

荒漠里的植物其实很丰富，沙冬青是这里的特色植物，蒙古扁桃、霸王、白刺、锦鸡儿、乳白黄芪、猫头刺、草麻黄、碱蓬等等。

她听大人们讲解这些——荒漠里的生态保护不是植树，因为一个地区的水量供给是有限的，树种得太



多，反而造成生态失衡。在这里做生态保护目前合适的方式是捡垃圾，因为动物不会鉴别人类废弃物，羊和骆驼吃了塑料袋或脏东西会生病甚至死亡。

他们在那仁湖捡垃圾，捡了两麻袋矿泉水瓶、玻璃瓶、烟盒和废纸。

附近有两处铁矿，巴依尔认为铁矿粉尘会导致沙冬青死亡，这让巴依尔很忧虑。

荒漠里最多的是沙蜥和步甲虫，她说，估计是因为它们多，鸟才多。

——这些事物构成了她的第一份沙漠目录。

巴依尔的家是砖砌平房，但为了满足城市人的异域体验，他计划搭建三个蒙古包供居住。附近的邻居也来帮忙，半天就完成了。这里邻居最近的直线距离也有1公里左右，但有事都会互相帮忙。巴依尔家有个地下很深的水窖，是他的父亲留下的。在这里买一车水（6吨）需要200元，可能因为这里都是盐碱地，水喝起来有咸味。巴依尔，这个脑子活络的青年蒙古人，正积极地设想在这里开设“牧民博物馆”，专注于一系列或不切实际、也或有可为的计划。

在这次活动中，巴依尔却像一个年纪最大的孩子。在她的转述中，巴依尔使我想起那种年纪不小、却仍然适合当孩子的玩伴的人——我在蒙古人、哈萨克人和维吾尔族人都看见过这样的人，多于汉族人。他们爱喝酒，唱歌，和孩子玩起来诚心诚意，同时扮演英雄和丑角。

每天，她和其他小孩乐此不疲地在沙山上玩耍。



巴依尔给他们准备了滑沙板。

巴依尔很喜欢骆驼并以此为傲，他认为，骆驼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他也只是养着它们，不骑，也不挤奶。骆驼们在他家周围的土丘之外游荡，有时走得很远。因为活动范围不会超过水源地的辐射范围，巴依尔告诉这些来自城市的大人小孩们，到秋季，骆驼们就自然会回家来。

她也记住了这些，包括关于骆驼的知识。她对我说，同行的生物老师告诉她，世界上90%是单峰骆驼，现在野生的双峰骆驼主要在中国，数量已经很少，希望能得到保护。因为骆驼和沙漠可以共生，骆驼消耗最少，所吃的植物可以帮助土地中的盐碱得到稀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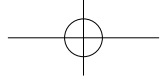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如果不是她的这次旅行，我不会想起去记录和写下这些。她在叙述中非常强调对自然知识的正确叙述方式，她并不喜欢那种预先童话式的、孩子气的叙述，如果我用一种夸张的漫画化口吻说起那些动物，她会表示反感。

大概在她八岁以后，我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想写一些可以给孩子看的东西。我想以童话诗的方式，写一种给孩子看的1949年以来的中国事件。读今天的一些童书，好像进入一所当代幼儿园，那种孩子气环境，是由教育者的一种主观认为的孩子气所营造。孩子的习性一定程度上也是由这种成人构建的孩子气所塑造。我相信，今天她所能够选择的总会好一些，因为至少有机会接触一些不那么主观孩子气的、但用心为孩子而做的实践活动。我尊敬那些在不发达地区从事儿童教育的人，在他们看来，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多是陪护，一个或一些成人愿意陪护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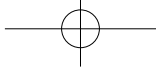


不成熟的生命，对儿童的教育，也同时是成人自我教育的过程。我们从孩子、青春期然后直接成为中老年，没有一个有生气的、鹰和星一样的青年状态——既非幼稚也非暮气城府的心智状态。相比儿童教育，也许更失败的是成人教育，后者是一种更古老的教育，似乎被遗忘湮灭了。过去，一位在偏远地区从事儿童陪护教育工作的朋友对我说，“除非成人自己还可以做孩子，否则教育就是无意义的”，这大概是华兹华斯“儿童是成人之父”的另一种叙述。我想，所谓“成人做孩子”，并非指成人回到孩子气，而是成人心中有希望。

我也像抄写教科书一样，把我从她那里才知道的沙漠知识，写在这里。我很幸运我是从她的转述中感受一个沙漠，以及，一只大鸢的视野。



● 大连石槽村的一处传统渔业码头。



工作者



Chapter 2



● 大连普兰店附近的传统码头，普兰店有沈大铁路及哈大铁路经过。



飞岛

1097

2009

1

早晨的寒气里，我们在船坞等渔船归来。11月的浓雾遮盖着辽东半岛，太阳光有时从白内障般的天空艰难渗透出来。渔船每天下午5点出海，劳作到次日凌晨收工。从海面到悬崖上有一根缆绳，每天早上，人们把渔船由缆绳放下水面，或者把成吨海货运到坐落在悬崖上的渔村。

浓重的海腥味中，滩涂像一种衰败的动物躯体，但依然保留着残存的生产力。延伸几十公里的海面布满养殖区，不同的渔民群体在那里划分了领地。每个养殖点都有一间简陋的船屋，海参收获的季节，人们会住在里面守护，以防被偷捕。

“海洋在这里是没有故事的，就好比煤矿怎么会有故事呢？一个人对煤矿怎么会有感情呢？他再也不想回到那里。我对海产有需要，对海没感情”，大李一边备船一边说。我们准备乘坐他的船，去他在海上



的养殖点。他说话的音量震耳，这是渔民在风浪中互相喊话形成的噪音。他的视力在衰退，双手皮肤皴裂，常年风湿疼痛。

渤海水域不同于大洋流域，漏油事件使大量海洋生物受害。“中国人没记性，出再大的事，很快翻篇儿了”，大李说。来这里之前，我们去过大连著名的黑嘴子渔市，那是一个从夜里12点开市，活动到凌晨5点收市的夜市，可以看到人们出售体型不小的蝠鲼。我们在那里整夜拍摄交易和各种鱼类的形态，进入大型冻库，在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中，看到两三米长的硬邦邦的鲨鱼，眼球滑稽地凸出，像一堆被遗忘的鱼雷摞在一起。大李也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

大李是越来越少的本土渔民之一，在辽东半岛的海岸线，从事海上劳动的以外地人（河南、黑龙江、吉林）为主。他在村子里口碑不好，比较保守的邻居们认为他不靠谱，“干什么都是一阵一阵的”。“我比他们懂海”，他说。

大李认为，渔民对于海和海岸，没有陆地人或者农业人对土地的那种观念，或者眷恋。滩涂一直变化着，被海水啃咬，这里露出，那里淹没。由于海上工作极其艰苦严酷，人们也愿意结束渔民身份，改换另一种较为舒适的职业和生活。渔民“身份转型”之后，海洋之于他们，可以说就是“无用”的了。不过，只要海产品一直被需要，渔民这个行业就会存在，当现在的中年渔民渐渐老迈、失去劳动力后，谁来做新的渔民？大李认为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他很愿意批评他所认为的一种“渔民心态”，即：等待“大环境转变”，相信转变中会自然而然产生对自己的合



理安排。

在不久以后，他们所在的渔村也会成为填海造地的工地。一些常用的传统小型码头会很快消失，本土渔民也将被统一规划到几处固定的大型港口。

我们的船在能见度很低的浑茫光雾中行进。摄影师小陶浮想联翩，之前，他是大连海事大学的学生，最近是卡尔·施密特的书《陆地与海洋》的热切读者。

他侃侃而谈。他说，海洋是非人性的，并不是人性视角的延续，而且，它也是危险的。海洋作为一种绝对不安全、不舒适的“自然状态”，是人类经验的截断者，“人都有可能适应苦役，人接受苦役和接受战争的逻辑是一样的！”

附近填海造地的工地上重型机械制造出的巨响，好像有个喝醉了的巨人在那里不耐烦地捶击大地。

“现在的人有没有写滩涂的诗？”他问我。

我说起一位海南诗人的诗作。在这首诗中，作者来到一个地形平坦的滩涂养殖地区，经过一座天主教堂，游览渔村。在描绘渔民在滩涂的劳作现场之余，同伴为作者翻译渔民的土话：“我们一天累得要死，他们却来看新鲜”，接下来是同伴的晕船呕吐。与作者的失望感并存，在平平无奇的广大空间中，预期中的海洋形象失落、空缺，人的知觉让位给了无知觉。但这首诗并不止于失落和失望，在叙事性的、带有轻喜剧色彩的行文中，令人意外又不失时机地引用《创世纪》中关于空间、关于“天”与“水”的话语，人在广大又平庸的空间中的无知觉状态，好像得到了一种隐微的转机或者生机。



● 大连旅顺附近的盐厂滩涂。我们沿着海岸，走遍了大连地区几乎所有的填海造地施工现场。



“作者对他写的事物好像只有很表面的看法，还抱有一种比较笼统的价值观，我不认为引用了《创世记》，就会使这首诗变得深刻一些，但还算是一首诚实的诗。”他说。他又补充说，“不过，这样的诗适合表达人的平庸意识。”

我们继续在海上晃荡。从早晨开始，太阳在昏暗空间里制造透纳式的光雾。摄影师继续发表他对卡尔·施密特的书的读后感。

“通常的海陆对比，是对比两种资源，两种攫取的可能性。可是海洋和陆地并不是两种可能性，而是两个矛盾体。‘可能性’，是一个近代军工概念！”

2

我们沿着海岸，走遍了大连几乎所有的填海造地施工现场。其间，在临时的住处和长途汽车上，摄影师一直在读《陆地与海洋》。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关于海洋、天空和陆地的对话》。三个分别代表海洋战略，制空权的鼓吹者，传统的陆地保守派的人，在一番争论之后，处于劣势的陆地保守派疲惫地援引在《浮士德》第二部开始，同样疲惫的浮士德醒过来的一句独白：“大地依然如故”。

这是诗剧中浮士德的第一次疲惫。浮士德的第二次疲惫，发生在诗剧的著名结尾。当浮士德权柄在手、决定大展宏图，他的大型工程即是人工填海造地。填海造地成为他所认识到的现实功绩与幸福感的顶点，



他耳边响起的工程进行的机械挖掘声，其实是魔鬼在挖为他准备的坟墓。他疲惫又欣悦，眼前出现人们在这些人工陆地上生活的图景，他说：“瞬间，你停一停，你真美好”——不无规划者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这也正是浮士德与魔鬼的契约生效的时刻。

2012年，我第二次沿着渤海旅行。在辽宁的一座人工岛上，我们遇见一些踌躇满志的村长和渔民，他们的理想是买下附近的一些小岛。我们不知道买一座岛需要多少钱。我们给这些未来的岛主讲了一个去冰岛买岛的人的事情，对他们产生了一定刺激，说还是有文化的人厉害啊。在辽宁的这些近海区域，工地用地不够之后，人们考虑通过人工填埋产生新的陆地。我们对村长说，不如把这些小岛之间的海全部填平。其实，我们的胡扯是剽窃几年前偶然看到的一则牟其中式的奇谋：从陕西的黄土高原取土，逐渐填平台湾海峡，永远解决这个番薯岛的问题。

魔鬼与浮士德的典故也许过分严肃。事实上，我们喜欢那些心高志大的牟其中们。我们想，既然人们不喜欢渤海，在以前的时代就已经滥捕滥捞耗尽了它，又把石油倒入它，而这个内海其实也就不到一个省的面积，那么——我们从那位提出台海妙计的谋略家得到灵感——不如排空渤海。

这样，就可以漫游这一大片曾经是渤海的平原和洼地，游览日俄海战留下的未来建筑般的沉船群，还可以进入斯捷潘·马卡洛夫的旗舰，看看这位鱼雷发明者、俄罗斯海军军神——也是一位海洋浮士德——的机械坟墓。如果在这里开发一座未来新城，我们会希望参与它的建设并居住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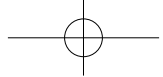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在那个辽宁小人工岛上，我们还有另一个收获。我们与该村长酒过数巡，向他递烟不断。于是村长开始说起他心中最辉煌的奇想。

他谈起一家著名的集团在附近填海造地后，建成的一座巨大人工岛，该人工岛是一条巨龙的形象，岛上布满各种高端住宅。村长的忧虑是，这座龙形人工岛其实对应了“龙困浅水”之说，风水上极不吉利。其二，这里本来是一片富饶的滩涂，也是潮汐进退的缓冲带，人住在这里，是把自己的肉体作为防波堤。我去看过这座岛，岛上的地面离海面不到两米，外围没有任何防波堤。村长说，他的想法是，这些人工岛的基础可以升降，大潮涌至，岛就可以自动抬升。当然——他补充说，既然是富人区，每家应该配备一架直升飞机，海水来了，业主们就鸟群般全体飞离。

这一构思立刻震撼了我们，令人联想起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讲述的飞岛。这座岛上只住着国王、官员和富人。飞岛四处巡游。阴影渐近，人们就知道飞岛来了，勒紧裤带，准备好各种贡品。“如果有哪一座城市发生风潮或者叛乱，引起剧烈政争，或者拒绝像平常一样纳贡效忠，那么国王有两种方法可以使他们服从”，第一种办法比较温和，把飞岛飞到反叛地区上方，遮住他们的阳光雨水。另一种办法很直接，就是飞岛轰然降落，将该地区压碎。久而久之，人们发明了一种反抗的方式，尽量建造一种尖锐的钢铁高塔，使飞岛不敢贸然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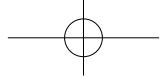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我们给村长讲了这个故事。村长说——他有点醉了——可以考虑将这种钢铁高塔改造为一种自动伸缩的人工岛基座。他如果承包这个工程，就发了。我们



也醉醺醺的，看着面前这位想要顶起大地的“辽宁阿特拉斯”，肃然起敬。

/104

大地报告——另一种中国行纪



● 新疆昭苏的一个马场，这里的自然丰茂的草原吸引了来自各地的马主。



马人

我常想起一个哈萨克族山区牧民对土地的戏谑态度。2006年，我在伊犁阿希金矿搭乘过他的货车。我不能具体记得他的言语，只记得生硬的普通话发音和随便的语气。大概是说，牧场是坏蛋似的牧场，地是靠不住的蛮横的地。人在劳动中变得眼珠子昏暗、手指变形、皮肤皴裂、关节疼痛，都被折磨成了一副奇怪的模样。人是土地造出来的小丑和老狐狸，等等。他喜欢看电视，他说，电视比牧场可爱得多。他跑运输，很爱钱。我记得他说的一些想法，不像我遇到的其他哈萨克人。他说，钱是他的土地。并且表现出满意这句话。我对他说，汉族人会说“钱就是一切”，但不会想到说，钱是土地。

搭乘他的车后的第三天，我在牧场上又遇到他，他骑着马，带着他的小女儿。我在牧场上走错了路，于是他领着我往正确方向走了一段时间。他慢骑着马，时不时停下来等我，我仍然要走得很快才能跟上他。我记得，他问我：“你会不会骑马？”我说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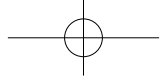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点。他笑着说：“不，你不会骑，哈萨克的马一跑快，你就会摔下去。”

2011 年我与两个摄影师、一个年轻士兵一起在伊犁昭苏的哈萨克草原上游荡，我们本打算访问这里的牧马人，可是，却遇见了一些制造马匹的人。

在官方文艺语境里，新疆往往被简化为一个物草丰美、牛羊成群的旅游胜地，有关新疆的画面常常定格为牧马。我所听到的一种更尖锐的看法是：迄今许多有关新疆的汉语文学、图像作品都可以视为在维持这种简化。有一个时期，在新疆的很多朋友家中的墙上，都会悬挂着一副马的头骨，人们视之为艺术品。我一直想实地看一看，马在新疆土地环境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骑兵在近代新疆曾扮演过重要的历史角色。被斯文·赫定称为“骑在灰色马上”（语出《圣经》）的青年战神马仲英，在进入星星峡口后，一度控制了整个南疆地区。他被民间称为“马超转世”，在鼎盛期，他甚至想建立一个“中亚联邦共和国”。在他失败后，他的骑兵部队也像“游移的湖”罗布泊一般，很快在大地上蒸发消失了。在哈密地区，一度是新中国骑兵部队的重要驻地。骑兵撤销以后，许多英俊的战马被处理掉，它们的尿液、血液、肌肉和骨头被丝毫不剩地用于各种用途。其中一些活下来的战马又与当地马结合，产生了新的、在人们眼中也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劣质马”。一个养马人对我说，“骑兵的撤销直接导致了新疆马的衰退”。新疆是汽车和公路大省，自从人们拥有便捷的交通工具之后，就不再需要饲养麻烦且花费不菲、会生病、会老死的马匹。这片大地早





● 新疆木垒县的一次赛马会上，古代骑兵打扮的哈萨克族人和准备表演的儿童方队。



已不再如文艺画面中那样马蹄震动，只有在每年特定且有限的时间里，在南疆或东部的艾丁湖地区会出现稀稀拉拉的野马群，这些地方坐落在它们生态脆弱的迁徙路线上。

著名的伊犁马来源于顿河马，后者即哈萨克骑兵所使用的马种，关于这种战马，托尔斯泰、巴别尔都写下了许多和它一样生动有力的文字。但人们喜欢说，伊犁正是汉武帝索求的“天马”的所在地。

在昭苏草原上的种马场里，多年从事畜牧业的老罗对我说，这种被称为汗血马的特殊马匹，其“汗血”的真正原因是寄生虫叮咬。我没法证实这一说法的真伪。每天许多和马息息相关的哈萨克族人和汉族人聚集在这里，忙忙碌碌。一位马主老郭自信地告知我，“中国的好马都在这里了。”

种马场的空地中央建了一座无墙的铁皮屋，每天，这里的下午五点充满混浊的生殖的气味。老罗打电话叫我去看他们给马配种的过程，我从草原上赶回马场的时候，大雨也下起来。一群麻雀也集中在铁皮屋的棚顶下避雨。铁皮屋下，仿佛永远有一匹两只后脚被一米长的绳子束缚住的母马，抑郁地等待在这里。它的尾巴被发辫般编起来捆住，露出下体。人们牵来一匹发情的半血马公马，等待它充分勃起，然后需要四个壮汉才能控制并引导它在铁皮屋下就位。但它并不会真正插入那匹母马的体内，人们会用一只柱形的空筒半路调包。整个过程麻雀的吵闹声不断，这群会飞的看客，好像在八卦和嘲笑马的处境。取得马的精液的技术人员立刻一溜烟小跑，冲进配种室，趁着精液的温度稀释、分装，流水线般送到配种室隔壁的马厩



里，在那里，有上百头来自伊犁各处的哈萨克族人驱赶来的母马等着配种。

我想进配种室看看，被老罗拒绝了。因为我的进入可能会改变配种室的温度。半血马的精液价值不菲，一匹品种良好且健康的马的精液稀释后，可以使八十匹当地母马受孕。老罗说，人们可以插手生物树形结构，“理论上，要什么样的马都可以制造出来”。老罗问我：“你说，这些被杂交许多次、被精确制造出来的动物，还可以叫做马吗？”至于铁皮屋下的那匹被捆住双脚的母马，人们长时间一直使用它，老罗说，“它已经患了抑郁症，不会活很久了。”

我正和老罗说话时，几个人一阵忙碌，骑着他们的摩托车而不是马，匆匆离去。从昭苏县城来了三辆中巴车，是当地政府组织的参观团。这是马场工作人员的义务项目之一：骑摩托车去草原上，把马群驱赶给这些客人欣赏，好让他们拍摄那种通常以“万马奔腾”为标题的照片。

我每天在种马场进进出出，每天去草原上看骑手驯马，这使我认识了马主老郭。在马场忙碌、时常混乱的环境中，他理智和敏捷的谈吐给我好感。他带着他的驯马师，以及他的十数匹“中国的好马”来到这里，一是借用这里的草场驯马，二是让他的马与当地马配种以获得不菲的收入。

在配种室旁边流水线般长长的廊道里，母马群被驱赶进来。每匹紧张、惊恐的马之间被一只木棒隔开，它们将在这里接受那匹半血公马的稀释精液。人们呼喊和嬉笑着，时不时用木棒击打行动稍迟缓一些的马。有的马一时打滑，在狭窄的巷道里四肢混乱地



折叠着，马蹄不得其法地撞击着墙面，恐惧地嘶鸣一番后困难地重新站起。母马们在阴暗的廊道中打着响鼻，有的马不停地喘息，整个廊道充满了动物的呼吸声。这是我此次新疆之行经历过的最强烈的现场。在这一切中，一匹没有人管的小马在廊道里游荡，有时，它会用嘴去找一匹被禁锢的母马的乳头。

老郭问我：“是不是觉得这种方式太暴力？”

“你见到的马匹已经是杂交了几十次、甚至几百次的结果”，老郭对我说。这个一脑子现代商业理念的北京人，表示他不能接受有些当地人对马的态度。

我尝试反对他说：“但哈萨克人很喜欢马。”

“那是出于生存需要”，老郭说，“有些哈萨克人会表示他怎么怎么爱马，但喝醉了就会去揍这匹马，高兴时候还会把这匹马宰掉吃肉。”在老郭眼中，有些马都是不折不扣的劣马。这位见过世界名马的职业马主，有这样的看法实属正常。是的，有些劣质马匹，意味着这片土地混乱无序的自然状态，但它们却具有纯血或半血马所不能具备的耐久驮运能力、在野外环境中的生存适应能力。

“马是绝对弱勢的，也是人类的一面镜子”，老郭说。我挺喜欢这句话。不过，老郭这样的来自北京及其他内地发达城市的马主，却为新疆带来了精细的、资本主义模式的马匹繁育理念和技术。马已经不再意味着野外，而是一个产业的精细的产品，可以产生巨大利益。在老郭这样的马主的经营中，马会完全脱离哈萨克人方式中的那种无序、野外的状态，虽然老郭在昭苏寻找更宽阔、更自然的草场。老郭说：“我



们这些养马的人自称是马人”。

在古希腊人的故事里，“马人”是青年的教育者，是德行、户外生存与格斗技艺的教练。但老郭这样的“马人”是马匹的教育者，也是马匹的生产者。“你们已经半人半马了”，我对他开玩笑说。我倒是同意老郭所说，马是人的镜子。因为，老郭这样的职业马主可以按照比赛的要求，精确地繁育自己所需要的马匹。人们的技术已经进步到了规定一匹新生的马，是用于短途冲刺的速度马，还是耐力型的长途马。服役时间长久的速度马，膝盖都极为脆弱，它们的生命晚期也许只能躺卧着生活。这些马，作为一种异化的物种是人的观念、欲望的化身。

离开昭苏，在新疆北部的可可托海的哈萨克人聚居区周游半月后，我前往木垒。这几天，木垒的赛马节正在进行。老郭和他的骑手、马匹们也赶到了这里，他邀请我来看他们比赛。

木垒的干旱地貌接近吐鲁番，这里往西南方向是艾丁湖地区。6年前我曾和一个维族司机进入艾丁湖中心区域，在湖区颠簸了一天。艾丁湖只在名义上还是“湖”，已经是一片干旱荒漠无人区，它是吐鲁番盆地的大蒸发盆。坎儿井在给了这片地区灌溉用水后，剩下的水以地下水的形式汇流聚集。在冬季，因为地势低，剩余的农用水便注入到湖区。现在的艾丁湖并不是一个“湖”，仅仅是一处季节性的积水。

我在木垒的十数天里，水也定时供应。白天的强光在地面上留下的热度，入夜后还久久不减。这个缺乏人文特点与风光的县引人注意的办法，是每年的赛马大会。



我在马厩里帮助阿力泰给他们的马输液。这些马因为长途运输，有些脱水。它们的皮肤弹性减弱，需要输送盐水补充体液。阿力泰是老郭麾下的冠军骑手，他的身形瘦小，两腿因为长时间夹住马的两侧而明显罗圈，他对我说：“以后看见这种体型的人，肯定是个骑手。”

汉族人不像哈萨克族那样，对马匹有那么大的兴趣。马厩里络绎不绝的好奇参观者中，我很少见到汉族人。每天，我与阿力泰等一千骑手在马厩里聊天，看他们训练自己的马匹。骑手对马的理解与马主不同。阿力泰认为，马能感受到人的恐惧和贪婪。“人的缺陷是很多的，这些马都可以感受到”，阿力泰说。骑手也不称自己为“马人”，他们侠客般被暂时雇佣，拿到金牌后便休息或离开。阿力泰的理想是做一个驯马师，专业的驯马师国内寥寥可数。他说，他见过的最惨烈的事，是一个育马企业为了不使马种流失，一次性击毙了几百匹被淘汰的老马。

老郭对我与骑手走得太近稍微有些不安，他一直不太理解，我对马的事情如此关心的原因。看完比赛后，我回到了乌鲁木齐。一个月的旅行和不断对话使我极为疲惫。在乌鲁木齐，我同老友作家卢平喝着夜市的啤酒。他正计划写一篇关于动物的小说。不过，他要写的动物不是马，而是两头猪。在老卢的小说里，一个专事养猪的高原士兵因为缺氧，浑身发蓝。缺氧的昏迷中士兵的灵魂在南方的故乡漫游，他养的两头猪在他身边飞翔，一头黑色，一头白色，是两位忠诚的猪天使。“我们应该多写写动物”，他端着啤酒亢奋地说，“多写写动态和那些运动中的东西！”为了写这篇小说，老卢居然读完了基础养猪方面的书籍，



宣称自己可以去养猪了。我连忙说，养马的人都自称是马人，你呢？

我想到新疆之前，曾对一个朋友说起新疆之行的意图，朋友（从没去过新疆）因此做了一个关于乌鲁木齐的梦：在乌鲁木齐，一座形状类似帝国大厦的最高楼层，是一个人们进行秘密聚会的场所。人们在这里狂欢、奏乐，从空高高得出奇的天花板居中垂下来一个巨大的锤摆，像钟摆一样不停摇动。朋友对我叙述这个梦时才想起，那也许是一个傅科摆。

我没有告诉老郭我的真实想法。如他所说，马是人的镜子。承受暴力和异化的动物是人的镜子。老卢，这个文字的傅科摆同我一样，我们的认知及其表达工具——文字与影像——也像文学中最著名的一匹劣马“驽骥难得”（堂吉诃德的坐骑）那样笨拙、羸弱但是始终持续，试图在这片土地上勾勒出一种运动的幻影。



● 雅鲁藏布大峡谷，远处是南迦巴瓦雪峰。雅鲁藏布大峡谷也是一条水汽通道，这里的生态完全不同于西藏其他干旱大陆性气候的地区，是生物多样性的保存地。



大峡谷的劳动

至今人类没有攀登过南迦巴瓦主峰，新中国成立后，南迦巴瓦地区一度是未经科考勘探的空白区域。20 世纪 90 年代，科学家 Y 在这里进行科考活动时，从格嘎村往山上步行两小时左右，即能见到冰川。南迦巴瓦的主要冰川，是位于山体西侧、长达十数公里的“则隆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生长在亚热带上麓的阔叶林之间。由于雪崩频繁，这条冰川得到不断的补给。

1950 年墨脱地震，导致南迦巴瓦峰冰川垮塌。由于处在震中地区，强大的垂直波使冰川震断成为六节，蹦跳跃动着往下移动。沿着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垂直落差，冰川碎块轰然而至，倾倒入直白村面前的大峡谷中，魔鬼头——这块据说是魔鬼阿穷头颅变成的巨石，无奈地凝望着突如其来的巨冰瞬间筑成的大坝。上游不断流来的江水上涨，形成堰塞湖。在雅鲁藏布江被堵塞几个钟头后，这座冰坝溃决，洪水奔向下游。直白村人至今犹有余悸，人们的解释是：根据



传说，只要村子的人口达到 99 人，南迦巴瓦冰川就要垮塌一次。在过去，冰川也垮塌过两次，当时村子人口正好都是 99 人。不过，今天直白村的人口已达 120 多人，且已经没有冰川可垮。20 世纪 70 年代，直白村大桥一带，还可以看见反光闪耀的冰舌，夜里，直白村人还能听到冰川溶水声。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直白村一带就已经不见冰川踪迹。

Y 并不对自然环境的变化惋惜，他认为，边防地区“并不一定要保持自然原始地貌”，因为那也增加了巡逻与生存难度。也许是由于 20 世纪早期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的遗留，人们面对这仍然隐藏未知的大峡谷时，不得不面对诱惑：一种意志和欲望被激发，利用大峡谷有所作为的诱惑。在 Y 眼中，林芝地区是西藏东南地区“最好的地方”。

Y 正准备递交一份报告，他认为，大峡谷地区的交通运输水运方案、公路建设方案等均难以实现，并根据他对大峡谷地区的考察和研究，设想了一套“大峡谷索道系统选线方案”与相关配套系统，希望在大峡谷地区建立高空跨越索道。听 Y 介绍这一宏伟蓝图，有时不能不令我联想起牟其中。Y 提出的两条选线方案是：

第一条线：鲁朗—竹普（索松）—加拉—白马狗熊—兴西拉—鲁古—背岱—墨脱—背崩—汗密—多雄拉—派乡。这条索道将全长约 250 ~ 300 公里，可以从南迦巴瓦和加拉白垒两座雪峰之间穿过，进入大峡谷核心部位的西兴拉山口，然后沿雅鲁藏布江下行，到达墨脱，经背崩翻越多雄拉山口后抵达派镇。在 Y 的设想中，这条线路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大峡谷



的观光价值，同时也连通大峡谷地区的主要乡村和墨脱等地，解决大峡谷沿线的交通问题。

第二条线：派镇—多雄拉—汗密—得心—墨脱往返。这条索道的长度约 80 公里，起点派镇为大峡谷门户，翻越海拔 4200 米的多雄拉山口，经过高山森林带至热带森林带后，到达墨脱，但线路相对较短，尽管可以解决墨脱县的交通运输问题，但没有到达大峡谷深部。

Y 认为，索道在各种计划中，可能是相对经济和占用面积较少的。他以阿尔卑斯山为例，在那里，索道对环境的影响较少，而且也起到了实际作用。Y 认为与之相比，公路的成本和危险性要大很多。“单独强调保护环境，会走入另一个极端”，他说。不过，不管是怎样的计划能得到实现，旅游业已经成为大峡谷的隐形主人，是无数人赖以谋生的主要载体。

Y 是个广博而固执的人，在与他的对话里，有一段内容一直保留在我的笔记中：

“鲜活的知识是在一个大于它的现实空间的压力之下，被迫出现的扩展过程。这一切仍然是动态存在着的。对某个族群所抱有的某种信念或理想，并不一定能够成为鲜活知识的基础，它并不具有优先性。

如果了解人群，什么时候都不为晚，不用向遥远过去、向历史的重要证据或背景求证。人们并没有什么改变，人们可以呈现的主要东西一直存在着，这些东西可能并不以那些预设的、容易被说起的東西（譬如民俗内容）为前提。”

近十年中，派镇如同一株细小沉默的珊瑚，一点



● 雅鲁藏布江上的渡船。雅鲁藏布大峡谷里的男人通常被认为“都是司机和背夫”。伐木工、猎人、采菇者、司机、背夫在一个门巴男人身上重合，其身份也随着每一种营生的季节性而转换。



点缓慢扩展着它的作用与面积。最初，它是一个为驻扎在墨脱的部队提供物资的转运站，以后，作为一个物流点的形象延续至今。1996 年的一个傍晚，因为工作原因滞留在派镇的军人 Z，外出散步，走进一座空高得出奇的房屋。房屋里只点着一支蜡烛，几十个门巴族人，包括男女老少正聚在一起饮酒，他们暗红色的面孔在昏暗的光线中静静反光。人群话语不多，沉默中接受了他的加入。Z 记得，他进门时，人群不约而同对他的一瞥，使他就此产生了“这是一个民族”的感受。

Z 对我说，之前在他的经验中，门巴人往往只是一些驯顺灰暗的背夫。这群沉默饮酒的门巴人对 Z 的一瞥，Z 说，从此就是他对门巴族整个民族的印象。Z 说，如果懂得绘画，他希望画出那个场景。他一边叙述，我头脑一边浮现出一种戈雅式的画面。

Z 继续说，他更希望他是个画家，不是军人。在大峡谷的驻地，他不多的读物中有一本翻旧了的《德拉克洛瓦日记》。这个有着德拉克洛瓦式目光的边防军人没有时间实现他的想法，事实上，他的速写还不错，源于高中时的爱好。他在进城买回的速写本上画满了各种门巴族人的面孔和劳作的姿态。

雅鲁藏布大峡谷里的男人通常被认为“都是司机和背夫”。伐木工、猎人、采菇者、司机、背夫在一个门巴男人身上重合，其身份也随着每一种营生的季节性而转换。当捕猎被禁止，山林中的野生蘑菇也没有过去那么充裕，曾经无序的伐木业受到管理，人们的一些生存技能逐渐被搁置了。传统的野外生存知识，有一部分也许中断。由于探险家的活动，雅鲁藏



布大峡谷带来新的谋生机会——为科学探险服务，这样的现代营生不仅有别于传统上大峡谷给予他们的东西，也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一丝遗音，在那时，每个踌躇满志的发现者背后都有那么一支沉默不语的运输队伍。

在中国各个地区，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故事：民众的集体力量承载起一桩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成为令人感动、却又迅速在时间中湮没无声了的人类意志和能力的象征。也许会有人书写一部工程史，对这些来自集体力量而又普通的建筑物，进行集中展现，这样的历史会不同于人类文化中那些经典建筑物的历史。生活在地方基础面的人的体力、意志将在很长的时间里，继续承载着各种外来计划的实现。大峡谷的劳动史最富于代表性的事件，也许是2000年墨脱解放大桥的修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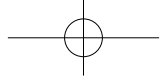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1999年6月一个夜里，奉命在墨脱度过了冬天和春天的Z，正准备入睡，忽然听见类似轰炸的巨响。之前，部队事先预警，上游易贡湖泥石流形成的堰塞湖溃决，洪水将经过这里。人们估计不到水位会上涨到什么位置，事先已经组织人员与物资转移。狂暴的洪水不到十几分钟时间，就汹涌远去了。次日，Z随部队去查看墨脱大桥的情况，这座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已经片甲不留。只剩下一根钢索，一端还系在岸上，另一端在水中巨蟒般摆动。两岸光秃一片，树木全被冲毁，汽车大小的巨石不时滚落水中，被晒干后的泥土显出刺目的金黄色，加之江边冲刷的痕迹与水流的激烈，Z觉得，这一切“又恐怖又壮观”。

由成都路桥公司承建一座新的大桥，这次修建，



几乎动用了大峡谷中的所有人力。从派镇到多雄拉山口一带布满了3千余个简易帐篷，每天至少有500辆卡车流动，Z说：“像个战场。”

由此开始了大峡谷的一次伟大的徒步运输行为。从7月开始，900吨物资全靠人力运送进墨脱。其中一项，是由每个100人左右不等的小组，背负成吨的组装钢索。人们的方法是隔1到2米绕一个圈，由一人背在肩上，由于钢索的长度，走在后面的人看见前面的人，只是一个很小的点。在经过悬崖时，人们必须把钢索放在同一侧肩膀，调换肩膀时，必须所有人一起调换。如果前方有人失足，由于力量失衡，后面的人可能也会随着摔下悬崖。有人体力不支放弃，也有人在事故中遇难。到8月雨季，每背送一次，来回需要走15天。背送队伍中不仅有藏、汉、回、门巴四个民族，甚至还有来自四川的彝族与土家族人。Z对我说——他的目光平静而严肃——他的语言无法形容那个壮观而艰辛的场面，他希望我把他的回忆记录下来。



● 贵州丹寨，一个正实践着各种乡村实验的苗族古村。（摄/姬东）



走向荒野的哲学

贵州，一向是民间公益项目的主要实践地区。也因公益，旅行者开始发现一个不太一样的贵州。但实际情况比游客景观要复杂得多。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描述了人应当如何面对变化中的自然状态，在边缘的山地与贫困地区，每个持不同观念、方法的实践者都为他们的事业带去复杂的、有时是喜剧性的色彩。

本已困难重重的 NGO 工作，在 2011 年底进入全面萧条。勉力而为的现状构成了沼泽，一如那些崎岖的、每到雨季就泥泞难行的边缘地区。1990 年代福特基金会开始进入中国，即强调“面向云贵川地带”。为什么在这个地区有众多的 NGO 组织兴起，外来者和本土人员同时选择这块土地？也许，如同一位 NGO 工作者所说，这里是“所有问题的凝结之处”。

2013 年，我对贵州一些重要的 NGO 工作者进行实地访问，其中包括“贵州乡土文化社”的发起人李丽女士，以下是部分内容。



之前，您的一个观点引起我注意，您说，“经典的‘赋权模式’尝试去打破它原有的架构，其实是没有生命力的”？

郎德是贵州最早做乡村旅游的村寨。在那里我有非常多，非常重要的发现。

这个社区一直是集体管理的，有很强韧的内部管理机制。所有关于旅游的组织和管理，全部由村民自己完成。到了2000年以后，他们开始不断受到来自行政和资本的压力，不断有公司和资本想要进去，政府不断要求他们改制，说他们效率低、保守，想要让大的集团公司、资本进驻，但这个社区一直拒绝，一直在维护自己的家园。在这个社区的发现，给我很多启发。

开始我仅仅是作为志愿者，再后来从兼职到全职，一直在参与这些工作。但这项工作带给我很多困惑。当时，我们是以很经典的“赋权”的理念去工作的，一般是：到了一个社区，我们首先去找那些最弱势、最贫困的人来开会，做他们的需求评估，尝试去改写这个社区原有的权利架构，在这个基础上，去推动所谓的参与式发展。

但后来，我觉得其中有很多事情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过去苗族的一些社区，是长老治理的结构，你的经典的“赋权”模式一去，尝试去打破它原有的架构，其实是没有生命力的。它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权利结构是很坚固的。在十几个村寨之间，有很强烈的乡邻关系，可能会是婚姻圈、贸易圈，或各种圈，要有很多共同的规则来约束，怎么办？就由每个村寨推选一些长老，共同去指定这个社区的公共规则，他们就



是这样实现地方自理的。你看，我们国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以行政的方式渗入，已经很成功地改变了这个架构的一部分，但也没有能够完全改变这个架构，我们怎么就可以呢？更何况我们是一个民间组织，资源那么少。之后，我们对诸如“赋权”这种舶来概念有很多反思。“以权利为本”、推动社区权利结构改变，从而带来一个所谓的社区发展的理念，是不是真的可行？至少在目前，是不是可行？

您提到“我们想探索传统知识的重新运用，有无可能帮助社区减轻对现金的依赖”，能具体谈谈吗？

我们处在极大不平等的环境中。一是信息的不对称，山区、社区的人在市场链条里处于最低端，即使他有很好的资源，也永远处在一个原材料供应者的阶段，永远处在被掠夺的地位。

比如，我们做手工业项目的几个社区，在我们进入之前的 15 年中，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扫货”。小商贩或者收购商，以非常低的价格无数次“扫荡”这些村庄。我们家的一个阿姨，是纳雍人，她家那里的一个村庄周围有煤矿，本来有很好的田地，因为挖煤，地下水全漏了，田就没了。怎么办？出去打工呗。这让一个乡村怎么有“发展”？这和他们的刺绣被以很低的价格收走是同一回事。

是否有可能，不像大规模种植外来品种一样依赖外部资源，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本地资源，发掘自己本地的知识？

我们在不同社区的切入点也不同，比如在河坝是做手工艺项目，在侗族社区大力做侗戏的恢复，支持



● 王炜和朋友们在2013年6月因一项题目叫做“走向荒野的哲学”的工作，对贵阳和威宁乌蒙山区工作的志愿者进行采访。图为其中一站：贵州石门坎。



● 每年，都有好奇的旅行者，以及不同领域的志愿工作者出现在石门坎。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初一位生活在这里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他于1887至1915年期间在该地区传教，曾经创制“柏格理苗文”，深刻地影响过大花苗的群体信仰、文化演变和家园建造。有人将柏格理称作“最成功的NGO”。



后者重建戏台，尝试恢复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在一个叫新光的苗寨，我们从比较功能化的层面来做。比如，现在人们出去打工，往往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对现金的依赖很深。这种依赖，更多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过去在黔东南片区，亲朋好友家里有什么事，送“人亲”都是送一些米、酒、菜，自家出产的东西，但这些年开始送礼金了，对现金的需求就开始增加。因为电视的缘故，大家开始送“脑白金”，觉得这样才有面子，整个时代的转型都是在增加整个乡民现金的支出和对现金的依赖，也加深了他们对市场的依赖。所以，我们尝试在这个苗寨恢复过去的一些草药治疗方式，可以降低一点医疗的支出；恢复一点换工的习惯，在农忙时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就不需要花钱去雇工。还比如，可不可能多种些染料，这样就不用雇佣外面的人去染，又节省一笔支出。我们想探索传统知识的重新运用，有无可能帮助社区减轻对现金的依赖。

可以这样理解，社区应该有权利和机会，用它的文化成果给它带来收益，是吗？

是的。现在，在南部侗族地区，我们打算做一项社区参与的文化纪录。有些村子里的老师或县城的音像店老板，会找人把社区的歌唱或一台侗戏拍摄下来，大量复制成光盘在乡场上卖，卖得非常好。我们去的每个社区、每家都有大量这种光盘，小孩就跟着学唱，好像成了一种另类的文化遗产方式。这使我们受到启发。

我们作为外来者，在社区中发现许多引起自己思考的东西。而社区自身内部的视角，我们可以用拍摄、



绘图等可视化手段保存它，此外，还有口述等资源。这种双视角，也许可以避免那种被经常说到的，把一个地方景观化的问题。不是仅仅由外来推动，而是参与一个社区自我观察、自我整合的过程，这样，一个社区的景观化程度也许就会减弱。

我觉得，景观化是个双刃剑。有时候，你想实现市场价值，景观化是不可避免的。但相对来讲，社区的文化内涵要更为丰富，我们希望协助社区看到，它能够实现的，不仅是景观化带来的收益，还有更深层的扎根于社区生活的价值。如果是基于社区自我的觉醒，那么即使景观化，也没有问题，比如台湾地区“青蛙共和国”的青蛙就很景观化，但并没有带来太大问题。相比这些，我认为社区自我觉醒的过程更重要。就像每个人对生活、对自己的价值实现的理解不一样，不同族群、不同社区对生活的理解也是不同的。

我们支持外来者与社区合作，共同做社区本土的文化记录，其产出，可以作为正式的文化出版物，其知识产权应该是合作的产权，由外来者和本土共有，而不仅仅是外来者的知识产权。可是，目前所有的方式都是：好像那个社区谁都可以去采摘，谁去摘了就是谁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极大不平等。社区应该有权利和机会，用它的文化成果给它带来收益。

不论是苗族、侗族，还是其他的少数民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频繁的社区交流。村寨和村寨之间，过去是有非常丰富和广泛的交流方式的，现在也基本没有了。过去的很多交流是功能化的，比如男女青年要谈恋爱，苗族叫“游方”，侗族叫“行歌坐月”，但基本功能都是一样的。而“侗族大歌”则是社区互相



拜访的竞争性的成果。现在都没有了。现在许多做“文化遗产”保护的人，真的是把文化当成“遗产”来看和对待的，他已经不关心产生这种文化的土壤，仅仅只是关心成果的形式。

我们有时受到质疑，说你们是自己享受现代化的生活，却让农民回到过去。我觉得这是极大的误解。

我们希望以一种动态的视角理解文化。即使是传统文化，即使在过去，社区也不是一种封闭状态，与外界同样有丰富往来，在交流中产生，不断更新和变化。可是它为什么就在当下面临极大的困难和危机？

我们的时代背景是，整个中国都处在一个急速转型的阶段。乡村突然面临极大的变化，最大的冲击，就是人们外出打工。这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价值观，包括社区的整个组织结构、文化传承、教育。乡村的活力在消失，因为，青壮年作为乡村中最有活力的部分离开了，一个乡村又会有怎样的机会？它想发展，却没有人了。

我们做侗戏传承项目的那个社区，老人和孩子都很喜欢侗戏。但唱侗戏是需要年轻人的，那个地方没有年轻人，连一个戏班子都组不齐。怎样把年轻人吸引回来，让一个社区恢复正常的代际构成和年龄构成呢？

也有年轻人尝试回去生活，因为，他们发现在外面打工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并且割舍不下自己的家。也有人因为迫切的现实需求，比如父母老迈，必须回家照顾老人。小孩可以带着走，但老人不能。但是，这些年轻人回来后，乡土给他们的机会实在太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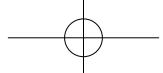


了。我们的乡村缺乏这样的机会和活力。

我们修的侗戏戏台，开始的时候，村民们非常欢迎，他们对侗戏的感情很深，但很多年都不能重振。但他们把戏台修好后，发现自己的村寨，几乎成了那个地区的中心。人们有大小集会，都会来使用那个戏台。我们要透过一些活动，不断地让他们看到这些机会。

我们希望有意识地针对这些人里的年轻人，文化社过去持续开展的大概五六个项目，一半都是和年轻人有关的。我们支持年轻人做本民族的产品研发，还推动社区年轻人组建一些小的团队，比如在黎平县的龙额，有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在城市工作或报考公务员的机会，选择回到家乡做代课老师，有时间和机会去做社区的工作。

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年轻人了。在开始的时候，他们会非常个体、非常个案。但他们能够闯出一条路，有可能成为新的方向。所以我不是特别悲观，有个案发生是很好的，我们要做的只是怎样支持他们。我相信，我们的乡村有机会出产一批年轻人，他们的创意、产品和作品可以放到国际化的层面去交流、实现价值，他们还可以在乡村扎根。如果我们的乡村能够出产一批这样的年轻人，乡村的活力也就重现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乡村其实是有机会的。只是这些机会目前还处在混沌状态，荆棘遍布的状态。我说理解的我们的角色，就是和他们一起去开路，一起去走这个历程。



● 喀什老城的全貌。这片保留完整的传统生活城区如今已被部分拆除和改建。(摄/胡子华)



迷宫消失的喀什

文物课

带我来的人可能因为太熟悉，可能因为风太大，很快缩回大楼里。我被单独留在一座大厦的天台上。我事先没想到会看见这种景象——对于突然从高空俯瞰喀什老城完整的全貌，感到没有准备和一阵子的意识空白。天空中只有很少的光线，但异常刺眼。由于这是 13 层建筑的天顶，风尤其剧烈，城市的声响只能孱弱地掺杂在风声里，一座伊斯兰建筑的尖顶虚弱地耸向天空。我的眼睛也在这种压力下眯起来，像看到一件不能长时间直视的东西一样。

我第三次来到喀什。面对这片古老伊斯兰城区的全貌，我想起英国人凯塞琳·波尔兰德 1898 年书写的喀什。她面对的，也是俯瞰中的城市，同样的沙尘和天空。

我住在艾尼瓦尔家。他请了三个月病假，在乌鲁木齐做完喉咙的肿瘤切除手术后回到喀什。他的说话



声低哑得介于叹息和耳语之间，与他粗砺的容貌构成一种反差。

在艾尼瓦尔家安顿下来的次日上午，我去找另一个名叫“艾尼”的人，艾尼·阿卜拉，在高台一带闻名，他拥有一间自己搜集陈列的文物展览室。起初艾尼·阿卜拉对我有些冷淡，他好像不大喜欢记者。后来他才说起，许多记者来这里采访他，拍摄他的展览室，但是没有人遵守许诺，给他寄回报纸或杂志。在并不太大的陈列室里，他来回跨着大步走动，不断擦拭着他的瓶瓶罐罐和玻璃柜。我跟在他屁股后面，试图同他搭上话。他回答我的每句话惜字如金，桀骜地紧闭着嘴唇。

我不断表现出对艾尼·阿卜拉的藏品的兴趣，他按捺不住，开始向我介绍他的收藏。他的汉语远没有艾尼瓦尔那样流利，并且，一旦激动起来，一个句子的逻辑结构就像羊群般跑散了，变成碎石头般一个个往外蹦的单个词语，我需要自己把这些词串起来，才能理解他的意思。他好像是把辛苦搜集来的词，傲慢地扔给我去缀连加工。艾尼·阿卜拉兴奋起来后，就不需要我怎么主动了。他要求我立刻去欣赏尘土飞扬的高木架上某块布匹上的某种花色，又带我到屋子另一端，指点我观察俄罗斯水壶上刻有“1884”数字的纹章。他叫我摊开手掌，然后抓出一把扣子，从我的手掌一个一个码到小臂上，告诉我它们来自不同的民族。他挑出其中一个黄铜色的扣子，得意而且神秘地对我说，这是蒋介石衣服上的，我问他如何能够确定，他笑而不答。这场文物课的高潮，是他用一根长竹竿，去敲打上下两层木架子上的两排土陶罐子，告诉我声音越亮的年代越浅。最古老的一只，是从著名



的遗迹莫尔佛塔一带挖掘出来的。他神情严肃，反复用力敲打这两排罐子，让我仔细辨认声音的差别，像是在敲打一组乐器。

后来，我发现当每次有人对他的收藏感兴趣时，他都要去敲打一遍那两排土陶罐子。

每天，艾尼·阿卜拉按时打开门上的大锁，向游客重复同一套讲解，展示同样的物品，用他那根教鞭一样的竹竿去挨个儿敲打土陶罐子。我不知道，那些罐子有一天会不会被他敲碎。有时他的介绍还没有结束，游客——基本都是汉族人——就离开了，于是他就在展览室一隅礼貌而骄傲地站着，闭紧嘴唇。

四年前，艾尼·阿卜拉骑了两天毛驴再加上步行，在戈壁滩找到一块他从此引以为傲的“羊头化石”。在我看来，那只是一块形似羊头的风砺石。他挽起裤子，给我看他的小腿，那已经是一条老人的腿，肌肉有些萎缩和苍白，血管明显，艾尼·阿卜拉很艰难地用浓重的卷舌音，向我发出普通话“静脉曲张”四个字的声音，我费了一番劲才听明白。他再也不能长时间步行。他弯下腰，拍打我的脚踝，然后指指自己的，示意他的脚踝也受过伤。这时又进来了一批汉族游客，其中一个人不断打手机，其他的人踟躇着。年轻的汉族女讲解员声情并茂地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的艾尼大叔”，但是没人注意他。他在一边礼貌地等着人提问。很快，他又挥动着他的竹竿去敲打那排罐子了。人们很快散去，展览室又回到一阵空寂中。

当艾尼·阿卜拉傲然地对我说，他可以找到“56个民族每个民族的一件物品”，我才意识到他与文物收藏者的不同。能够找到“56个民族每个民族的一



件物品”，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也几乎没有商业价值。艾尼·阿卜拉的搜集心理是儿童的。他按照一个民族的织物所能有的几十种花色，去搜集纺织品，就像一个少年把一百单八将的火柴盒封面搜集齐全一样。艾尼·阿卜拉说，他在小学时，一次进乌鲁木齐博物馆旁边的文物店转悠，被店主哄赶出来，于是他决定，自己以后也要做这样的工作。军阀势力撤退后、以及没落的地主庄园，成为艾尼·阿卜拉的藏品的主要来源，于是他的藏品中就有了许多战争年代军队使用的锅碗瓢盆，过去大户人家散落的凤毛麟角。他做了28年，头十年收购到的全是“假东西”。我问他，他怎么处理“假东西”，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摔了，烧了”。“搜集了这么长时间，累了”，他说，“做烦了，也没人关心，不想做了”，艾尼·阿卜拉一边说话，大手一边在眉毛的高度用力摆动着。我问他：“你如果不做了，那么这些东西呢？”，他眉毛一耸说：“摔了，烧了”。

如果艾尼瓦尔在场，会是一个有趣的场面：两个都叫做“艾尼”的人，一个能够说流利的普通话却只能哑着嗓子悄声细语，一个大嗓门往外蹦碎石般的词，却很难形成逻辑完整的句子，一静一动，恰成对比。

被镂空的地基

生活在喀什的作家 L 认为，喀什是一个“孤悬”的地区。“外来者对喀什的了解是从想象和文字资料来的”，说到这里他很急躁。在 L 概括中的“他们”——



也许还应该包括过去的我——想象喀什到处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巷道、阿凡提式的人物、地毯和砖茶。当“他们”来到这里时，发现一切并非如此，于是在失望中离开。L说：“由于傲慢，他们得出了失望的结论。”

“尽管喀什地处偏远，发生的变化却非常具有典型性，社会学家应该对这样一个课题感兴趣：喀什老城维吾尔族人社会理解的变化”，他仍然急躁地说：

“直到现在，喀什的面貌仍然是不确定的，有待完成的”，他也希望喀什被放在一个“不确定的、开放的位置”，他说，“我希望听到一种有别于外来观看的，更接近喀什现实和它的未来可能性的声音。”

但是，在“喀什老城改造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眼中，这座旧城在另一种视角下被理解，它不只是用来徜徉怀古的喀喇汗王朝故地，不只是《一千零一夜》中的传奇市井。在“喀什老城改造办公室”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面对一张张迷宫地图般的施工图纸，我惊愕于喀什老城生活系统的复杂性。它的下水道设施亟需完善，陈旧的土木房屋随时可能破损坍塌，紧密狭窄的巷道无法发挥灾难发生时的疏散功能。14万人生活在这里，它不只是一片风景。人们在风景与现实之间找到的一个折衷，是保持外观的同时尝试重建房屋内部的设施：电线和自来水系统需要更新，不再有居住功能的破旧房屋需要拆除，路面需要拓宽。工作人员C说：“这是无法面面俱到的”。

正在进行中的工作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老城的地下遍布地道，也就是说，整个喀什老城处于半悬空状态。这几年，喀什周边时有地震发生，“我们难保



震中总是不在喀什”，C说：“如果真来这么一下，老城就完了。”事实上，老城已经有多处逐步下沉，有的家庭房屋已经发生局部塌陷。我想起L所说的“不确定性”——他也许没有想到，他象征性使用的这个词，在现实中有了依据。现在，整个喀什老城正是坐落在一块不确定的地基上。

密布在老城地下的地道是20世纪60，70年代的产物。单是处于“喀日克代尔瓦扎路”和“艾格莱克基巷”之间一个平方6000~8000米的试点区，地道的密集程度也超出了估计。普查难度不仅在于需要对所有地区做出明确鉴定，也在于老城住宅密布，这项需要钻入地下的勘测工作，并不像在无人的平地上那样容易进行。

问与答

“高台这一带的地道洞口我都知道”，当艾尼瓦尔提起这些地道时，他得意地说。今天这些洞口大多被建筑挡住了。

我同6年前一样游走在一片城区里，去看那些过去看过的地方。这些巷道并不如我记忆中、或者我想象中那样错综复杂，然而6年前我曾在这里分辨不清方向。起初两天里我不知道工作从何开始，直到遇见艾尼瓦尔。接下来的几天里，气候越来越糟。从艾尼瓦尔家的房顶望出去，太阳像个生病的薄片，整个喀什被浓重的风沙紧紧捂住，能见度很低。我想，这样的气候，艾尼瓦尔的喉咙怎么受得了。



喀什高台民居里的陶艺人。(摄/胡子华)



在艾尼瓦尔家里，由于窗台离地面很低，窗台就成了写作业的书桌，磨得光滑发亮。所有的人席地而坐，开始就餐，艾尼瓦尔对我说：“干脆我们也来采访采访你。”

“在贵州，那里许多山，雨也很多，今天这样的雨常常有。”

“那里的山像昆仑山一样吗？”

“不像，那里的山里有许多烟叶地、蓖麻和煤矿，有和新疆一样的兵团单位。”我想说的是“三线企业”。但艾尼瓦尔立刻纠正我，应该说“三线企业”而不是“兵团”。他在克拉玛依也有过贵州同事。

“山里面有路吗？”

“有，都是泥巴路，一下雨全是稀泥。”

“哦，和我们这里差不多嘛！”

“你们那里有少数民族吗？”

“有很多，有苗族，侗族，彝族，土家族，仡佬族和布依族。也有很多回族人。”

“很像我们新疆嘛。”

“北京什么样？”——这个问题没有等到我回答，艾尼瓦尔就用维语说起来，他去过几次北京。说完后他又用普通话对我复述：“我对他们说，北京很大，很匆忙，人很骄傲。”

人们的注意力总算转移到了电视，我松了口气。喀什台正在播放晚间新闻：就在今天，离喀什 60 公



里远处突然下了一场大雪，果园里的幼苗全被冻死。当人们都在注意这段新闻时，艾尼瓦尔突然问我——我想因为我是记者——“伊拉克战场去过没有？”，我有些愕然，只好老实回答说没有。这时，我在艾尼瓦尔那张粗砺的中年人脸上看到了一丝儿童式的失望，让我想起了艾尼·阿卜拉。我对他说，并不是人人都有去“伊拉克战场”的机会和能力，他点头表示理解，表情显示他很快又回到了中年人的理性。

当我在桌上整理笔记时，艾尼瓦尔已经睡下。隔在我和他各自的地铺中间，是一张巨大的桌子，上面摆满各种瓜果零食，很长时间没人动过。平时，他们用一块白布盖住桌子，游客来了，就把布揭开，于是满桌瓜果悦目，游客走了又把布盖上。艾尼瓦尔发出阵阵鼾声，我并不是很能适应他那种工人的浓重的鼾声。我想到，鼾声的浓重可能也同他喉咙的病有关，他呼吸不畅，而这两天我让他说了太多的话。很长时间里我无法睡着，我只好开始看喀什偶然买到的塞格诺芙《骑鹅旅行记》中译本。我随手翻到的一章，是“4月11日，星期二，活着的城市”，这正好也是今天的日期。

这是一本关于俯瞰的书，书中的一切事物全都在主人公的飞行中，从空中的视角去描写。在某种程度上，我试图俯瞰喀什。我想，我的文字就是尼尔斯骑乘的鹅——那个斥责他、又宽容他的伙伴，相比其他的鸟类要显得笨拙，但是毕竟负载他到了一个能够俯瞰的位置。我想，离开喀什前我还要去那座13层大厦的天台，再看一眼城区全貌，此刻我正身处其中。我还想，我要为那几个小孩朗读这个故事。



● 电影《冬眠》剧照。



冬眠的山野

数月前，画家胡柳对我讲述在陕西的经历——十年前，她牵着一头毛驴在陕北丘陵之间，徒步旅行了近一千里路。那里的山地使她重新理解范宽。她用这次旅行制作了一件行为、影像作品《信天游2014》，参加了上海双年展。作品由三个部分组成：1. 十年前牵着一头毛驴在陕北的长途徒步旅行；2. 民间说唱表演，这部分会邀请当年她走过的村庄的说唱艺人将她和毛驴的故事用三弦说唱的语言转述；3. 请我写一首诗，用我的语言转述她在方案中提及的内容。

盲说唱艺人是胡柳这件作品的主要构成。这个盲说唱艺人团体，迄今仍然生存在陕北，也是年轻的陕西导演白志强在几年前的一个冬天里，拍摄制作的纪录片《边走边唱》的主角。我为胡柳的作品写的诗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怎样概括外观》的片段如下——



“一千里，我牵着驴
穿越长久沙化的残积带。
也许一次徒步旅行能够
改变我们失败的透视法。
我让一座山点满油灯，这短暂的
个人石窟会成为临时坐标
重组这坎坷的丘陵世界吗？

我研究山，脆弱的山和变动中的山
走进新时代的山和地理学已死的山
我在一个发迹的高原写生，并不挑选
不论那是范宽的山还是游击队的山。
乌云密布时，天空也在一阵
羸弱的反光里，经历着演变。
泥地也起伏有致，像刚刚被拓过。
沼泽也能照耀我们。这泥泞也分五色
怎不见入人山水呢？
含混的地面始终无法成形，无法辨别
但在隧道里踉跄之后，刚冒头的一眼中
一切也能清楚地闪烁
泥泞也从各个方向，主动黏附，乌合如地球概述。
我经过隧道像穿越虫洞，失去没影点，我就数铁轨。
沿着黄河上游漂流下来的杂物
我不能走远，那是一种历史语言吗？
(.....) ”

经过一些时间后，我重新接受了过去被自己偏见
对待的中国画里的自然场景。但我仍然只能部分的，



而不能像朋友那样，全心接受那些古老图卷上，被数种深浅不一的黑色绘制的山峦与孤峰。它们在水泽边相互掩饰，消失。不过，我喜欢画卷中那些古老地貌所具有的性格，把它们当作还不是宗教的或政治的山，也不是现实历史之前的山，不是乌托邦。在那些画卷里，在某些时刻，这些山峰脱离了释义，在纸上成为一些或重或淡的黑色的事物，一些耸立着的、中间的事物——它们不处理现实阻力，不处理意义，表达它们也只是一些有关事物的理想形式，有关用词的微弱活动。我把这些山峰当作一些暂时的时刻的化身，那些画下它们的人，在这些山峰面前停留了片刻——在现实力量和个体的虚弱之间，这是一种次要的自由。面对这些图卷上的山，仿佛面对着一一些器皿，它们盛放着空间的寒冷和无限。相对于历史和现实，空间的寒冷和无限是不变的事物。

很长时间里，制度和官员的历史带给我阴沉的感受，它像一扇墓门，散发出制服、名讳和官衔的气味，是血迹和关于放弃的哲学——同时，它也塑造了一些有时黯淡、有时清晰的山峰的历史。

我想起在许多年前，在一座西南山脊上，云气向上飞速移动，像一条身躯模糊的龙在我身边活动。我目睹它接近我，把我裹在其中，在潮气和寒意中什么也看不见。就这样过去一些时间。在天亮前，云气移开时，世界显得尤为黑暗。

罗兰·巴特用“西南方向的光亮”来概括对故乡的记忆。对于我，需要改为“西南方向的云层”。2011年冬季，春节后不久，我在大巴山中再次看到这样的西南云层。这里和中国许多农耕地区一样，大



部分人前往城市生活，离开空落荒芜的、仿佛在被自然界回收的村庄。这里的农田迅速成为荒地、房屋坍塌降解，曾经的山路消失在灌木里，仿佛自然界迅速回收了这一切。我的一位朋友、小说家卢一萍出生成长在大巴山中，他在这个冬天返回，试图对接近荒废的祖屋进行修缮。在寒冷的深山空气中，我们每天缩在他母亲的家里，烤着炭火，吃上一顿鲜美的腊肉火锅。

通向卢妈妈生活着的村庄的道路，可以让县城里最有耐心的司机也视为畏途。这些道路在山中沤烂，遍布裂纹和沟渠，因此步行三个小时进山是人们通常的抉择，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时刮去脚底沉重的泥。我们穿行在成片的桉木林中，在大炼钢铁的时代过去后，人们大量栽种生长快速的桉木，想尽快恢复林区面貌，但这种树种具有极强的侵略性，占领农田，使其他一些树种不能生长。有时，我们会走进一阵路过的云气里，说话声也仿佛因为置身于冬季的烟云而模糊了一些。这些深山的云雾，仿佛因为是在冬天，具有某种特殊的、熟悉的潮湿气息。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感到我回到了西南。

曾经在新疆度过半生军人生活的卢一萍，本想捐赠一笔钱，好让通向他母亲房屋的一段道路得到修缮，但各种现实原因打断了他理想化的想法。道路坎坷的大巴山，也是一些公益组织维持基础工作的地点，他们的项目以教育和乡村建设为主。在大巴山的十几天里，有几天我暂别朋友一家，在山中辗转，去看望山脉另一侧的朋友，他们在那里进行一桩支教工作。我的任务，是代表他们的团体的一个带头人去犒劳他们一顿大餐。如今，那些从事一年支教工作的年



轻人们，已经远离了那个山村学校孤独、清苦的冬天，回到城市继续攻读学位或工作。由于工作原因，我在云、贵、川的不同大山中，认识了不同性格和思维方式的支教年轻人们，他们有的理想化，有的是怀疑主义者，有的平静，有的情感脆弱。我记得，一位在西南的冬天里冷得手上长了冻疮的北方年轻人对我说：“有时在这山里，学校周末或者放假时，也不想进城，只好看书、睡觉，觉得自己好像在冬眠”。

一周前，到杭州做一个关于写作实践的分享活动之前，我在北京观看了留比莫夫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的戏剧《群魔》。喜欢反文学的戏剧美学、或认为戏剧应当主要由肢体来构造能量空间的人，可能不会喜欢这出由传统的台词量来完成的戏剧。在《群魔》中，与魔鬼相反的，不是神性，而是冷漠的虚无主义者——这位虚无主义者对社会捐赠和公共服务工作提出尖刻质疑。

公共服务的困境又成为敏感的艺术家的关注主题。在刚刚开始传播的土耳其电影《冬眠》中，导演锡兰以自己的方式重述了这个主题。主人公是一对有文化的夫妇：男人是个学者，女人是个公益工作者。在云雾和大雪中的卡帕多其亚山地乡村，夫妇俩和今天现实中的一些公益工作者们一样，在风景区建立客栈，同时做建立乡村小学的募捐工作。

通过这对夫妇的婚姻危机，锡兰以自己的方式，以含蓄和美观的影像，复述了《群魔》的诸多平行主题之一：如何理解基础面，以及在乡村基础面中实践公共服务的困境。信仰问题仍然是《冬眠》的轴心。夫妇的对立面，并不是世故的社会人员，而是自然力，



是他们服务的基础面和服务对象——《冬眠》中，他们的对象集中表现为一个酒鬼，后者把女主角捐赠给他的一笔钱扔进了火堆，说“你很高尚，但是像我这样的人，不能接受你的善意。”在去杭州的列车上我一直想，这个酒鬼是什么。我发现，他的意义，首先正是对意义的打断——对我们习惯于抱持的意义的一种真实的打断。他是我们身边处处可见的人，是我们面对的自然力。

酒鬼把钱烧掉的行为是《冬眠》这部电影的真正高潮。我们这些7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包括我的朋友卢一萍在内——都记得早年所接受的诗人亚里士多德的教诲：诗人要对自己进行“非个性化处理”，要建立“客观对应物”。但是老派人文主义者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依然是很理想化的。锡兰电影中的酒鬼告诉我们，“客观对应物”有多么不符合预期，有多么违反“人性的、太人性”的逻辑。如果说，酒鬼是我们的“客观对应物”的真相，那么，可以把我们的写作语言也理解为是一种捐赠或馈赠，因此，今天我们经常面对的，是一个被打断的时刻。而这恰好是我们的出发点。对于我们这些不论是语言方面的、还是物质方面的遭遇中断的捐赠者，电影给予了一个温和的理解，认为人们面对的现实是一次冬眠。

在《冬眠》中，女人用哭泣面对这种打断，因为酒鬼的行为使她感到长期建立的道德、责任和生活意义的秩序崩溃了，而她的丈夫——那个犹豫的知识分子——从来不与酒鬼照面。女人的哭泣是美丽的——她的哭泣，并不是她面对的对象哭泣。

在我的一些南方朋友的写作中，在他们的长诗和



小说中，充斥着南方的、女性的哭嚎声，这让我想起南方民间丧葬服务团体中的那种表演性哭嚎，那是一种更真实的、具有历史内容的哭泣。这些南方写作者的文本中，往往还有乡村法庭的、戏文的、家书的、独白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声音。

地缘政治作家罗伯特·卡普兰在一篇关于果戈理的短文里，阐述对自然力的看法，认为多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经常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地区、也是早期地理大发现和殖民竞争时代的角斗场——的自然力正在复苏，必须被认真面对。这些山地的自然力——詹姆斯·斯科特命名为“不被统治的艺术”，我的一个在大凉山从事一项彝族研究的朋友称之为“不需要中心的人”——一直存在着，只有早期俄罗斯作家对其作出过深刻的表现（譬如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对内亚山地族群和俄罗斯政府军之间的冲突的表现，以及果戈里在《塔尔斯·布拉巴》中的史诗艺术）。这些人，表现了“不被统治的艺术”的人，“不需要中心的人”，再一次成为写作和思想的对象，一种打断我们、发出呜咽的、哄闹的、絮语之声音的对象，一种说着“要记住”这句嘱咐的鬼魂。

罗伯特·卡普兰所称的自然力同样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中。只有面对它，我们才可能获得一种思想上的还乡——返回到自然力，也返回到那个酒鬼式的“客观对应物”面前，返回到西南方向的云层下冬眠的山野。



●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的蜡像陈列。



“不完全”的沈阳

刚到沈阳第一天，“失败书店”的主人潘赫就带领我步行了解这个仍然遍布着满铁时代和奉系遗迹的城市。如今，也有许多朝、韩、日、德的人们生活在这里，形成多元的城市文化空间。“城市空间”是出身自艺术史的年轻学者潘赫关心的主题，从法国求学归来后，他继续把这座故乡城市当作他的第一生活空间。

另一位在沈阳生活的城市文化研究者王泽音认为，沈阳一直处在一种他称之为“不完全”的状态中。他所理解的“不完全”，主要指沈阳在当代城市建设过程中由于“大环境”原因，每个时期的建设都时时中断、最终无人认领的情况。也许，这种不完全的城市形态，有助于改变我们关于社会地形和城市生活基础面的既有认识。

一种常见的现象是，同一个省份空间里的两个主要城市会形成某种竞争性的对比关系，这种“双城记”在沈阳—大连、成都—重庆（后者成为直辖市后



的主体认同也在发生变化）、广州—深圳等等。相对于“不完全”的沈阳，大连一直在“放大”，覆盖辽东半岛，这里的人造地平 and 填海造地规模宏大。一种观点认为，大连是东北对外部世界的模仿。

在潘赫的理解中，大连是殖民时代的自由港，作为现代城市的典范，其治理水平和技术并未随着改朝换代而有所改变，城市的富足也持续着，因此，从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来说，大连对外部世界的变动都有一种冷感。但吊诡的是，本地青年人去一线城市的比例又很高，这是因为大连的日常生活情境以及人们的生活心态和一线城市并无区别，而沈阳年轻人多数会因不认同一线城市的生活情境和职场竞争伦理而留在本地。不过，由于巨大的过境资本经过，所以大连从来不可缺少暂时来工作的高才能年轻人，但他们又几乎不会长期留在这里（大连房价是沈阳的4~5倍），因此在缺乏问题意识的情况下，沈阳—大连的地区文化，一直在往小资而非深刻的方向发展，缺乏某种文化延续性。同时，沈阳由于资本真空，青年人空间很大，相比之下，潘赫认为，大连青年人很难找到城市缝隙。

走在沈阳的街道上，我感到仿佛走在一个20世纪90年代初的城市。这里的“城市缝隙”比比皆是，陈旧而美观的近代建筑和仍具有强烈生活气息的“赫鲁晓夫楼”，成为年轻人开设各种小巧的咖啡馆和酒吧的选择。

潘赫告诉我，正常上班的沈阳青年比例已经很低，从中也可以看到资本流动和青年状态的关系。东北城市经济的跌落，反而促使年轻人开始破除中国迷思，



● 沈阳的“失败书店”，也是沈阳青年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一个连接平台。



重新思考东北亚的文化身份，已经有不少人有实践的尝试，但一方面缺乏外部链接，另一方面缺乏观念的辨析与梳理。

对于沈阳，潘赫认为，他越来越觉得，沈阳在国家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双重夹击下失败（资本退出这座城市，城市里资本匮乏），这件事，对于城市和城市中的青年，未尝不是很好的事情，提供了彻底摆脱前两种资本及其伦理控制、并创造另一种生活形式的机会。

几年以来，潘赫一直在经营他的“失败书店”，在他对我说这些话前不久，一位地方文保志愿者来到他的书店，主动要求把自己收集的所有关于沈阳的大量资料拷贝到潘赫的电脑上。潘赫希望，依托书店平台，让这里成为向公众无偿开放的沈阳历史资料的电子图书馆。

一系列当代事件，促使我们感到处在一种无可避免的共时性之中，这种共时性以“最难被面对者”的面目出现。这些事件提醒我们，东北已成为一个虚空。按照潘赫的理解，东北是个“归零地”。因此，我们去东北，希望在这里共同工作，通过戏剧、关于思想和写作的共同分享，寻找一种新的思想开端。

我们认为，东北蕴含着比突发事件更重要的力量，并不是说这种力量是“东北性”的，这里没有“东北性”——这不是追问如何通过地域性而自我赋权的时刻——而是这种力量正在以无可避免的逼近发生在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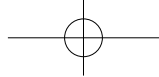
我们感到，这是一个潜在的历史空间应当被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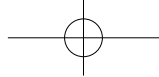
回应的时刻，我曾在《罗曼·冯·恩琴》中部分涉及了它（尤其在第二幕“极昼”），但不是这部诗剧的主要目的。我并不反对把《罗曼·冯·恩琴》视为一种洛特雷阿蒙式的“相遇”。《航船》不仅是一次更极端的“相遇”，也是聚集，创建者与毁损者的聚集，聚集了潜在的和将要到来的争吵、愤怒和反常的互相承认——这种承认被“无意识的理性”所达成——聚集了一种必须处在某种极限状态中才能够对抗被化约的共时性，或者：共振。

在音乐家肖寒先生的家中，我们听他为我们演示一面萨满鼓的鼓声。这种鼓声摄魂夺魄，仿佛让我们立刻接触到一种遥远但是又同在、只是这种同在被忽视了的教育。这种教育曾经在一个民族的史诗中存在。接下来，肖寒先生会参与我们在东北的一场戏剧《冷水坑》的演出。这场戏剧由在沈阳生活的各领域艺术家共同制作，肖寒先生会在这场演出的一个重要环节完成萨满师的咏唱和鼓声。

我个人希望在这次工作中，询问东北民间文本中的潜意识话语，它并不发生在成为事件的欲望中，也不是有利于那些“不能直接归为行动的元素”进入事件的策略性手段。但它是我们有可能重写或重构“何为开放性”的必要参照，是回归的萨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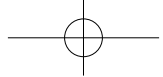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 大连金石滩的海岸。



朋友的去向



Chapter 3



● 大连渤海边的一个传统渔村。(摄/陶金)



渤海的形象

在最近一次沿渤海旅行之前，一个朋友给我看他的小说草稿。在小说结尾，虚构的 2019 年，北京与渤海之间开凿了一条深水运河。人们可以从通州乘船入海，还可以继续驶向大洋流域。小说的主人公乘坐北京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游轮，离开通州不远，就见到了水母。

维利里奥在《战争与电影》里提到，日俄战争时的旅顺口战场，探照灯第一次被使用。维利里奥写道：

“1904 年……在战争的历史上，第一次，亮起了一盏探照灯。这第一只‘战争的探照灯’在旅顺口的高地上照向对方，其光柱散发的炽烈强光聚合了以前那些战争的所有火炬、所有烽火。它的光芒不仅冲破了黑暗，冲破了日俄战争的一团团晦暗不明，也冲破了未来，在这个转眼即至的未来，侦察，即‘监视的机器’，很快就会采取与作战机器一致的节奏发展……”

在维利里奥的华丽行文中，1904 年的探照灯成为一个未来主义视角的经典时刻。事实上，渤海曾经确实具有一种旧式的未来主义风格，它是一系列殖民



时代的准帝国风格的城市；是新建的工业园区，其中一部分因为使用率不高而荒废；是巨型文物般的“瓦良格号”——今天是“辽宁号”——的最终归属，帕斯捷尔纳克曾经在叙事长诗中写到这艘巨轮上发生的哗变。这片内海更早的名字：北洋，也意味着沉睡在它的海水里的斯捷潘·马卡洛夫旗舰。大连—天津—青岛，构成一种近代史视野，在今天，这三座城市里依然保存着北中国较为集中、完好的近代建筑群。渤海湾的历史，可以通过三种事物来理解：殖民地、屯兵之地和今天的工业园区。

我的小说家朋友对这一区域的老派未来主义幻想，奇怪地与发展中城镇的贫瘠感结合在一起。“我是渤海的观察者，这一点对于我已经足够了”，他说。他告诉我，他不准备再扩大自己的领域。他声称，在少年时的一个冬天，他甚至在秦皇岛的海岸看见过海豹。这一带，也是鸟类迁徙路线上的一处重要休息点，每年，他的个人博客里会贴出他的大量观鸟照片。他试图纠正我的印象，在我看来，渤海的海滩是一些简陋的海鲜餐厅和不恰当的度假村建筑，并没有那种耸立着嶙峋、有力的悬崖的海岸——并没有那种普希金可以站在那里说“别了，自由的元素”的海岸。今年，漂浮到大连海滩的鲸的尸体、以及时间段接近的一次“荧光海滩”现象，使他兴奋不已，对于他来说，这些都是渤海具有海洋生命力的证明，而不是一个平庸、次要的内海。

朋友邀请我和他共同完成一种对渤海的想象。20年前，我第一眼见到渤海时——也是海洋给我的最初印象——宽广水面的枯燥感和刺目的正午强光，和一种不能长时间直视、极为单一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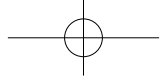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使渤海给我的印象，一直是枯燥与强光的结合。不过，有一天，在大连的大窑湾开发区，我看到过一些有力的景象。强风把海面——我觉得，是把地球的一部分弧形的球面刮得动荡不息。海水冲撞天空，就要涌进天空。目睹海水中的大型机器和滚动的波浪——以及，也像是在波动着的天空，一瞬间里，我仿佛感受到天空与地表的共同运动。

2012年，在大连地区随处皆是的填海造地工地附近，我在一艘渔船上度过了一整天。我的船长不时和路过的其他渔船喊话，并且对我抱怨当下可供捕捞的海洋生物的稀少。他很崇拜一种远洋捕捞巨轮，他说，他见过一艘那样的船，他需要努力歪着脖子，才能看到大船顶部。这种他称为“航母”的大型捕捞船，在远洋作业过程中已经完成加工与包装，像一个游动的工厂，海产上岸就可以直接进超市了。

我立刻把这艘巨轮转告给小说家朋友，这是会让他兴奋的事物。很快，他回复我，这让他想起他最喜欢的一段关于海洋的文字——《巨人传》里的一个奇幻的时刻：“庞大固埃怎样在海上听见解冻的声音”。

庞大固埃等人正在海船上海吃海侃——就好像我们一样——那里是“冰海的边缘”。庞大固埃听见有人半空说话，但看不见人。其他人照他吩咐竖起耳朵，“像牡蛎张开壳吸取空气那样，仔细谛听有无声息，并且为了不漏过一点声音，有几个人用罗马皇帝安东尼乌斯的方法用手掌挡在耳后。但还是什么也听不见。”但接下来，他们听见了空中人群的说话、喊叫声。这是初冬的一场鏖战之后，战乱的声音在冷空气中冻住了。直到春天，声音“溶化出来”，被路过



● 大连开发区的海岸工厂。(摄/陶金)



的人们听见。

庞大固埃对同伴们说：“……我曾经读到过，一位名叫贝特洛纽斯的哲学家，他认为许多世界都是以等边三角形的方式彼此衔接着的，正当中是‘真理’所在地，那里便是‘语言’、‘概念’、‘意识’以及一切过去和未来事物的‘形象’所处的地方；围绕着这些东西的，便是‘世纪’。若干年后，彼此距离很长，便有一部分像感冒似地落在人类的头上，就像露水落在基甸的羊毛上，另一部分停留在原处不动，直至‘世纪’的结束。”

在这段微妙的寓言之后，巨人说，“我记得亚里士多德认为荷马的语言是动荡的、活动的、总之是活的。……柏拉图之理有如在某处的严冬里说出来的语言，一出口便冻结成冰，不能听见。……现在倒要推理和探索一下，这里是不是语言解冻的地方。”然后笔锋一转而讽刺娘气的俄尔浦斯，继而，庞大固埃从这些回荡海天的声音里细读字意——当然是严重不靠谱的——临时总结出一番冻结之声的语言学。

紧接着，他们来到“艺术大师的王朝”，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腹语人，另一种是崇拜肚子的人。作为治理者的“艺术大师”训练各种飞禽走兽说人类的语言，以便召唤和诱捕它们，只是为了满足饥肠。

我和小说家朋友也曾经在大连海岸，以及北戴河的海边胡吃海侃，有时，我们醉醺醺的，他在散发着腥味的海风中，关于海战时代的历史滔滔不绝地说话，远处传来填海造地工地的施工声音。也许，在他酒后的睡梦中，这一切会幻化为海战时代的声音。他告诉我，他所进行过一次田野考察的结果，使他认



为，“渤海是被包办的海”。在作为养殖区的近海上，通过各个承包商的势力范围，可以勾勒出一条海岸线的势力格局。他对近海管理的说法不一，有时不自信地说“十几公里之内都有监控吧”，有时又很强烈和笃定地纠正说，是“几十公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整个渤海和黄海的近海是一片被严格管理的养殖区。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渔村会成为填海造地的工地，一些常用的小型码头很快会消失，本土渔民也被统一规划到几处固定的大型港口，便于管理。

在夜晚的滩涂边，工地里的探照灯光束深深刺入雾气，使我想起维利里奥的探照灯。但是，以后我没有找到更多资料，可以证实维利里奥的说法，

之前，我已经写过两篇关于渤海的文章。渤海进入我的想象，源于2011年在大连的一次采访工作。经历过包括漏油、PX等一系列事件之后，那位“渤海观察者”的想法越来越悲观，他认为个人不再可能产生对“现实”的全景理解。就像大连开发区那些休闲海滩一样，覆盖着沉重的、美观的鹅卵石。人们在夏天太阳光强烈的时候，在鹅卵石地面上闻到的油污味。

当时，为了写作文论集《近代作者》中关于莱蒙托夫的篇目，我正在阅读这位诗人的全集，一首写于1832年的短诗《接受这封怪信吧》引起我的注意：

接受这封怪信吧
它从遥远的海滨寄来
这并非保罗所著的圣书
而是保罗亲手给您投寄。
唉，这城市多乏味
到处只是水，雾气弥漫



满眼尽是红衣领
像尖顶堵在你眼前
没有好玩的流言，一切都严峻
法律坐在人们脑门上
一切既然那么惊人、新奇
可又没有一则不落俗套的新闻
人人都那么自我得意
不过问他人的安危逆顺
我们称之为心灵所向的一切
竟没一样有自己的名称，
我也终于看到了海
但又是谁把诗人给骗了——
从那命定的海域
我并未汲取伟大的灵感
不，我不像它那么自由
我有病，患着人生的痼疾
（刻意同过去和今天对立）
但一如从前，我并不妒忌
它那泛着银光的衣衫
它那奔涌不息的波澜。

这首诗立刻触动了我，那个“雾气弥漫”的“遥远的海滨城市”，对于我而言，其特征仿佛“达尼宁”——也即大连。诗的中部起转折作用的诗句是：“但又是谁把诗人给骗了？”——接下来几行诗，关于海的反光闪闪的运动的表面，这里的暗示是：那个欺骗者，就是海本身。

我把这首短诗用电邮发给我的小说家朋友，我对他开玩笑说，他是被渤海欺骗的人，“渤海的形象”比他预期中的更为乏味。他立刻反对我说，渤海的生命力依然具有意外的可能性，他曾听一位渔民说，后者儿童时代在渤海里还曾经看到过海豚。他还试图把



鲑鱼圈这样的新兴工业区，写进小说里。但是，自相矛盾的他又最终得出悲观的结论：半个世纪以来，渤海无可挽回地成了一个有病的海，一个弱海。

2012年夏天，我与同伴从辽东半岛出发，沿着朝、俄、蒙边境开车旅行。离开黄海以后，满洲国的遗迹逐渐稀薄。然后，在黑龙江沿岸的城镇博物馆里，有完好的猛犸象化石，也有被居委会文化活动同化了的萨满。我们的原计划是，从旅顺口开始，到乌兰浩特成吉思汗庙就算是结束。但之后我们又折道去了阜新，去看海天煤矿的大矿坑。回来后，我在南戴河住了一段时间。我刚住到这里的第一晚，遭遇今夏最剧烈的一次暴雨，飓风使房子整夜都在震颤，使我感觉整栋大楼会顷刻碎裂。而我也想这样写完手上的东西。

我住在这里时没有丝毫想回北京的想法。我重读了莱蒙托夫一系列关于内亚山地民族与俄罗斯政府军之间的战争的叙事诗。重读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并深受感动。此外，我读了一些关于东北亚历史地理的书。我还潦草地写了几页诗剧《罗曼·冯·恩琴》里的内容。诗剧《罗曼·冯·恩琴》关于不成立的、随随便便对空间的确立，关于不成立的自由，关于不成立的，野蛮的对空间和群体的划分。以及，关于敌意的一些样式。它像一种“V”字型的東西扎在我脑子里，我只有像电影里的医生一样——在那部电影里，战船上唯一的军医腹部嵌入了一块弹片，在没人可以帮助的情况下，他必须自己为自己做取出弹片的手术。一个写作者只有自己帮助自己——这是我们在少年时就明白的道理——取出作品。而且那个医生的情形比我更好一些，他还有个紧张但听话的笨蛋为他



端着镜子，因为他需要从镜子里看到腹部的伤口。不过，我也是我自己的笨蛋。

这期间，小说家朋友催促我，写一点关于渤海的东西，仿佛作为一个主题的“渤海的形象”，是我和他之间的一个友谊契约。但我没什么打算，甚至连一首像《接受这封怪信吧》那样的讽刺短诗也没有写出来。不过，我可以把一个关于海洋的梦告诉我的朋友。

在周游东北的路上我做了这个梦——在夜间的海上，到处是磷光（可能因为我一直记得查尔斯·达尔文《旅行记》中一段关于“海上磷光”的描写），一个人在不断对我说话，说话的内容关于波浪、死人和灵魂。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他样子看起来很普通，是个中老年人，有些佝偻，带着顶老年帽（又有些像福尔摩斯那种帽子），说话有点咕咕哝哝的。他一直在我身边，在船上（似乎是一艘大帆船）。后来我知道，他就是海神。

朋友回复说，他喜欢这个絮叨、平凡的海神。



● 上都堪称一处纯粹的遗址，没有仿古建筑，没有广播喧嚣，没有古装拍照，空寂的金莲川草原在太阳强光与风声中展开。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一条巨大的中轴线，按照刘秉忠的设计，这条强硬的直线往南延伸，直至与北京（大都）天安门中轴线相接。



上都与虚空

俄罗斯作家佩列文在小说《夏伯阳与虚空》里写道“黑暗男爵”、自称为“成吉思汗转世”的“白可汗”罗曼·冯·恩琴，去年，我用他的事迹完成了一篇诗剧。佩列文的小说使用恩琴的另一个名字“荣格伦”。小说中，荣格伦说道：

“凡是能够登上存在于‘虚无’中的王位者，您知道最终会去什么地方吗？我们管这个地方叫内蒙古。”

我把这句话转赠给此次内蒙古之行的同伴老薛，一个好奇心和提问习惯有点像国产电视剧里微服私访者的人。

另一个同伴、作家张亦霆盼望的大雨久久不至，他指望在这次内蒙古之行，看到草原上雨后生动多变的天空。一架飞行摄像机嗡鸣着，掠过我们头顶，几个人在远处的城墙废墟上遥控，据说是为好莱坞采集素材。闪电河已近于干涸，乌云在西方的天空停滞，并不接近。上都堪称一处纯粹的遗址，没有仿古建



筑，没有广播喧嚣，没有古装拍照，空寂的金莲川草原在太阳强光与风声中展开。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一条巨大的中轴线，按照刘秉忠的设计，这条强硬的直线往南延伸，直至与北京（大都）天安门中轴线相接。这是一个坦率且近乎偏执的设计，在这种意志的图解面前，世界可以被直视，并被迫平坦。然而平坦也是这座都城的最终面貌，作为一个帝国的遗迹，它缺少矗立之物，没有宫殿废墟，没有纪念碑，可供领略的只有这条被遗忘的直线，如今成为北京与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之间农耕区与牧区的渐变地带。

河北人刘秉忠，这位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城市规划者、数学家、政治家、玄学家、以及当时中国北方的主要文学家，有点像一个元代的斯威登堡，在为忽必烈帝国建造了这座都城之后，又建造了北京，犹如上都的放大版本。在刘福通的红巾军毁灭上都以前，这两座处在直线两端的方形大城是东方中心。

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分析了一系列现代城市的构造形式，认为“国家的视角”即现代国家自上而下的控制与治理的视角，这一视角明确体现在城市设计者的空间规划中。综合来看，上都与北京之间的这条直线，是一次跨度辽阔的“人造地平”行为。刘秉忠，这位人格上具有争议而又才能卓越的人，为忽必烈贡献了一种垂直的治理术。在帝国的意志面前，是一个可以被直视的世界。德国学者阿尔弗雷德·申茨在《幻方——中国古代的城市》中，认为忽必烈在萨满巫术与汉人礼教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形式，体现为“幻方”。阿尔弗雷德·申茨写道：

“（马可·波罗）对于元大都那完全处于控制之中的生活和严格管理、以及刚刚废除的宋王朝的都城



临安（杭州）那松散休闲气氛的描绘，向我们提供了中国城市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神圣之王’概念的恢复自然伴随着‘幻方’概念和‘神数’体系的复活。当蒙古皇帝决定建造一个新的首都（北京），这些概念被用来设计布局，就不足为奇了。受传统主义的汉族官僚的支持，皇帝命令将《周礼》中神奇而神圣的‘幻方’僵硬地应用到城市布局中。形式主义的以及对于甚至是细微末节的绝对控制，不但渗透到宫殿和整个城市的布局，而且渗透到城市人口的生活。”

接下来，阿尔弗雷德·申茨认为，抱持已经失去生命力的僵硬的“幻方”观念，使忽必烈时代的中国向僵化发展，其影响一直延伸到清代满族王朝。

我不知道瓦尔特·惠特曼在《歌唱那神异的正方形》一诗中所写的正方形，是否与幻方有关，诗中非常随意地铺陈了来自东方宗教和基督教的术语，他写道：

“歌唱那神异的正方形，从那个‘一’中前进，
从那些边线中
从旧的和新的，从那完全神圣的正方形
坚实的，四边的（……）
我残忍，从不饶恕——凡罪人必死
因此谁也不希望怜悯——季节、重力、约定的日期
会宽容吗？我也不会，
只会像那不饶人的季节、重力、约定的日期那样
我从这一边执行坚决的裁判，毫不留情
（……）
伟大的球形世界、太阳和星辰以及人类的生命，
我，普遍的灵魂
在这里完成那坚实的正方形，而我最坚实，
也通过这些歌在呼吸和生存。”

与阿尔弗雷德·申茨的看法相反，僵硬的幻方在



●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忽必烈曾在此登基建立了元朝。



惠特曼的诗中生机勃勃。诗中的方形崇拜突兀而又异常肯定，仿佛是一种忽必烈的自白。在这首诗中，惠特曼并不像一个民主主义者，倒像一个宣布法典的祭司，一个赞同垂直的治理术的人，一个赞美“上帝之鞭”的垂直打击战术的人。

每逢一年八九月之间，我总想去一次内蒙古，但最近的一次已经是两年前，彼时我们从北京经过旅顺大连，沿海岸深入东北，又沿黑龙江到达漠河，再由漠河翻越大兴安岭进入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在那里，每年春季，从事草原治理的工作人员要从西旗出发，沿着边境维护一条数公里宽的防火隔离带。蒙古国边境的草种必须每年烧荒一次，才能良好生长。由于风从蒙古国往中国方向吹，火焰常常飘到内蒙古境内。工作人员必须花费几个月的路程，清除防火隔离带的野草。

在洁净空旷的上都镇，一到夜里，忽必烈广场灯火通明，堪称我们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经历过的最独特的中心广场。一座粗糙的忽必烈纵马指示的雕塑安放在广场正中，雕塑四周是介绍元朝历代君主的浮雕墙。从各方面来看，这座广场像一个微缩版的上都，青年人的活动区、儿童区、中老年的广场舞区域、小商品售卖区被有序地安排在一个巨大的方形空间里，互不干扰，甚至还容纳了一个足球场。它的规划者颇有刘秉忠的风格。不过，不会再有一个马可·波罗为此赞叹，张亦霆是中国特色的城镇中心广场的厌倦者，老薛则继续他的好奇心。老薛问我，有没有一首关于上都的诗被广为人知。

我只好提到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这首诗很



著名，但却有些平庸，不过，它倒确实是为英诗贡献了对上都的想象，尽管是诗人做梦以后的产物。诗中对上都的想象，原型可能来自《马可·波罗游记》——不断有历史学家对其提出怀疑。

在英诗中，乔叟—马洛—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是最后一个）是同一个诗人的几个时期，“诗之空间”建立于霍布斯式的古代自然世界而非“国家”。艾略特反感古代英诗，反感弥尔顿至拜伦这一群体，发掘出玄学诗人去抗拒，但他并不是一个护教诗人，他是国家主义者。《坎特伯雷故事》和《荒原》均以“四月”为开头，这是两种“四月”——乔叟的与艾略特的，后者颓萎、严肃，前者欣然肯定欲望。在乔叟笔下，欲望激发诗中世俗图景的生成，笔下的自然状态是古代自然，而不是帝国的自然。在“国家的视角”眼中，欲望和“自然”是失去的治理对象，是“荒原”，而“荒原”也是“野蛮人”的地区。

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里数次提到蒙古人，马洛也以帖木儿——一系列成吉思汗式“世界征服者”的最后一个——为主题。当驯化了的自然观在帝国盛行之后，柯勒律治所写的蒙古形象，已经是一座定居文明的、精致的城市宫殿：

“在上都，忽必烈汗曾下诏
建一座堂皇的官宇：
圣河阿尔弗从那里借道
流经一个个深不可测的山洞
注入不见阳光的海中。
于是方圆五英里的沃土上
便围造起一座座城堡和官墙：
更有小溪蜿蜒的明媚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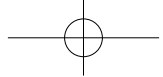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里面许多树，花儿盛开香味扑鼻
眼前的树林山一样悠远
环抱着洒满阳光的绿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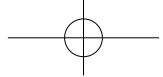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当忽必烈推崇并表彰宋室后裔赵孟頫作为国家艺术家，以显示自己对汉文化的爱护时，赵孟頫也把一种最主要的蒙古形象——马匹，作为自己的题材。不过，赵孟頫所画的马匹都置身于舒适的圈养环境中，圆肥、温驯而贵气，可以视为对蒙古人（作为执政者和城市化了的贵族）命运的一种讥讽，当然是孱弱的、太孱弱的讥讽。

处在锡林郭勒盟南部的太仆寺旗和正蓝旗，是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草原。人们似乎延续了两个都城的传统，在每年夏天，这条道路上主要来自北京的自驾旅行者络绎不绝。在上都的夜里，刚从锡林浩特和克什克腾旗返回北京的朋友建议我们放弃北上，在那里，游客已经人满为患，于是我们决定再调头入关，前往张亦霆的故乡山西大同。

张亦霆和我用煤矿、恒山和各种面食激起了老薛对山西的好奇，使他对蒙古草原的想象硬生生转移到春秋战国。由张家口再次入关后，古代烽火台的遗迹比比皆是，一系列地名和历史使老薛暂时告别了蒙元时代。张亦霆等待的大雨，终于在我们进入山西以后降临，雨刮器猛烈晃动，我们的车速一再放慢。穿过了一大片高压线塔，经过了枯水期的桑干河以后，开始烟囱林立，灰暗的烟雾在昏黄的雨云下显得怪异。这些烟囱一直跟随我们，仿佛是一种现代的烽火台，向前方目的地传递着消息。进入城市时，张亦霆为大同城市面貌的改观感到诧异，这使三年没回来的他有点找不到回家的路。直到我们穿过城市，越过矿山，



进入矿区，他的指路工作才自信了一些。雨停后，阳光没有很快照射下来，沿途是煤矿家属区旧日村庄的废墟，我们在有些迷路和堵车中，进入老张少年时的生活区，深槽路段积水的反光，照耀崎岖的大同。



● 站在煤矿工业的金属高架台上，越过铁路和烟囱，遥望北魏时代的大佛，是一种颇有概括性的大同体验。有时，我们对面会走过正在休息的矿工。在过去一些摄影师的照片中，云岗石窟的佛像一身黢黑的煤尘，仿佛它们也是从井下刚刚冒出来的矿工。（摄/陈桢）



向下的大同

悬空寺像几片暗淡的木块，镶嵌在一片水泥墙体般的灰色岩壁上，并不如通常传播的画面里那样奇崛恢宏，事实上更显眼的，是紧挨在它正下方的混凝土大坝。它所依附的山岩异常平整，仿佛被加固处理过。这使我想起在大同晋华宫煤矿井下看到的矿井墙面，仿佛人们用支护矿井的方法，支护着这座脆弱的古老建筑。

我的矿井知识普及课源于 2006 年在新疆的一次经历，当时，工作需要我与一位管理人员在矿井下步行十数公里。就像动手术一样，人们根据隧道各地段岩石的牢固程度，使用不同的支护方法。有的地段采取喷浆处理，这些浆状材料凝固后形成一层壳，相当坚硬，于是人们就像活动在一根吸管里。此刻，我眼前的悬空寺山壁就如同经过了一层喷浆处理。在那座矿井里，人们还将长度不一的铁钎打入岩石，把容易松动分裂的部分串起来达到加固。有时，则用厚达 25 公分的混凝土处理整个墙面以确保不渗水。更早



的以前，我的相关记忆来自南方偏僻地区的一些小型煤矿，同这些系统的支护手段相比，那些煤矿显得尤为脆弱。

到达悬空寺前，还在恒山上时，我与同伴、小说家张亦霆一直就大同聊天。在大同，煤矿社区与大同市区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张亦霆在矿区出生长大，熟悉这里的事物与生活。煤屑纷飞的城市如同一张底片，不断在他的记忆里冲洗。假如他能居住在一套有独立花园的日式老房子里，也许他会留在大同生活。但他像许多出身于灰暗的居民楼，怀有才华的70后生人一样，年轻时到了北京。这种日式房屋群落，如今还完好地保留在矿区里，成为一片世俗平和的怀旧社区。但离这里不远，是日据时代一处日军针对大同平民的坑杀地点，如今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伴中没人想去看这个地方。在这个以挖掘为主要命运的地区，土地既提供财富，也是一种凶器。车窗外，正经过搬迁后遗留的矿工家属生活区，房屋坍塌后，很快就在地面上降解了。有的房屋土坯依然固执地耸立着，很像我们在进入大同路上，不时看到的古代烽燧遗迹。

张亦霆作为向导，我们去看一处过去的废墟。张亦霆说，我们所在的山丘堪称是中空的，据说最近几年已经停止了这一带的煤矿采掘，但部分土地依然在沉陷。尽管城市建设在更新，土地却好像一直坚持着一种向下的运动。对于土地本身，人们不会有更多的支护方法。我想起多年前，在贵阳附近一处名叫“郭亮冲”的煤矿，我陪同一个当时还在攻读社会学学位的朋友去那里进行一项问卷调查。人们也掏空了那个地方，地面下陷，房屋的墙上拧开裂缝。有时，我们



踉跄着，躲闪时时轰鸣而过的车辆，感到崎岖的地面几乎无法步行。从山路上走下来的时候，有一会儿，我们甚至谈到了写诗：一种叙事诗，有点像《萨迦》，关于人在困难环境中的生存活动，随事件发生而发生，随事件停止即停止，一种懂得停止的语言，它不会无休无止。不过，在以后的时光中我没有去写这种东西。老薛问张亦霆，有没可能写一种关于大同的小说。张亦霆说，他不想仅仅通过“描写”这一切，来完成一个貌似必要的回应。

他说，对于“一个地方赋予我们一种独特性”这种意识，他感到怀疑。我同意他的看法。在北京时，我与他有过一次关于“独特性”的讨论。从来不是一个唯一的人在体验到什么，而我们喜欢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在体验，只有自己是这个体验着的唯一的人。也许一种平视独特性的方式，会使我们较有机会理解土地上工作生活的人们。在旧有的房屋很快降解、分崩离析的大地上，他们可能没有机会随着时代一起发展，停止在土地的一种向下的运动中，停止在时代的低处。

不过，大同附近高峻的山脉，仿佛是对向下运动的土地的平衡和补偿。这些山脉峥嵘汹涌，创造了恒山。这座枯干的大山，其历史被径直上溯到黄帝的征战活动，被战略家张仪称为“天下脊”——一个闻之令人振作的命名。

恒山的植被稀薄，但并不像以岩石取胜的华山那样，石头自身可以形成可观的格局。从各方面来看，它都缺乏作为一座正统名山的景观特殊性。分散各处的题字碑刻，赞美着一种肉眼在这里并看不到的壮丽



云冈石窟。



景色，仿佛那些文辞中的奇异景观，只是一个被语言虚构的奇迹，仿佛这是一座只存在于修辞中的山，一如古汉语用“三山五岳”、“72 洞天 36 福地”这些修辞性的概念，书写和归纳了这个国家的地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岳恒山，这座平淡无奇的耸拔大山，倒更是一座内在的中国山峰，虽然它的道观半新不旧，道士们见你不烧香不算命，便白你一眼后就没个好气。不过，道士的白眼倒是挺符合一种奇峭的道家气质，就像那些道观本身，总建设在险要奇峻之处，像是只关注天空、对凡尘世界的一个孤傲的白眼。相比起来，佛教建筑则选址中正，往往是山峦与大地平顺衔接的缓坡地带。在下山的索道上，一位来自河北的同行者，对我提到一路上的干旱。在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地带，刚刚发生过干旱的侵袭，庄稼成片枯萎。这时，我们头顶的悬崖上又时而闪现着“奇观”、“胜景”一类的题刻，这片干旱、中空、挖掘中的大地，仿佛在沉默地包容着词语的华而不实。

在晋华宫煤矿，我有点着迷于各种巨型挖掘机，它们像恢宏的兵器，被摆放在晋华宫煤矿公园里供人观赏。在这座整洁的公园对面，一河之隔，就是武周山下的云冈石窟。站在煤矿工业的金属高架台上，越过铁路和烟囱，遥望北魏时代的大佛，是一种颇有概括性的大同体验。有时，我们对面会走过正在休息的矿工。在过去一些摄影师的照片中，云冈石窟的佛像一身黢黑的煤尘，仿佛它们也是从井下刚刚冒出来的矿工。

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贵州少年时，一个朋友向我推荐在北京圆明园生活的艺术家张盛泉——人称“大同大张”——的诗作。恰好，张亦霆也对这位在



云冈石窟旁度过余生的怪杰略知一二。

在朋友的回忆中，这个身高逾一米九的男人，曾在中缅边境服役的军人，是一个从不坐下的怪人，吃饭、谈话全都站着，聚会中的朋友们抬起朦胧的醉眼仰望他表情冷峻的鞋拔子面孔。

在我的记忆中，张盛泉的诗作怪异而极端，但并未让我感到有何出色之处。可是，一种尖刻、绝对的东西，使我不能完全对那些生硬的诗行不以为然。20 世纪末最后几年中，想法越来越孤绝的张盛泉离开北京，返回大同尽孝。在母亲去世后，一直生活在大同的他以自缢结束了生命。如今，他的同时代人赞扬他是那个时代重要的行为艺术家。以后在北京，我看到朋友收藏的一本张盛泉的笔记本，其中满是各种手绘草图，大多数是有关装置与行为作品的构想，铁器、木制建筑、动物的身体、对云岗石窟佛像的临摹、以及人物的各种手势。

我喜爱看各种手绘草图，关于建筑物、工程和地貌，但我自己却一直缺乏这方面的才能。这使我曾经想在写作中寻求一种草图感，这种追求在我的写作中延续了一个时期。想法转变后，这种草图爱好留下来的不多影响之一，是对“非语言交流”的兴趣。我想起，曾经在张盛泉的笔记本中看到的各种人物手势，一部分是佛教手势的临摹。不会再有人知道这些绘图的意图，艺术家会使用它，完成什么样的计划。在朋友的记忆中，张盛泉说话时一双大手也会不停动作。手印语言，是佛像造像的一个重点，承载着经由了历史演变的符号意义。去年，我把“非语言交流”写进诗剧《罗曼·冯·恩琴》中，通过诗剧中的一位人物，



蒙古最后一位活佛博克多格根之口——

“早些年我在甘珠尔观想沙绘坛城
我经常都说不好话，对那些
用缩在袖口里的手指沟通的生意人。
于是我行缄默，指导严寒中口齿不清的人
以后，从莫斯科来的
木偶戏团教会我手语讲演。
我很认真，告诉他们
关于变故的知识，关于人在仓促中做决定的知识。
我的指法启蒙了一种呼麦伴唱的手影
甚至还发展出呼麦木偶，都是些人兽成圣的段子
草皮返青时红遍呼伦贝尔。
那些挑挑拣拣的批评家说，这是一种还很粗糙的
艺术形式
一如大多数人不得不沿袭着的过分简单的一切
我比较介意简单，但我不介意
人人会被分配到的一份拙劣。
你这种无限买办不就很能搞懂这种区别吗？
别只会说“拙劣是变化着的”。拙劣直接介入
并构成了变化本身。你了解我这种
民族教师，在拙劣中的一次次演变吗？
直到寻根人士又动情赏析
一幕幕仿佛有重点的浮光掠影，说他们看到了大地。
大地是善变的。
当我又回收，那在群众性拙劣中如鱼得水的非语言交流
我剪毛、重组，普及为民用套路手印
甚至成了你们的日常手形
你们的中指肖像，戳点语法，抱拳护体
所以我带来这枚铁木真戒指
作为一种再次回收。
这是一枚至尊指环。人们说
戴上它的人就能在远东草原上怎么怎么。



会怎么办呢？这粗糙的语言可以铐住转世的自由度吗？”

这位沉默的僧人出生在青海，以后在蒙古国去世。张盛泉后期的一项主要行为作品也在西藏完成，与佛教观念有关。在晋华宫煤矿公园的金属观景台上，面对铁路网和远处的佛像，这两位人物在我脑子里浮现并难以名状地相遇，仿佛他们正在用各自的手势，进行着无声的交谈，而我不知道其中的意义。他们已经像我面前的塑像一样，处在缓慢的风化中，但依然通过面孔与手势，保持着一些未被理解的信息。

我们参加到一组游客之中，在晋华宫煤矿的矿井里步行了两个小时，这段矿道因为被开发为旅游项目而得到精心建设，完好地保持了部分开采现场和地质结构的剖面。幽暗的照明中，这座已经博物馆化的矿道，还保存着毛泽东时代的标语。我想起，少年时有个朋友说，他想创作一种半雕塑性质的装置作品，在不同地区施工，做一种井状的纪念碑——这座建筑除了具有纪念碑的作用，还具有一种现实的民用功能，中空，向下，可以是一口井，也可以是通向地下维修工事的入口。多年过去，我与少年时代的故人早已分道扬镳、久绝音讯，惟愿他没有忘记那条向下的道路。



九嵕山及其他

在一片半圆形黄土丘陵中，九嵕山的三角形主峰突兀崛起，醒目而孤立，与其说是帝王陵墓，不如说更像个人色彩强烈的军事强人自画像。初唐时代君主以山为陵，李世民选择了它。建唐初期，崇尚简朴，李世民也有自律意识，虽有被盗掘的传说——五代时期的军阀温韬声称进入过昭陵内部，但他的描述像是对任何一个帝王陵墓地宫都通用的那种描述——昭陵应该并不像秦始皇陵那样劳师动众，在我的想象中，我愿意相信它一直是简朴的，并非对帝王功德，而是对一代人的才能和生命力的纪念。

昭陵格外荒凉，来之前，我们以为它是一个像乾陵那样古今混杂、隆重建设的区域，毕竟它是李世民的陵寝。阎立本兄弟建设了这座陵园，但所有的地表建筑和雕塑已在历史中消失于战乱和盗取。如今，简陋粗劣的景区建筑物和稀薄的历史介绍，使九嵕山在这个寒冬里更显萧条。

也许由于玄武门的阴影，李世民急于向世人证明



他的能力，初唐的言论开放环境和个人才能施展即使有军阀时代的家臣色彩，也有鲜明的性格棱角、务实的建设性和君子风度。但分裂之家的阴影一直跟随李世民，在他的晚年，阴影通过第二代人反扑，以后时隐时现，把国家置于藩政割据的乱局，直到毁灭唐朝政权。“贞观之治”成为中国人的理想政治的主要符号，有时是一个虚假希望。但在各个时期，并不是所有的政权都需要这一符号所代表的正面意义，它还会被反对者用来批评现有政权的局限。相比贞观时代，富丽堂皇的开元盛世，更被每个笼统怀念的中国人念念不忘，即使这繁荣盛世很快毁于安史之乱，相比它，也许父辈时代的“贞观之治”更真实代表了唐朝的可能性和唐朝的悲剧。

离九嶷山1小时车程外的乾陵（武则天和李治的合葬处）平稳庄重，更符合人们对规模宏伟的国家陵园的想象。而荒凉兀立的九嶷山仿佛意味着，一个崛起时刻会被后续的制度化所平衡埋没，峻拔的开端隐没消解在它对后来时代的影响中。

我们在寒冷的早晨空气中走到九嶷山的半山腰处，地面的残雪还未化尽，祭台的鹅卵石显示出是新近铺就。“昭陵六骏”的仿制品也显然是近期才安放在这里。在空阔的天地中，这里的一切显得名实不符，更准确地说，这里异常地显得没有历史。没有任何古迹碎片提示人们这里历史久远，只有这座冬天里失去了植被颜色的桀骜的九嶷山。没有任何华美的事物提示人们这里的重要性，好像它是一个普普通通、被遗忘的工矿山地的入口。为游客服务的设施也简陋乏善，不像乾陵那样，后者的山道上布满热切兜售旅游纪念品的摊贩。在网络上的西安旅游介绍里，有的



线路介绍都不推荐昭陵，因为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昭陵确实无甚可看，只有一座锐角清晰的山峰。这种绝对的空寂，使我想起去年的元上都遗址之行，那里同样荒芜，但毕竟残存了短墙和碑石。九嵕山的空寂异常的非历史，像任何一处乡镇外围的大山和小卖部据点。没有沧桑，没有视觉提示，只有当代农村山地的艰辛维持感。这里曾经是谢阁兰西安考古生涯中目睹的大地，曾经坐落着巨型的走兽雕塑，飞马和石碑界定着大地的方位和空间的功能。如今，这些雕塑和石碑集中摆放在博物馆里，失去了原有的生动性，那种只有在本来的户外空间中才会具有的生动性。这些无处安放的艺术品在它们原有的位置不能安全存留，经历变乱不断的岁月后，博物馆成为尴尬的归宿。

由于时间原因，我们没有攀登到九嵕山顶部。在山下，那些著名的名字，魏征、李靖、上官无忌……在一块块单薄的石碑上一一排列，文臣武将，形影残余，精明剧烈的政治戏剧和人在变故中的才能，在太阳光照射下稀薄而微弱，一再强化了九嵕山的空虚感。对于一代代平民，李世民的凌烟阁理想不如那一对门神——秦琼和尉迟敬德——影响深远。对于喜欢探奇怀古的人们，九嵕山也远不如乾陵和秦始皇陵有效，后者遗存的人工造物使人们有迹可循。在九嵕山，对历史景观的想象会落空，面对空虚的空间，而这苍茫的空间正在被雾霾占据。

同伴们在九嵕山上也有些无所适从，大老远来，只是在山上经受寒风，连一个像样的断碑也没看到。一路上，我对大家鼓吹这里，到了实地，朋友们像上了一当，对遥远的贞观时代的想象并不能使他们心安理得接受在早晨冷空气中频繁跑厕所的命运。只有到



了乾陵，走上宏伟的神道，面对表情雷同的翁仲、无头石马和著名的无字碑，正常的参观古迹的游客感受才得以恢复。九嶷山像一个反常的时刻，名义上重要，但又没有任何有形的古迹实物提供给感官，那无形的部分——那历史的幽灵——并不如山下一座令人畏惧的简陋公厕真实，虽然在脑补中，人们也想象在这座平平无奇的峻拔山峰内部或许还存放着《兰亭集序》的原本。这农村化的、废旧工矿般的大山内部有一页薄薄的、古老的优雅字迹，这种反差感也许可以提醒我们历史事物在这座历尽劳动改造和分裂变乱的大地上的真实境遇，它们并不美丽，比我们想象的更生硬和苍白。

一个朋友在初见碑林时感叹，当他真实目睹过去只是在字贴上看过的碑文原件时，产生了强烈的失望感。那些在字贴和复制品上的美丽，并没有在实存的碑石上被他感受到。那些黯淡的、脱离了在天地之间原有位置和功能的石碑，孱弱而平淡，使人几乎不能抱以耐心和产生面对重要文物的尊重感。另一方面，这些古迹和艺术品的美丽，也许从来只是存留在文辞中。这些文辞中的山地，文辞中的遗迹，在现实中只是微弱、冰冷、退化着的暗影。

关于五代时期盗墓狂温韬盗掘昭陵地宫的记述——“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新五代史·温韬传》）——的可疑在于，它很像一种民间对帝王陵墓的笼统想象，这种想象在今天也随处可见。在关中平原这座大墓地里，人们根据这种想象建造了各种仿古景点，其中较典型的是对乾陵地宫的仿造，进入它，民间戏台风格的宫室布景和造型失控的蜡像给人带来不忍直视、又不得不面对的视觉震惊。我们是处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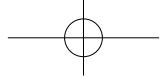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辞带来的想象和民间塑造的别扭强烈性之间的人，两者之间，只有一座平淡的大墓地，除了对于考古学的意义，在大多数过客的眼中只是一个昏暗的盲点。

在西安市区，我们的临时工作地点——西安美术馆——门前就是李世民的雕像，背对大雁塔，面对终南山。雕塑所在的仿古大道林立着各种近期修建的历史人物雕塑，被命名为“贞观之治”。在雾霾笼罩和夜灯照射中，策马的李世民像是在远去，进入一个虚无空间。

每天，我们结束工作后，都要途径大雁塔步行回住处。游客络绎不绝，在玄奘的雕像前留影。有时，大雁塔在雾霾中即使近距离，也消褪成为一个虚弱的灰影，仿佛在呼应九嵎山那种给人什么也不是的印象的处境。事实上同伴中已经有人开始引用 1980 年代诗人的诗句：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我们没有去登大雁塔，把诗中的大雁塔换成九嵎山也无不可。我想起在寒风中面对关中大地冷得流鼻涕、纷纷跑厕所的朋友们，他们中有的说，看完了被景区产业占领的乾陵之后，还是觉得九嵎山更酷啊……



● “有关大雁塔/我们又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摄/肖诗白）



朋友们的东北

我在不同体裁中或散漫、或勉力地写过几次东北，但都不足以让我感到释放了它对我的吸引——准确而言，是东北空间在我对当代事物的认识中所给予的干预。我愿意继续接受这种干预。

在我多有拘限的地理认识习惯中，东北对称于疆、藏，具有同样的有待被再理解的历史和地缘内涵，同样漫长的陆疆分界线。我这种未经分析的类比印象，可能会受到在东北出生的朋友们的批评。他们希望致力于重述东北的工作，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我认为也值得更多的同时代人关注。

前人冯至的长诗《北游》，也许可以视为现代汉语诗中对东北空间的早期关注。最初读到之前，我想象诗中会展露一个磁力峥嵘的哈尔滨或者东北亚。但我的期待一次次被长诗每个章节末尾形式化重复的，肤泛的情绪化套语“××××只是阴沉，阴沉”破坏了。



近年我的朋友们纷纷去往东北。前年，作家张亦霆宣布告别北京生活，去延吉居住，为了写一种关于东北边境城市的小说。动身前，他以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风度，邀朋友们酒聚，并分发他不多的财产：主要是书籍。我不客气地掳掠了一套《汉书》和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他虽心痛，但表示人生豪迈。2012年，我曾与他沿东北边境城市旅行，但他在牡丹江休整时离队，表示要去长春见一个念念相忆的故人，而牡丹江是旅程中最后一个挨近长春的城市。

苏珊·桑塔格在她的《中国旅行计划》中写道：“皮影戏。亚洲风云。”她的父母在长春孕育她。张亦霆也喜爱长春——这是我听到过他唯一赞许过的中国城市，在与他共行的东北旅途中，当若干确实乏善可陈的城镇被他敏感的批判抛入黑暗之后——我便叫他长春真人。在2012年的那次旅行中，我们辞别张老师，离开牡丹江前往绥芬河，然后沿黑龙江水，经由黑河、漠河，再翻越大兴安岭折往满洲里。过程中，张老师在长春发来信息说，也许他会在长春生活。

之后的这次延吉之行前，在北京，一番长亭外古道边的情谊之后，张老师将剩余的粮草辘重——仍然主要是书籍——先行快递往延吉，自己则乘坐火车一路长天风尘，前往新生活，并与我约好延吉的相聚。我对那个城市一无所知，只知道它是一个悲剧性的女性，婉容的人生终点。

张老师到达延吉，投身于中韩边境城市的众生图卷和本地酒食之中，时时用手机发给我延吉的风貌照片。我也希望那个迥异于北京氛围的城市，能够帮助朋友写出新异的故事，并且以为再见面至少会是一年



后的事了。不过，延吉的陌生感迅速被庸常和孤独的生活消解了。像我所有的诅咒北京而又一次次返回的朋友一样，大概三个月后，张老师又在北京他新租住的家中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餐。但我相信东北的旅行与客居在他的经验中仍然延续着一种内在的影响，一种东北空间和这个骄傲又仓促的人的隐秘对话，那些不同于华北都市平原的天光、原野、河流、方言与人工建设，带着中东铁路历史风云的晦暗残影，想必已经铭刻在他的记忆和语言中。事实上，延吉之后，长春真人又经历了短暂的长春生活。

不久前，一个广州朋友、出版和策展人冯俊华刚刚结束在东北的旅行，这也是他初次去东北，由于身负一桩当代艺术合作项目的任务，朋友此行颇有观察员和使者意味，希望聆听本土创作者对“东北亚”的理解并联结众能。他的第一站是哈尔滨，“冰城”的一个青年艺术家小组接待了他。他在到达当晚发给我圣索菲亚教堂的照片，第二天，又发来他步行走过松花江冰面的照片。

我想起自己第一次路过圣索菲亚教堂，是在5年前。原先，圣索菲亚教堂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的军队教堂。1910年，列夫·托尔斯泰去世时，俄殖民者在哈尔滨举行纪念大会，倡议全体三教九流老老少少市民悼念，表示“对文豪之名永志不忘”。在第二年，又要求并组织哈尔滨所有的学校进行纪念列夫·托尔斯泰的活动。是否，当时教堂的钟声响彻松花江呢？仿佛出没于白山黑水的“胡子”留着一部列夫·托尔斯泰式的大胡子。不过，之所以提到哈尔滨，是因为它还是我的另一个朋友的故乡，如今她在香港地区生活。多年来她对我锋芒咄咄的批评使我惭



愧，使我认为一百个日珥似的聪明仙女就在这锋芒之针尖上舞蹈。有一次，我恶作剧地建议她把封冻时期的松花江那一江纵横交错的冰裂痕拍摄下来，制成一条一百米——因为她自称的优于我和其他人的“一百倍的想象力”——的长卷，命名为“奈何桥”。我接着胡扯，“奈何桥”可以同徐冰《鬼打墙》形成对偶。我继续对她说，这些熠熠生辉的冰裂缝是一种指引——仙女的指引。我之报复性的昏招儿自然招致了仙女的白眼。

不过，我很感兴趣于东北的仙女文化，以及更幽邃的萨满。人们向老态龙钟或形象平凡的村中或市井“仙女”询问自己的命运，有时，从她们的喉咙聆听已故的家人的声音。东北神话意识对当代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仍然是未被充分思考并值得继续关注的课题，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希望接触那里民间信念的种种形式，诸如萨满、仙女、山神和鬼魂，理解它对情绪和大脑的影响，对兴奋点和生活逻辑的影响，通过这些经常是粗糙和难以定论的语言形式，学习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的那种对话工作。

一个出生在东北、生活在广州的作家朋友金特在小说《冷水坑》中使用了这种民间信念。小说关于矿工之子段铁马为了讨问公正的从乡村去城市的一次夜间骑行，小说中一段生动的文字值得在此引述——我很希望它被更多人读到：

“‘你们挖了一辈子煤，就想想煤吧，原本是植物，沉积了亿万年变成了煤，然后被挖出来，烧个精光。你们生前聚精会神，现在也要专注想一想，这煤啊，就是你们的心。被轴承钻碎，被烧掉，煤抱怨过吗？老沈叔，你觉得自己不该暴死，可你的命数却是如此



呀，假如能认清这一点，有啥怨气咽不下的？连一口气都咽不下，谈何解脱？有成有败，有生有灭，心安处就在这里，能接受自己的命，就是大慈悲心啦。我是肉体凡胎，站坟头上心里不得劲，因为我把话说到头了，对活人来说这不是好事儿，因为说过之后，心里空的慌。放过自己吧，我们都一样。’段铁马下了坟川，一路奔出黑松林。就在林子边，能看见结冰的闪电河了。突然蹿出个黑影，不是鬼，是人。这人一边往冰上蹿，一边脱衣服，往树枝子上甩，呜呀呜呀地叫唤。段铁马悄鸟跟到冰面上，白刺连的有几公里长，那小子蹿到几十米开外了。段铁马刚想过对面，听见那小子哭着喊：“没—问—题，今—夜—没—问—题！”连续喊了六次，然后开始嚎：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段铁马听入了迷，他喜欢这首诗。那人边颂诗边打醋溜，勾着段铁马跟出十几米远。那人撕心裂肺地朝星星吼，胸腔供起老高。气一收，唰地没动静了。段铁马还纳闷呢，这人有病吧。刚想到这，就听见脚底下嘎巴一声，他瞅了一眼启明星，告诉自己：‘完蛋操了。’又嘎巴一声，辽河水就灌进肺子里，把段铁马薅进了冰窟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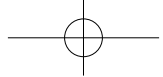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由于时代中各种现实因素的剧烈影响，东北大地被认为在发生新的变化，人群的行为与活动形式，正在塑造新的社会地形。在写作计划中，金特希望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具体定义“东北亚”这块地缘，以承载他在文学上力图实现的生活世界。东北亚在他眼中是家乡的根据，文学的根据，观念的根据，更是语言的根据。他希望探讨在东北亚地缘中，人与家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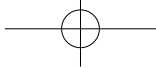
共同良性变化如何实现。预定在 2016 年 5 月，我将参与由冯俊华等人发起、金特在内的一个艺术家和写作者的合作实践项目“东北亚”。我们计划在东北进行一系列的在地创作实践，同时，也是一次旅行。在这个过程中，我将与合作者采集人们的语音、海岸、劳作的影音素材，用以制作一部名叫《航船》的戏剧。一些留守在东北生活，以及离开东北又希望重返的当代青年艺术家和写作者们，将共同完成这次工作和旅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意味着理解他人——包括朋友和敌人——对世界的认识，以及理解朋友和敌人在世界上的路途。面向东北空间，我们的路程才刚刚开始。



● 图为王伟制作的戏剧《航船》在大连上演的剧照。



● 在中国美术学院的一处走廊上表演的
萨缪尔·贝克特晚期剧作《摇摇椅》。



运动的终点



Chapter 4



/202

西安的幽灵

大地报告——另一种中国行纪

由于在西安美术馆的工作,我和同伴们每天在“大唐不夜城”出没。作为重点建设的旅游景区,这里通宵华灯如昼,过去,一位艺术家曾戏称这里为“大唐灯具城”。

我的同伴们是来自广州、重庆和上海的年轻艺术家,聚集到西安进行一项名叫“副馆长计划”的集体实践创作行动,在西安美术馆的驻留时期以内,他们获得临时的副馆长级别的项目决策与执行权,这是一次美术馆体制的开放行为,也是艺术家当代实践方式的一个样本。我作为项目的客人,受邀来此参与关于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诗剧《先人祭》的朗读活动,并以一个当代中文诗人的身份,发表一次关于该文本与当代问题的内在联系的发言。

有必要在此介绍《先人祭》,它是亚当·密茨凯维奇——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了他,然后,又在以后长时间中被遗忘——最重要的诗体作品。诗剧关于一次失败的青年运动,以及曾经在一个时期内



丧失了主权的波兰历史。这部诗剧会由波兰剧团在北京演出一个四小时的版本。亚当·密茨凯维奇在诗剧的开端援引《哈姆雷特》的诗句：“霍拉旭，天地间有许多事，是你们的哲学未曾梦见的。”这意味着，这部诗剧也关于作为继承者的青年人在一个历史时刻的精神状态、行为与决断。

《先人祭》出现在西安具有某种奇特的契合性，朗读活动的发起人冯俊华（他也是即将出版的四卷中译本《亚当·密茨凯维奇文集》的策划人）和参与朗读的艺术家们都不同程度意识到了这一点。亚当·密茨凯维奇不是唯一出现在西安的西方诗人，还可以提到曾在此进行考古活动的谢阁兰，后者拍摄了数量众多的西安照片，这些外来诗人事实上参与构建了现代中文诗的传统。

历史往往以令人意外而又意味深长的方式交叉，1938年4月5日，W·H·奥登与衣修伍德到达西安，想在这里继续进行关于抗战的采访工作。之前，他们自汉口出发后一路颠沛，把沿途地点都命名为《荒凉山庄》中的地名。到达西安后，衣修伍德在日记中写到：“西安的招待所是世界上最为奇怪的宾馆之一。张学良异想天开地建成了它。”在这次旅行中，战争使达官贵人纷纷撤离，于是，一路上奥登一行的停靠点都是英国传教士的乡村教堂。其中一位传教士罗素，“对土匪的战术、原则和独特之处了如指掌。有一次土匪袭击延安，经由罗素先生调停，说动他们撤退，条件是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步枪和城里民团的弹药。民团被说服了，少数人投票反对，大叫着说：‘与其交出我们的武器，不如我们自己也做土匪！’然后马上就逃进了深山老林。”这些传教士在非常时期，



成为几方力量都能接受的奇特斡旋人。在这本旅行日记中，衣修伍德敏感地捕捉到了“西安事变”以后，局势造就的西安生活气氛，使我们在今天从另一个层面，得到另一种理解历史的入口。

张学良，这个谜一般的人，其生平是一个典型的反哈姆雷特故事。不过，毕竟不适合在本文进行一番历史人物的重新评述，尽管这种再描述与我们怎样重新理解现代史有关。我仍然想继续介绍这次西安之行中，同伴们——也即参与“副馆长计划”的青年艺术家们——的工作。

参与者之一，广州的写作者黄丹怡对我说，她感到西安是个“隐藏着一种危险感的城市”，“城市外布满敌意的废墟”。这一描述使我想起衣修伍德写在旅行日记中的感受——“若郑州意味着种种疾病，西安则意味着谋杀”。黄丹怡是“副馆长计划”邀请的唯一一个驻留写作者，被“副馆长计划”置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而这个城市积累着沉重如那些巨大皇陵的历史的幽灵，这一切使她几近失语。一天，她在西安的街道上录下了一个摆地摊卖铅笔的年轻人懒洋洋的吆喝，年轻人称，他的铅笔是一支从爷爷传到他也没有写完的铅笔。这支阴郁、老迈而仿佛无休无止的铅笔，仿佛是写作的一种象征。不过，黄丹怡放弃了这个素材。她在另一个艺术家黄泓浩的项目《朱小福》中找到了写作契机，这也是一个与皇帝有关的故事。

《朱小福》项目的主角朱小福，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那年淮海战役结束，他的父亲作为“黄维兵团”的将领，在黄维被俘后临时接任前线指挥工作。还未到朱小福记事的年龄，父母便阵亡了。之后他被



常香玉收养，因为逆反调皮，20岁前又换过15个家庭，其中包括7家回民，8家汉民，也跟着戏团生活过。不知从什么时候，他开始自称是朱元璋后人。他身穿戏台上的龙袍，手持一柄象征皇权的权杖，开始他的全国旅行，他称之为“巡视”，迄今已周游了全国六次，这恰好也是秦始皇和乾隆出巡的次数。黄淞浩希望，他对朱小福的口述史拍摄“不构成消费与猎奇”。朱小福的自我认知复杂并异于常人，他是个孤儿，因此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身份确认，他的自我认知形成于他人的观看。

目前，这位“陛下”流落在西安。当我们在剧场排练《先人祭》时，陛下会正襟危坐，在观众席中观看。我注意到他的表情严肃而坦然。他一直保持着严肃的坐姿，这使他的冕冠前后的珠串很少摇动。不过，我们精心准备的朗读表演并没有多少观众，这倒也符合这部仪式剧的精神：我们仿佛是在为鬼魂表演。

在朗读活动结束后的一个夜里，黄丹怡做了一个梦。第二天她告诉我她的梦境：朱小福来到美术馆寻找黄淞浩，但是被保安拦住，不允许他进入，于是朱小福在美术馆旁的一个角落里等待黄淞浩时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母，醒来后想起他曾经来过西安，但是他忘了。

在诗剧的第三部第五场，密茨凯维奇提到未来力量将由此实现的“三个首都”。这是一段神秘的预言性的诗句，具有开放性而又令人费解。我想起我生活和因工作原因经过的三个城市，北京、南京和西安。有的我生活过20年，有的是数次短暂逗留。在南京的一个夜晚，我跟随一位朋友登上山岭，进入一座方



塔，由于一路聊天，我没有注意进入的方塔的名字。我把手随意倚靠在石碑上，和朋友继续说话。朋友提醒我，我懒洋洋靠着的这座石碑里保存着玄奘的头骨。

我像触电般离开这座石碑，心里感到愧责。我非常尊敬这位伟大的旅行家和学者，一个坚毅无畏的前人。我相信，他并不是《西游记》里那个懦弱昏聩并有时虚伪的人。在西安，从我们每天工作的西安美术馆天台上，可以望见大雁塔，也可以望见终南山。大雁塔是玄奘的象征，也是一次艰辛、漫长而伟大的旅途的象征，而终南山意味着一条古老的社会捷径。在缓慢长途与捷径之间，是这座历史力量来来往往的城市。黄泓浩离开西安的前一天，我见到背着摄影器材包的他，与身着黄袍的朱小福在美术馆门口道别，这番情形奇怪地使我想起年轻的玄奘辞别李世民。而美术馆门前，正是巍峨的李世民塑像，背对着大雁塔，面对终南山的方向，因为他是帝王，所以方位上需要面南背北。我们每天看着这座雕像和它背后的天空，以致冯俊华套用普希金在《青铜骑士》里的诗句戏言：“我爱你，李世民的大城”。

2016年12月，我和同伴们还会聚集在西安，进行一系列的展览和戏剧工作，我与冯俊华、黄丹怡约好，到时一起去看黄丹怡所说的那些城市外的“敌意的废墟”，那些金字塔般的巨大陵墓和阿房宫的古老地基，那已经不是谢阁兰曾经看到过的大地。

回到W·H·奥登。在这次中国内陆的旅行之后，他在长诗《诗解释》中写到：

“夜幕降临在中国；巨大的弓形的阴影



移过了陆地和海洋，改变着生活，
西藏已经沉寂，拥挤的印度冷静下来了”

这首长诗经由查良铮的翻译，已经成为现代汉语写作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奥登对中国的人道主义看法，同他对西班牙的人道主义看法可以互换（这一作风曾引起奥威尔不满），意味着一种他本人或许并不屑于改善的距离。但是，大摇大摆的英伦人精，依然是关于中国抗战最出色的诗体概括者。在从香港开始，登陆内地时，衣修伍德与奥登不断面对中国人对于抗战的一种普遍心态：等待，等待战争停止。而且等待者们认为，中国人民可以忍受更多的消耗，忍受到战争停止，以后一切回归原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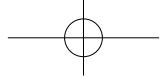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批评家汉弗瑞·卡彭特在评述奥登与衣修伍德的中国之旅时说：“在奥登的诗中，历史被看作到达‘好地方’的一种失败。组诗的第二部分涉及的中国战争，被指出是人类的这种普遍性失败的结果；就像奥登在该组诗所附的‘代替注释的长诗’（Commentary，即《诗解释》）中所言明的那样，它不过是‘一场所有的……都深深蕴含其中的斗争的地方性变种’。”

奥登说，“也许他们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的意义”。抗战的结束，意味着中国人将继续回到一种停止状态，而抗战本来是一次产生新事物的机会。在长诗《诗解释》中，奥登试图询问：什么是抗战以后的中国人的可能性，什么是他们的明天。尽管他已经非常礼貌地用一种近似通用的人道主义修辞作为掩饰，委婉地提出了这一尖刻的问题。“你们经历了如此重要的事件，为什么没有你们的诗人把它写成诗？”回到汉口后的一次宴会上，他这样询问中国文人们。提问引起现场的尴尬和沉默。他保持着礼貌，没有进一步去问：



“何为中国人”。

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将不是对短期事件的猜测可以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精神事件会到来。一些传统问题会再次带着新的历史力量，带着前夜的不安，回到我们面前，在没有认出它之前，它表现为一张张我们身边同时代人的面孔，直到这个愈益增强的现场的张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叫出它的名字。而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人所认同的价值往往并不与他同在，因为人不论在意愿还是现实中始终是孤独的，接受这一现实，也许会帮助我们更坚强地面对这个时代。



● 图为《美好的一天》舞台布景。



运动的终点

首先，我想提起几个轿子上的人。

有的作家会在晚年逆反自己的过去，仿佛要找到一种具有自我拯救性质的平衡，尽管作者的形象已经定格于过去的营造。这种反转现象，或因为愧疚，或因为“谎言”（用奥·帕斯的定义，“诗人的必要的谎言”）还需要通过必要的真实性来实现进一步的深化，或者两者皆有。游记《出征》是谢阁兰晚年所写的一本反谢阁兰的书，也是理解这位几乎毕生从事“异国情调”的诗化作家最必要的一本书，在其全部作品中显得尤为独特。谢阁兰在这本书中流露出直接而明确的立场倾向，甚至返回到早期在他的国家产生了影响的左拉式自然主义风格，书的开篇即写道：“我总觉得这一类文章可疑而又虚妄：历险纪、路条和漫录夜谈”——与后人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的著名开头“我厌倦旅行，厌倦旅行家”异曲同工。

1914年，谢阁兰辗转于四川、陕西等地。他把这次旅行写进了《出征》，其中两个细节令人印象深



刻。

“进入内亚”曾是现代文学的主题之一，在《出征》中，谢阁兰记述了初次取道西藏进入内陆亚洲时，发生的一桩随团传教士遇袭身亡的事件，他详细记录了葬礼的过程，从中传达出他对前方那个未知东方国度的内心恐惧。另一个细节：沿横断山脉而下时，谢阁兰对他乘坐的中国轿子感到不适，对建立在轿夫半赤裸身体苦役之上的舒适的东方摇动，感到深深不适。他毕竟是一个来自左拉时代的人，左拉式的道德感在身体里汹涌，与他的舒适处境格格不入。在这些时刻，我们看不到那个《碑》和《勒内·莱斯》的作者，当代中国读者一般认为这两篇作品对中国意象做了最为诗意的再描述。

让我们暂别谢阁兰，继续关于轿子的变形记。宋代，这个“中国转向内在”的时代，也是产生轿子的时代。在西湖边，诗人林升在晚春的暖意中，写下他对偏安群体生活状态的批评，那些在轿子舒适的颠簸摇晃中——林升的诗行微妙地传达了一种电影镜头般的运动感——经历仿佛无休无止的山外青山楼外楼的赶场混局的微醺的大人们，在同样仿佛永不终止的歌舞运动中，他们的生命好像不会终止或被打断。

在西湖边，我想起这两个与轿子有关的人，两个处在帝国弥留之际的诗人，一个是外来旅行者，一个是含蓄的讽刺家。那种舒适的东方摇晃，通过一种无奈的、悲哀的运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种被历史中无数人所沉浸的运动方式，也许是一条理解杭州，也理解中国空间的线索。

这是我近几年中第四次来杭州。第一次来时，在



西湖边，我看到一艘华丽的游船挤满了身着绛红色长袍的西藏僧人，像一个幻象，在我眼前掠过西湖的水面。如果是谢阁兰目睹，我想这也许是一个他不会放弃写入诗文的画面。

提到杭州，我的第一反应都会想起涌金门的张顺塑像，这位草根水神在那里保持着同时作为渔民和战士的形象。少年时代，阅读《水浒》的后半部分，张顺之死是我最感到可怕和绝望的死亡。在西湖，这座古典的人工湖沿岸，还分布着张顺的两位僧人战友——鲁智深与武松的坟墓，离他们不远，则是半神般的悲剧英雄岳飞，这位国家军人的另一面恰好是地方民间武装的镇压者。这些矛盾的古代军人，和西湖边许多文物化了的坟墓的主人一样，是人们在令人缱绻迷醉的西湖之美中容易忽略的部分，因为西湖一直与中国人的幸福理想有关，这是它的主要传统，它是一个乌托邦，也是欲望的符号，浮现在整个内陆亚洲——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来者——的心灵里。

生活在杭州的诗人朋友陈律称，岳飞“是杭州的阳气”，这当然是个较为浪漫的看法。今天，人们容易写关于林和靖或苏小小的诗，但可能很难再写一种关于岳飞的诗。也许可以在现代中文里重写一种关于岳飞的作品，诗或者戏剧，它所需要的语言力量，将是莎士比亚在《科利奥兰纳斯》和《麦克白》，席勒在《华伦斯坦》中表现出的那种语言力量（岳飞也在诸多方面近似华伦斯坦），它需要不同于过去时代中因袭的、儒生式国家意识形态，具有新的政治哲学内涵。

晚春的杭州活动不断，聚集亚洲各国思想者的学



术会议“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正在这里举行。与此同时，一位朋友，诗人和戏剧导演石可主持的“贝克特晚期剧作展”也在西湖边开幕。在这个林升式的晚春，我来杭州，为我将要在这里演出的诗剧了解场地。之前，我所写的两部诗剧《韩非与李斯》和《罗曼·冯·恩琴》在广州已经做完第一次表演，接下来的城市将依次是杭州、上海、西安和北京。不同城市的合作同伴们希望，这些诗剧表演，每次应当找到与它所前往的城市相呼应的形态，而非在不同城市重复同样的模式。因此，我一直在寻找，两篇诗剧与杭州的关系为何。也许，可以把广州、上海以及我诗剧中的东北关外港口城市理解为曾经的飞地。一位杭州朋友认为，因为所积累的复杂生活和历史幽灵，这是一些“极难书写”的城市。“话又说回来，中国哪个城市不是极难书写的呢？”朋友无奈地说。而我怎样理解杭州，这个已经被书写过无数次的城市？

如前所述，西湖边，石可主持的“贝克特晚期剧作展”以短剧《摇摇椅》为开篇，表演地点设置在中国美术学院的一条走廊里。《摇摇椅》是一个苍凉的短剧，衰老的独白之声伴随着摇椅舒适摇动的节奏，在贝克特精确的时间和节奏控制中，成为一种行动诗歌。在暖风袭人的走廊中，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丝丝入扣地完成了贝克特的极简艺术。中国年轻人的青春状态与贝克特的苍老的运动沉思之间，构成了一种对比性的张力。孤寂的念白在摇椅上起伏不断，促使我想起那两位与轿子有关的诗人。这是一个有趣的启发，得益于石可的戏剧实践。我觉得我得到了一种关于杭州的理解，三种摇动——谢阁兰、林升和《摇摇椅》——在西湖边构成了一种奇怪的联系。《摇摇椅》结束的一小时后，是石可所导演的另一部贝克特戏剧《美好



的一天》的彩排。这部剧作更著名一些，关于一对定居在垃圾桶里的夫妇，身体运动被废除，只留下语言的绝境。在剧中，有一段女主角与旅行者的对话。旅行者像一切不礼貌的闯入者那样打量并评论着一对奇观般的定居者，也构成女主角回忆外部社会的最后线索。

朋友中也有一些不愿旅行的定居者们，他们对旅行疑虑重重，或者嗤之以鼻。不过，当我说我的目的地是杭州时，他们会流露出“噢，是个好地方”的表情，比我的目的地是巴黎或冰岛更能得到他们的认可。是的，杭州是中国人的一种理想传统。在晚春，这暖风熏人的美好的一天，我在想，《美好的一天》如果在西湖边的两个垃圾桶里表演会发生什么？西湖游人如织，我的杭州朋友们有时也表现出对西湖边人山人海游客的反感。一位定居杭州的朋友，与当代许多中年文化人一样，是一个逐渐想成为古人的人，对茶道和股市的兴趣远大于对贝克特的兴趣。哪里也不想去了的人，也是一种轿子上的人。古典学者伯纳德特在评述一位学者同行时说：“古人不是世界主义者，这很有意思。他们认为自己是完全自足的，不需要‘异邦智慧’。所以他们不学习其他语言。这种看法导致他不能理解哲学具有决定意义上的重要性。一旦做出那样的区分，你就用不着旅行了。”

西湖，这幽灵环绕的人工湖，也是马可·波罗、历代侵略者的目的地。这帝国的内心，一个天国的人间模型，也是征服者在帝国实现其欲望的象征。请原谅这篇不像游记的文字，但它也源于旅行者。也许“运动的终点”是一个有待廓清的命题，也是严寒的诗剧与暖风熏人的杭州空间可以相遇之处。



大雪中的孳生遗迹

我不是遗址迷，但人工建设的遗迹经常比一处自然风景吸引我。大概因为以土木建筑为主，再加上这个民族几乎固执的自毁冲动，中国内陆可以看到的遗迹并不多。在中条山下，尧舜建都之地的盐湖围城在消失。黄河边，长城的遗存部分比我第一次看到时更完全地融合进沙土。许多城寨、工事、庙宇、城垣和废墟迅疾地逝去，留下崭新又荒芜的工地。但另一种遗存，并不那么古老的建设遗迹，产生自近代和历史并不悠久的旧工业时期，废弃的居民区、工厂和其他公共建筑，虽因石材和金属结构从而勉强维持着一定程度的坚固，但也并不比那些年代久远、弱墙残瓦的庙宇和村舍坚持更久，相反，有时看上去更脆弱。

东北是第二种遗迹的大墓场，过去，我写过它的铁路、军事堡垒和日俄战争时代主人不明的宫殿别墅。除此之外，东北还意味着一些消失已久的国家，譬如被契丹灭亡的渤海国。

2010年冬天在牡丹江，刚下过大雪，我们打算



在去镜泊湖的过程中，绕道去看看渤海国上京遗址。一路风雪茫茫，看不见指示牌时，我们就在岔路口停车向人打听去遗址的路，好像在打听某个人家。大雪中，那些匆匆向火车站赶路的人，驾驶农用车的人，小卖部或汽配站的小老板，抬手向远处一指，而平平无奇的乡镇结合部的公路尽头，无论如何不像会出现一处古国遗址的样子。起初，我以为至少会面对一些断墙和地基——至少像在临汾、或者贵州的土司城堡那样，仍然保存着城墙或要塞——但到达目的地后，只有一座空寂、新建的庙宇型建筑，狭小的室内陈列着一些简单且陈言腐文的历史说明。失望使我们早早离开，前往镜泊湖。在东北强烈的冬天阳光下异常洁净和反光的镜泊湖，消解了那座可以被称为赝品建筑的房屋带来的不快。我转念一想，又接受了这一切。十年前，在雅鲁藏布峡谷的一处人家阴暗的杂物间里，人们指点给我看一座粗糙风化的石像，说那就是工布王的塑像，仿佛与那座狭小崭新的渤海国纪念馆异曲同工——两个国家都在时光中，萎缩为一个异常平庸的角落。对于某种观念而言，如此多而复杂的小国历史只能被视为或可用于点缀的支流旁注，并且，并不希望它的历史被发掘太多，这会增加负担，而遗忘是一件经济的事。

几年后，那场大雪和镜泊湖的反光还偶尔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镜泊湖边的村子在冬天里也异常空寂，越来越多的人搬到城市或靠近城市的城乡结合部。不过，到夏天那里就会成为各种农家乐和度假村。由于异常安静，大雪落下的簌簌声清晰可闻，在通向湖边的高粱地斜坡上随风翻卷。

这不是我唯一一次在大雪中寻找一处遗址。15



年前，我因为一桩工作逗留在乌鲁木齐。一个早晨，我决定去看看乌拉泊故城的遗址。那座遗址比十几年后的渤海国遗址倒是像样得多，厚重的城墙依然保留，偶尔人们还会在那里捡到断砖和箭镞。而且，前往乌拉泊故城的路上也会经过一个漂亮的水域：乌拉泊水库。虽然是人工水库，但也是鸟类迁徙道路上的休憩点。

我已经不记得怎样几经蹉跎到达的乌拉泊故城。那天早晨出城后，开始下起大雪，并刮起强风。按理说，这样的风雪天气不宜出门，但司机认为道路状况尚还良好，不行就在水库附近的小镇住一夜。出城一小时后，我们的视线已经无法穿透前方几米远的雪幕，汽车行驶缓慢，最终陷在了路边的一处凹槽里。我必须和司机下去推车。我记得，刚一打开车门探出头，一阵饱含雪粒的强风就刮走了我的眼镜，眼前一阵被太阳强光穿透的迷乱，除了风声，我听不见别的声音，直到司机用戴着粗糙污浊手套的手把眼镜捡回来递给我。

在靠近乌拉泊水库的过程中，风雪停了下来，能见度变得异常良好，远远的，在湛蓝的湖面上，我以为是一个微黄色塑料袋一类的物体在水上漂浮，司机告诉我，那是一只落单的天鹅。

这只天鹅没有跟上迁徙队伍，并且错过了离开的时间，这意味着它会在这个冬天死在这里。在浮冰移动的水面上，它有时把头埋进水下觅食，有时缓慢地游到一处稀薄干枯的芦苇丛里寻求庇护。我从没有近距离看见过那么孤独的动物，即使以后在阿里的雪原上看见孤狼时，也没有看到这只天鹅感到的那种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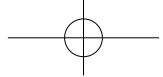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感。

波罗茨基有句诗写道：“天鹅像从前一样，游过世纪、倾慕它美丽的孪生兄弟”。我不是天鹅迷——相比天鹅我更熟悉乌鸦和一些怪头怪脑的丑鸟——不过，在以后，这句诗倒可以让我想起远在镜泊湖边的渤海国遗址，仿佛，两座遗址是同一个冬天里的孪生兄弟。

我对乌拉泊故城的记忆已所剩无多，我只记得在荒原上，四围的城墙内，仍然有一处处断墙溃塌后形成的砖石堆，我在其中爬上爬下，希望能捡到一点点锈蚀的箭头或兵器的残铁。风在围城内隆隆有声，但雪已经停了，太阳的强光刺眼而寒冷。在新疆，许多遗址像同一个，苏巴什故城以及附近的烽燧，高昌和交河，在太阳强光下，在大墓地一样的戈壁荒原上被狂风塑造成一个家族。

但乌拉泊故城与渤海国遗址，仿佛因为一场大雪中的水光联系在一起，遥遥对映。密茨凯维奇有一首名叫《希维德什》的叙事诗，讲述旅行者路过一处湖泊，曾经有一个城市的人民被集体屠杀在水中，人的影子和惨叫声会在湖水中隐隐响起，“只有最勇敢的人、才敢于在湖边走动。”人们在湖中捕捞时，捞起来一个活着的女人，她向人们讲述了那座被摧毁的城市的残酷历史：

“谁不自杀，谁就要被杀。
我救护着，一切都无济于事。
他们伸长脖子，跪在门前
别的人又拿来了锐利的斧子。
……



惊惶的眼睛都向地面凝视
世界在我面前渐渐地消灭。

.....

她沉下了，波浪掩盖了她
从此以后，她就不再出现。”

这是一首恐怖的诗，关于一个消逝的民族。也许我记忆中两座遗址的历史也沉没在水中，但这里没有恐怖的故事，只有一只等死的、沉默的、不再飞行的天鹅——密茨凯维奇也许愿意借它写下那首痛苦的民族之诗的另一个变体。



身边的溪流

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脑子里会涌现出一种需要，一种隐约的颤抖，我会在走路和睡醒时，忽然想起在春天或深秋的树林深处，遇见一条溪流时的那种快乐。

之前，我以为这种遇见溪流的快乐只会发生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和阿尔泰山区那样的地方。在草皮起伏之处，或树林里，溪水也在风中簌簌作响，掀动着低垂、凉手的叶片。一个叶赛宁那样的诗人看见它，溪流清脆的流动声，也许会在他的诗句中转化为成长与记忆深处的啜嚅。

有时我会具体梦见溪边的石头和树叶，这样一觉醒来，我就总想由北京出发往北，去内蒙古的阿尔金山，或者那些有漂亮树林的地方。在那里，有时会听到百灵鸟的鸣叫，那种声音我只听见过一两次，像一小杯清澈的水在天空深处晃动。仅仅因为这种对鸟鸣的稀少经验，我就不能算一个合格的旅行者。并且，直到在近几年——说来惭愧——我才发现北京周边的



山地峡谷里也常常流动着令人快活的溪流。

我曾想过，也许我会放下全部的和意图，改变主题和语言，写一本名叫《溪流》的书。——允许我跑会儿题。在《哈姆雷特》中，给我深深触动的不是那些有名的台词，而是那个二代精英和青年领袖宣称要弃绝知识的时刻。在接受幽灵的命令之后，他宣布弃绝大脑中“全部的知识”——书卷上的、经院中的全部的知识。然后他进入到“非人”状态，激进化为一个危险的行动者。同时，他的国家——他的命运此刻也告终结，曾经的留学生和政权继承人的光明未来已不复存在。我想，人总会遭遇一种时刻，这种时候他要“弃绝全部知识”，这是一种并不是在每个人生活中都会被揭示的宿命。如果我经历这样的时刻，我希望那不是个暴力时刻，而是因为一条溪流的力量。

2006年，我曾在伊犁的深山中疲惫地步行一天，其间迷了路，沿着向山地低处流淌的小溪寻找到阿希河的河道。河边就是公路，继续往南走，就可以到达一个哈萨克人的村子，那里有我要去访问的一间水泵机房。邻近天黑我才到达目的地，素昧平生的主人一直在河边等候。因为是夏季，草皮里会有毒蛇活动，早晨出发时，哈萨克朋友让我穿上一双雨靴，蛇牙咬不透这种胶鞋。太阳落山后，山地里迅速寒冷起来，我在空寂起伏的山地草原里忽然感到恐惧，我不知道会不会遇到狼，于是在沿途林地里捡了一根趁手的桦树枝防身。几十岁的人，为了给自己壮胆，就时不时挥动那根桦木棒，好像又回到了想象自己是勇敢武将的那种少年状态。暮色和寒气越来越重时，我才遇到一辆吉普车，司机告诉我走错了路。因为方向不同，



司机建议我上他的车，去两小时车程之外的矿区暂住一夜，那里有招待所，第二天他可以捎我去目的地。另一个方案是，送我回到走错岔路口的地方，往山下找到小溪，沿着溪流再往低地走，就可以找到公路，那样离我的目的地就不会太远。

很久以后，我想起那次步行，都不会忘记我在焦躁和疲惫中，找到向山下流淌的溪水时的喜悦。事实上，我还没有看到它，就听到了它的声音。那一会儿，我感到“水声淙淙”的“淙淙”是多么准确，而这种简单的、对词语的发现分散了疲惫感，使我的心情又平静下来，支持我往山下步行。在天黑前的寒意和苍茫的草皮上，溪水还闪耀着一些残余的反光，很快，乌云聚集在山地里，预示着这个夜晚不会有星光和月亮。在这个天气多变的雨季，夜里往往下起大雨。找到那条溪流的高兴感，还包括看到溪边向山下延伸的管道，而且管道显得还很新——这仿佛告诉我，我想多了，这里也是人们经常工作、布满人迹的地方。我用溪水洗了脸，觉得“他妈的，有什么好怕的”，并且大喊大叫着沿着草皮往山下跑，脑子里颠簸的各种杂念，使我奇怪地想起抱着头往山下滚的鲁智深。写到这里，那条小溪的声音还回响在耳边。

在加斯东·巴什拉的梦境诗学中，溪流是“意识之流”的重要源头，这位“诗与哲学之争”在他那里无效的思想家，出生在“一个小溪与河流交错的村庄”，在《水与梦》中，他声称“直到现在，我的乐趣依然是沿着溪流步行。”

“我无需独有这些溪流”，他继续说。这是一个溪流般的好句子。



如前所述，令我惭愧的是，我到近年才知道北京周边遍布着壮观的山地。在延庆一带，经过十三陵地区，再往北，山峦形态的峥嵘多变让我惊讶。葡萄牙作家埃萨·德·盖罗斯在小说《满大人》中写到：“平原上出现了壮观的鞑靼山脉”，这只是他的想象，但是却与现实地理相吻合。这里的雄峻高山也是古老的地质活动的遗留，不过，比目睹这些有力的、令人振作的山峰更令人高兴的，仍然是在深秋峡谷的白桦林中，发现一条明澈而又宁静的溪流。虽然它们的流程可能并不遥远，也许在十公里外，就因为各种度假村人造景观的断流截水而干涸，也许最后只是流进了一处已经被污染的死寂水域。

在我少年时，我的外婆在离城市六十公里外的一座高山上管理一间小寺庙。二十年前，不再上学后，为了逃避和父母的矛盾，我有两次上山，去跟在外婆身边，度过了一个夏天和一个冬天。在夏天的雨季里，在那座高山上，闪电跃动在一座位置比我低的行进着的云柱内部，从高处看见这座云块，如同看见一只巨龟的背，时隐时现的闪电与之构成巨型玄武。在那座大山的深涧里，大雨过后，到处都是湍急的溪流，从树林里蔓延而出，汇集成为一条人迹罕至的河。在那些最深处并没不过膝的溪水里，可以玩儿一天，可以一块块地捡起水里斑斓多色的石头，把好看的带回。可以在太阳晒暖巨石的时候，在石头上睡一觉。可以轻轻翻开较大块的石头，捉起只有鸡蛋大小的小螃蟹，装满一个塑料桶，带回外婆的厨房，在她的大土灶台里油炸成一盘，再配几个烤熟的土豆。那个我已经不会再见到的佛教徒老太太，会因为我杀生而声色俱厉责骂一通，然后去给我采摘她种的蔬菜。



这些年我接触过许多溪流，在冈仁波齐雪峰下，或者在阿尔泰山深处的额尔齐斯河水系，在帕米尔高原，也在可可西里的旷野中。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写出那本《溪流》，在写出它之前，我所经历的知识、主题和方法，也许只是八年前我在山地旷野中寻找那条溪水之前，所经历的恐惧和焦躁的过程。但这样来说，似乎又显得太刻意，并且对这种过程不太公平。

“我无需独有这些溪流”，加斯东·巴什拉说。这也意味着，它并不用承载我以为它可以承载的东西。

但我等待着，经历了时代的、工作的乱石堆后，还有时间去写一些溪流般的句子。

大型水体的较长时间存在，也许给人“水流永远存在”的错觉。江海易见，溪流越来越少。构成水之源流的并不是那些结果性的大型水体，而是毛细血管般的溪流，它们意味着大地肌体的真实体质。大地可以被改变，可以变乱再重组，它的力量和困境，也许人类都有勇气和方法去承受，但悲哀的是，大地成为不再有溪流活跃的大地。



不可能的还乡

一个北方朋友说，很久没见过云雾。听到这话，我想起几年前在遵义往重庆的长途车上，忽然醒来，看见路边群山下的小盆地里，充斥着低空蔓延的晶莹雾气，偶尔露出房屋和树木。仿佛这片云雾是从大地上生长起来，不愿离开大地，因此在低空静静悬停。不断强烈起来的上午的太阳光尽管意味着雾气会很快消失，但好像却增加了它的活力。

许多年前，我结束一次在西藏的工作后，飞到重庆再往遵义的路上，惊讶于这里几乎处处是我以为只会在边疆地貌中存在的河流大拐弯。在遵义还未开通航班之前，我都需要飞到重庆或贵阳，再换乘长途大巴到达遵义。而遵义—贵阳之间的山地道路是我主要的童年记忆，因为父母家乡在遵义，每到假期，我会在父亲的货运卡车上来回于两个城市之间，沿途经过开闸放水时壮观的乌江水坝，三线厂矿的工业装置在夜色中闪现的火光，汹涌铺展到地平线的崇山峻岭，以及峡谷中经过时会振动的 20 世纪 70 年代修建的



桥梁，那种振动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

写过关岭的远古遗迹和威宁乌蒙山中的石门坎山地之后，我很少想起贵州，它对我的写作和生活并没有产生那种理想化的作用。15年前，我在一首题目叫《低处》的旧诗中写道：

“我什么也不想去做。我走进波浪一样的
蓖麻地里，聚集的浓绿
并不带来帮助，但环绕我。

‘贵州’，我对它没有更多了解。
当我想去说一些关于出生地的话
我只能尝试一次。”

但这“一次”好像从未成功过，我也从不以为意。几年前，一对朋友夫妇提出想去遵义我父母的家里过年，我们飞到重庆，再乘坐大巴前往遵义时我感到一种紧张。一路上，我时不时提醒他们注意那些一直留在我记忆中的风景，虽然与此同时，我也在非常矛盾地斥责自己对朋友的强迫症。在穿越娄山关时，我仍然忍不住强迫朋友注意雪雾中的大娄山巅奇形怪状的山峰，仿佛雪雾深处有一条银色的龙，它的呼吸喷吐出了层次多变、灰暗或反光的烟云。

有段时间我想，为什么不可以用去观看其他地方的那种方式去观看家乡。于是，曾有一段时间，这种想象使我每次回去就有点可笑地带着相机四处晃荡，好像自己是个外来旅行者或者一种伪洛克，然后又被消解。人们说起“自然的”、“生命的”和“情感的”，就像是说起一种可以自动消除争议，也最能够自动顺理成章的东西一样。直到现在，我依然警惕这些习语对思维和语言的影响。仍然在一次遵义往重庆



的大巴上，我遇见过一个客居遵义的北方生意人，和我一样要由重庆乘飞机去北中国。和他的谈话，使我想起少年时我与这个小城的彼此否定。从他，我听到关于遵义的种种灰暗现实，他比我更了解这里。我和他，都是那种并不把他乡作故乡，而故乡也成了他乡的人。没什么乡愁，或者说乡愁是一种与家乡的对抗形式。在一个沉沦更可能被家乡以可怕的方式呈现的时代，那些喜欢念叨乡愁的人为什么看不到家乡的魔鬼呢？

2003年，我的外婆在去世前做了她的最后一次旅行。我牵着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例行常规为她讲解那个由中轴线和水晶棺构成的空间。她——经历过“遵义会议”时期——出乎我意料地，对我表达了一种朴素的对历史的怀疑。什么是她这样的老年人的旅行呢？当我们说到旅行者时，是否包括她这样一位垂暮的老人的旅行，不同于我们今天熟悉的父母辈那种知青遗风的旅游喧嚣？当时，我的母亲说，就当是赶在外婆还能走动时，最后带她出一次远门。也就是说，她的这次旅行是她对世界的道别。在她去世了多年后，我才隐约意识到那个出现在北京的苍老身影留在我潜意识中的创痛。

清明前不久，我返回贵州，参与父母新居的搬迁。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想着离开，因为一个月后就要去广州和东北工作，我的心思不会稍微关注这里。遵义机场通航后，从市区到机场有不短的距离，一路上是常常处在阴雨潮气中的层峦叠嶂。也是一个离开遵义，如今生活在广州的朋友对我说，第一次飞回遵义，经过这条道路时，他为沿途山川景色的美丽而意外，甚至惊愕。在这片好看得让我们这些对家乡印象刻板化



了的游子意外的山地里，有清代诗人郑珍、外交官与旅行作家莫友芝的故里，先贤一代构成了这里的所谓“沙滩文化群”。我出生在贵阳，离家步行不远是王阳明被流放中的客居之所，每天上学会路过张之洞出生地（如今那里只有一座不被注意的塑像）。迁移到遵义后，我就读的中学里有一座纪念郑珍和莫友芝的“郑莫祠”，每天活动的街道也以郑珍的字“子尹”为路名。因此，少年时，我从张之洞—王阳明之间的一条小路，转换到郑珍—莫友芝的遗迹里，不过这种明显虚荣的联想只对一个耽于幻想的少年有效，支持他度过实际上非常枯燥灰暗的青涩时光，在成人之后被迅速遗忘，并未产生任何影响，我也没有一次翻开过郑珍的诗集和地方志著作或者莫友芝的欧洲旅行笔记。

在我印象中，遵义，这个在白酒与麻将两种力量的磨盘中缓缓转动的城市，一个人在人前的穿着和姿态代表他（她）的全部。但在近几年，这种观念似乎在发生变化，人们都有某种模糊的、对轻松的需要，也可能是越来越城市化的氛围所带来：人们的生活不论多么焦虑，都愿意自己的形象是“休闲”的。不过，我对遵义的看法很大程度来自过去的不快，有的是成见，少年时，我经常激动地否定自己在这个小城里的生活。

1990年代初期辍学后的许多通宵达旦，无数次我看书到半夜，整夜听着自己家的、以及窗外天井中其他家传出的麻将声，早起的外婆会来责骂我，催促我睡觉并注意保护眼睛。我的窗户对着天井，看上去是一排排别人家的客厅，周末与逢年过节，每个窗框里都是一桌麻将，和牌声在天井里层层翻涌。有时雨



声整夜不断，在这些时候，连麻将声也增加了安适宁静的感受。第二天一早，街上往往是打了一夜麻将、脸色发青的人，女的勉强维持着装束，因为着急走路，鞋跟的响铁踩得很响；男的在早晨的阴沉空气里强打精神，吐出一口烟。进城卖菜的农民目光踟躇，但是反应敏捷。我并不反感父母的亲友们在家里通宵打麻将，这样，家里的气氛很热闹充实，不像平时那么死气沉沉。

由于参与父母的新居搬迁，我必须整理家里的旧书——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手抄的诺瓦利斯诗作和文章片段（从不同的书上抄写，那时还没有诺瓦利斯著作的中译本），波德莱尔散文集，普希金小说集，拜伦书信集，雷蒙·拉迪盖的两篇小说，克莱斯特《破瓮记》，达尔文的旅行记，加缪《反与正》。我记忆中的黑塞和诺瓦利斯，首先是一种遵义的黑塞和遵义的诺瓦利斯。德国浪漫派中那些阴郁、刻板和世俗的小城市，好像和我处在这座小城市同构，处在同一片天光阴雨中。

这些书曾带给我很多支持，在并不能读懂，只能模糊感触它们的少年时光中。那时，我感到在我面前耸立着的这座阴沉的小城阻碍了全部空间和时间，全部未来。1990年代中的一段时间里，我的性格常常变得暴躁。这些书抗衡着环境，带给我未来的模糊光亮——仿佛这种未来光亮产生自小城市的黄昏夕照和雨雾之后突然绽开的深黄色天光——也带给我孤独中的快乐和平静。年轻时的空无：经验的空无，语言的空无。与其说我怀念这种空无，不如说是怀念在这种空无中的平静，而不是那些在空无中焦躁不安的时光。我不能重复这种空无。我怀念在空无中的平静，



年轻的平静。

最后一次见到外婆时，是在她去世的数月前。她居住的楼房狭小昏暗，我的身体已经不能适应它，而我曾经在里面生活了五年时间，那时候，我半夜在没灯的楼道中摸黑上楼，不会多走或少走一级台阶。屋子里全是药味。外婆半身已经瘫痪，完全失去了自理和说话能力，大部分平时的样貌没有了，她的脸在偏瘫后迅速变形。一张衰竭到只能做出很少表情的脸，好像面部肌肉再也无法提供那些活动了一生的表情。一些最基本的生命样态在支撑她，也可以说，是她本人在吃力地支撑着这些最基本的，我知道，也是最后的生命样态。开始，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认识我，因为她的大脑一半已经坏死。但是她仔细盯着我看了一阵后就像个孩子那样哭了，哭得委屈，屈辱。眼泪流得那么多，头却那么小，只占了枕头上很小一块地方。她一直抓着我的手，另一只手不能活动，还拿起我的手认真端详一会儿，有时还对我笑。

当人们面对亲人的痛苦和死亡时，习俗规则不断起到与垂危者之间的隔离和自我保护的作用。人们从习俗中接受理由、采取做法，也为自己的做法得到解释和安慰。我想起过去在这栋狭小楼房中，阅读加缪在《反与正》中写下的他对外祖母去世过程的思索，同样的子女的自我保护和习俗隔离，但这种恰当的、太恰当的对比又让我感到羞愧。从北京回遵义，直到来到外婆病床前的路上，“去看外婆”而且“可能是最后一次”这本身，让我感到有一种可恶的，但是真实的兴趣。我意识到我在看望她，我意识到我在难过，而且终于产生压倒一切的疲惫感。



隔离、自我保护、可恶的兴趣、疲惫，一样是我面对家乡的心理机制，而且看来我在很长时间里不能改善它。我的一位朋友曾谈到，在一次她与印度当代思想家阿希斯·兰迪的对话中，后者提到“祖国的性别”，在不同文化和语境中，祖国有“父国”和“母国”之别，阿希斯·兰迪问，当你们谈到祖国时，它是什么性别。我的朋友把这个问题转问给我。

一段时间里，我当然愿意认为祖国是“父国”，好比荷尔德林理想中战士、农夫和工人的“父国”。但在我们的大地上，“父国”带来了种种损害。随着时间过去，我愿意认为“母国”是外祖母的大地。并且，我逐渐接受了在漫长时间里拒绝的叶塞林那样的诗人，他以一种我曾经排斥的方式——这种排斥受到我所处时代的语言变革的内在影响，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写过一个外祖母的大地。

对于我，这是一条格言般的简洁公式：故乡 = 年轻时在空无中的平静和外婆的山地。前者已失去，对于后者，我暂时只能继续谨慎地管理我的语言，克制汹涌的词语。



● 存放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甘珠尔大寺里的一个沙绘坛城。



跋 一个人所喜爱的

从各方面来看，我都不是一个称职的旅行者。事实上在 2015 年，除了几个不同城市的工作之外，都没去过哪里，支持我写这些文字的材料仅仅从回忆和过去的笔记中获得。在一个种种现实问题越来越强烈地干预人的生活的时代，旅行越来越是一种可疑的、虚浮的行为。在马洛伊·山多尔的小说《烛烬》中，漂泊半生的康拉德对他多年未见的故人说，“我们这些从热带回来的人都有一种可疑。”

半年前，当我认为自己的写作“有一种可疑”时，我还未读到《烛烬》。这样说，并不是在暗示我的体会胆敢与马洛伊·山多尔的杰作相提并论。这种“可疑性”，实际上早已蔓延在现代行为和现代写作中，我只是受到这种传统——或者进一步说——这种命运所影响的许许多多普通写作者之一。同时，这种“可疑性”也和旅行有关。我们都知道，那些旅行之后回



到城市的格列弗们，通常是更有理由不被信任的人。他们有理由和材料谈论城市里的人从未想到、也从未关心过的事物，因此也就更有理由受到怀疑。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早已过去，虽然在那个时代肇始的文学和思想仍然在影响我们的想象和行动，但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旅行者不被严肃对待的时代。不再有重要的未知来自地球上的别处，即使有，也是细枝末节，不值得被太多关注，猎奇的文艺影像和各种社会科学，也比旅行记更能做到新奇的或者专业的表现。

我并不反感那些多多少少是夸大了、或者喜欢对人谈论他们的旅行经历的人。是的，也许他们在某个无人区的经历并不值得如何书写，有些技术性的处理手段或者美景的细节也是事后添加的，同样，他们在旅行中产生的一点感悟或者诚实，也许正是贫乏而不是经验的产物。经验的贫困，不仅作用于原地不动的人，同样也作用于那些离开城市远行的人们。但是我不反感后者，不认为他们的话语是希望被消费者购买的欺骗和媚俗。他们中有的人，在我眼中如同那位可疑的闵希豪森男爵——这位夸夸其谈的吹牛家，这位想象与实际不分的旅行者，比那些对他冷嘲热讽的人们要更为诚实。他是堂吉珂德的一种变体，更矮小，更刻意，但可能比堂吉珂德更坚强（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脸皮更厚），不在乎被嘲笑，保持快乐，并且，不会忏悔。比可笑的旅行家闵希豪森男爵更可笑的，是追问他每个细节的真实性的城市实证主义者。

现代美学鼓励内向性，人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佩索阿，坐在北京或上海的某个房间里，把自己当作核桃壳里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宣布他的灵魂不想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古典学者伯纳德



特在评述一位学者同行时说：“古人不是世界主义者，这很有意思。他们认为自己是完全自足的，不需要‘异邦智慧’。所以他们不学习其他语言。这种看法导致他不能理解哲学具有决定意义上的重要性。一旦做出那样的区分，你就用不着旅行了。”今天，和20世纪80,90年代不同的是，越来越缺少那种本能的、粗粗拉拉的旅行者——他们曾经是那二十年的传奇——城市里的人们越来越是一些自足的古人，和当代的复古风潮同步。即使人们远行，也有了各种精美的食物和工具。写到这里，我挺怀念过去一位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旅行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随随便便揣着两瓶矿泉水，在珠峰下的海拔6000米的山地上走了一天。当他下山后遇到装备齐全的户外人员时，后者为他感到后怕，他也仅仅是幸运之神眷顾而没有走错下山的路，否则酷寒、野兽、缺氧和脱水很容易要他的命。同样，我也怀念过去因为工作原因，我访问过的一些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的徒步考察者，他们意味着一个还有点缺心眼儿、轻信的粗粗拉拉的时代。随着时间过去，我不再苛责这种轻信，一如史诗中的故事里的人对现实、对他人和对希望的那种轻信。没有这种轻信，就没有一系列的遭遇变化和叙事的火光。

当然，我的一点旅行经历——因为有意区别于20世纪80,90年代的闵希豪森们，而且曾胆敢自以为比他们“真实”——实际上即使如何事后解释，也没有20世纪80,90年代的闵希豪森们那样值得对人谈论，我好比一个处在过去的粗犷希望和今天的精细实际之间的人，而且不想得罪后者。那些旅行也没有深深影响我的生活，我像所有的理中客一样懂得区别对待，不像闵希豪森们——他们中曾经有一位在20世



● 前往西藏阿里，经过萨嘎时路过的一个湖泊。

纪80年代参与过江河漂流，感到被自然界的非人性力量深深触及过，这使他一生中都在那种影响里，做不好一个恰当的社会人，那种影响成为他的局限，一种我尊敬的、我不能够获得的局限。而且，如果我在他们面前谈论自己的一点点旅行，是没有礼貌的。

并不是危险随着全球化的表面繁荣而减少了，实际上，一个今天的旅行者面对更多的社会危险。不久前，独自在中东地区进行古迹考察的年轻考古学者刘拓的遭遇，已说明了这一点。这位旅行者的事迹最初在网络上传开时，响起的是国人的嘲笑声。人们颇为自负于不再天真，能够一眼看到本质。但刘拓的事迹又一次唤起了我的羞愧感，他显然比我更是那种配得上撰写“大地报告”的人。

那么，一次次平庸的旅行带给我的是什么呢？我也不想太苛刻地要求自己。至少，我在这些旅行中明确了我真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其中许多是在旅行中产生的，在城市中不会产生。

埃利蒂斯在《一个人所喜爱的》中罗列了许多旅



行中经过的地点、物品、文学和艺术作品，使我也想尝试写一份自己的目录——

- 一本 1950 年出版的朱维基翻译的拜伦的《唐·璜》。
- 一张墨绿色旧军毯。
- 一些从西藏阿里地区、雅鲁藏布峡谷，青海可可西里和江源地带，新疆可可托海、艾丁湖，黑龙江边，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黄海边带回来的普通石头。
- 在一些早晨里，乌绿的被风刮得生动恢弘的北方树木。
- 球形闪电在半荒漠半工业地带里流窜，像野狐狸，旋生旋灭。
- 耸峙几十米高的地热蒸汽柱掺杂着早上的平流雾，笼罩住盆地里捕捉宇宙线的装置阵列，一只鸣叫着的鹰出没在雾气里。
- 色谱一样变幻着的盐湖。
- 梯级分布着三个天然石油池的泥火山山谷中，猛然出现的几次小股黑黄色龙卷风。
- 从冰川达坂的雪雾里静静走出的黄羊，在阿里。
- 海洋。
- 夜半的水母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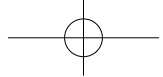
尽管我以为我也能罗列若干，但很多我事先以为会提到的东西，却在刚刚快要写出时褪色，进而与我的关系模糊了。其中有的我几乎不再记得，有时又会异常鲜明地梦见。

自然现象、地貌和文字作品，是不属于物品也不属于人的现实关系的事物，是两者的中间状态，也是人的理解力的呈现——或者，理解力的一些时刻。如果可以包含这个范畴，我们可以例举得像埃利蒂斯一样多。

埃利蒂斯所说的也只是“一个人所喜爱的”，并不是“一个人所喜爱的物品”，更不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他罗列的许多“物品”他并不拥有，比如他不可能拥有那些古代建筑、地中海岛屿和亚细亚的山川河谷。只有一个真正的物质大规模拥有者可以有罗列“一个人所喜爱的物品”的机会，这种人历来不是很多。如果他们之中有人愿意提供一份清单，也像埃利蒂斯那样确切写出喜爱的原因，甚至在道德上有各种问题，但这份目录不见得完全没有意义。也许，人们应当注意他们的对立面对于社会和地球的描述。

我希望不久以后的旅行目的地是贝加尔湖、西伯利亚和一些暂时还未发生变乱的中亚地区。

西方近代文学作者，内亚近现代史与现实，一些民族史诗和传说故事，地理政治学，自然现象与中国事实，我希望这些作为长期理解对象与想象来源的元素，构成一个格雷厄姆·格林式的“我自己之世界”或者迈克尔·波兰尼提出的“个人知识”。当然，我仅仅只是廓清了非常少的一部分。这些元素，都需要立足于现实，也是从现实停止之处——或者说一些渐



变部分开始。写作也是从觉察到一种渐变而开始的，
发生这种渐变的载体之一，则是一些并不那么特别的
旅行。

/239

跋：一个人所喜爱的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报告：另一种中国行纪 / 王伟著.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9

ISBN 978-7-121-29592-8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8498号

策划编辑：白 兰

责任编辑：张 轶

印 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装 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7.5 字数：160千字

版 次：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8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